

中國內幕

第一集

大達圖書公司發行

中 國 內 幕

第 一 輯

卷 一

大 達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中國內幕目錄

第一輯

誰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	一
胡適爲什麼不組黨	五
蔣廷黻丟官記	七
政學系的來龍去脈	一〇
新第三方面內幕	一三
宋子文的政治資本	一五
太子派盛極而衰	一九
非正式商談的前前後後	二一
好事多磨的國民大會	二三
林世良之死	二六
外交界登龍術	二八
馮玉祥的得意傑作	三一
記民社黨南北內訌	三三
軍人政治家黃紹雄	三八

飛虎隊怎樣成立的？.....四一

中大教授的派系與鬥爭.....四四

于右任由紅變黑.....四七

第二輯

副總統競選內幕.....四九

魏德邁使華的前因後果.....五一

周佛海死後種種.....五七

中國政治上的十大派系.....六一

中共為何拒絕和談.....六三

李品仙在安徽.....六七

張瀾是怎樣一個人.....七〇

龔德柏與救國日報.....七四

民社黨的家世淵源.....七六

反豪門運動是誰發動的.....八五

西藏的政治人物.....八七

江亢虎和他的黨.....九〇

九龍城血案始末記.....九三

第三輯

徐繼莊案前後因果	九七
救濟特捐的由來	一〇二
孔門四傑	一〇四
國大糾紛真相	一〇六
民主促進會內幕	一一二
李品仙與唐生智的私交	一一五
端納與西安事變	一一六
廣東省議長逐鹿記	一二〇
盛世才如何殺害杜重遠	一二三
國民黨黨團合併經過	一二五
泛亞會議中兩代表	一二九
陳果夫與陳立夫	一三一
青年黨與少年中國學會	一三四
中港經濟協定內幕	一三六
沈鈞儒與救國會	一三九
外交界的人事滄桑	一四一

第四輯

- 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財產？……………一四五
- 政治怪傑陳獨秀……………一四八
- 川島芳子生死之謎……………一五二
- 陳彬談「汪公館」……………一六〇
- 女王奇俊峯血案記實……………一六一
- 審陽金佛失縱始末記……………一六六
- 白崇禧二三事……………一七〇
- 農工民主黨內幕……………一七二
- 洪門組黨前後……………一七四
- 青年黨內閣真相……………一七七
- 張道藩爲何棄官……………一八〇
- 吳稚暉的風趣……………一八二
- 張君勱與張嘉璈……………一八五
- 轟動陪都的高秉坊案……………一八八
- 陳儀與魏道明……………一九一

誰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

一個外國記者寫下他見到蔣主席的第一個印象道：「這是一個空前強烈的個性人物！」他的觀察是正確的，蔣主席和其他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一樣，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他有倔強到底，不妥協的氣概，當他對某一件事，有了成見，他就不再讓人發言，要改變他的意志是萬分困難的。

因此，從各院部會首長到軍事領袖到他周圍少數的親信們，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可以在他面前說話。會有一個部長級的婁人說：「當我的車子快到主席官邸，我的心就往下沉，因為我立刻意識到又要挨罵了。」所以年來高踞要津的人，除了必需有的才具之外，還要有一副好脾氣。

蔣主席有過人的精力，他能夠注意到極微細的事情，舉一個例，他每天很仔細的看中央日報，發現標題稍有問題，他的手諭就經由陳布雷先生飛下來了，因此，主筆政的人無不兢兢業業以從事。在重慶時，他每天看新華日報，凡是新華日報所揭發所攻擊的對象，他都要查究；成爲文武官員最頭痛的事情。因此，大家自保不暇，遑論有所獻替？

在元老中，吳稚暉先生、于院長和戴院長都應該是極少數可以「說話的」人們之列的，可是他們從來不說話，他們以主席的意見爲意見。

往往把何敬之將軍當作蔣主席的最親信的人，其實他的發言力量非常有限，即使在軍政部長任內，蔣主席很少付予他實際的權力，尤其是在部隊人事方面。至於馮煥章將軍白健生將軍，他們是客卿



地位，只能說些官冕堂皇的話，不能深談。

過去政學系首領楊永泰氏，蔣主席頗資顧問，楊氏死後，張羣院長繼之，雖邀寵信，可是發言的份量，畢竟要打一個折扣了。

宋子文先生有一個較強的個性，我們知道，他曾同蔣主席鬧過意見，當他在行政院長任內的職權，偏重於行政方面，政治上的重要性削弱到最低限度。

真正保有發言權，能够影響蔣主席的，爲四陳：即陳果夫、陳立夫、陳誠、陳布雷四位先生。論關係，這四位陳先生都够得上。陳果夫和陳立夫兩氏，於蔣主席爲姪輩行，陳布雷氏於蔣主席爲姻戚世交，陳誠將軍自黃浦軍校任職迄今，追隨左右達二十三年之久。四陳之中，陳布雷氏以文學受知，其個性內斂，不願多所建白，其重要性不若三陳。

在黨、政、軍三方面，蔣主席親柄最多爲軍事，次之爲政治，黨務差不多悉委陳立夫陳果夫兩氏之手，兩氏富於組織才能，在「以黨治國」的國策下，他們的地位日臻重要。兩氏既保有對上的發言權，又控制了最高決策機關，和各級黨部，不久就取得了重要的行政權力，通過委員長侍從室，左右各級行政機構的人事。假如說，兩氏的權力有一個限度的話，正確一點說：兩氏在黨務方面握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權力，在政治方面握有百分之四十弱的權力，惟有在軍事方面他們沒有置喙的餘地。

假如在三年以前我們說：「陳誠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也許有人會嗤之以鼻，目爲不經，事實上，蔣主席培養陳誠將軍作爲最重要的輔弼，足足有十二年了。

十年以來陳誠將軍一直爲蔣主席最親信的人！

北伐以還，中國一向處於軍事擾攘之中，沒有一天釋過兵戈，蔣主席疲於征戰，很自然的要覓一個有力的臂膀，助他參贊戎機，臂劃政略；使他感覺失望的，就是早期識拔的一些親信幹部，一旦獲得高官厚爵，只對子女玉帛發生興趣，事業心早已泯滅無餘，使他不得不培養一個新人，於是這位保定八期短小精悍操持護嚴足智多謀勇於自任的陳將軍就脫穎而出了。

陳將軍之受蔣主席的殊遇，遼東湖及統一兩廣之役任炮兵隊長，攻破惠州天險時；其後，北伐之役，德勝關之役，馮崗之役，都成爲陳將軍最好的考驗。近則要數到江西剿匪之戰，經過幾次圍剿的失敗，當時國軍將領聽到剿匪，莫不搖頭，由於匪軍宣傳政策政治工作的奏效，弄得士無鬥志，形成望風而靡的一面倒局面，部隊駐在稍爲暴露一點的地方，下級幹部往往這樣說：「見鬼，還不撤退，紅軍來了又得繳槍！」當時情況的嚴重可見一般。蔣主席勞神焦思到了極點，乃檄陳將軍十八軍入贛，居然改觀戰局。二十一年十八軍風頭出到十足，做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固無不解，（當時匪軍本錢有限，珍惜實力萬分，十八軍是唯一能同他打硬仗的隊伍，所以處處退讓）如此情形，蔣主席自然逾格垂青。陳將軍會先後爲民除害，解散雜牌軍五十二師和五十九師，弄得當時陳將軍兩個上司——剿匪軍總司令劉峙氏與何應欽氏以爲他擅自行動，不服從命令，先後以去就力爭。可是經蔣主席考驗結果，卒留陳氏而將劉何兩氏他調。陳十八軍原祇轄第十一師和十四兩個師，調到江西不過兩年，擴充到了五個師，宣樂中伏，除李延年的第九師去了大半外，十八軍沒沒者有第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共三師，當時頗爲一般妒陳寵信的人們決心，有些將領竟說：「陳辭修也有這末一天！因爲他們飽聽蔣主席的罵聲，不覺幸災樂禍也。當時南昌行營辦公廳主任熊式輝密答蔣主席將十八軍五師三十

一個團，縮編爲三師九個團，蔣主席以這個密呈示之，陳將軍垂涕而道，謂：「委座如不需要十八軍，請撤銷這個番號，何必三師九團？否則，悉憑鈞裁！」誰也料想不到蔣主席竟批示：予以擴編兩軍八個師！（番號爲十一師十四、四七、六七、七九、九九、合編爲第五軍十八軍）陳將軍一直成爲他們的政敵，攻訐，以怨之府，亦以此爲始。

五次圍剿之役，東路軍蔣鼎文和南路軍陳濟棠因運用堡壘戰術失當，頗有損折，而陳將軍統率下的北路軍却未有差池，所以共匪西竄，蔣主席班師回京，每達到將領去言調，輒說：「你們去向陳總指揮請教請教！」

爲了減少陳將軍的謗言，蔣主席更苦心孤詣的一再提高他的威望，辦全國性的軍官訓練團，自任團長，令陳將軍任教育長，表面上給予他副職，不予以正職，以減少攻訐目標：（爲廣州行營參謀長，武漢行營副主任，軍政部次長等）同時委以若干極重要的祕密任務，如全國炮兵總指揮，各中央軍分校主任，副主任並由他提名。抗戰爆發，更把他放在最易發展戰功的地方，如瀾滄之役的左翼軍總司令，武漢保衛戰的總司令，遠征軍總司令等。當民國二十七年時，陳將軍身領十餘要職：政治部部长，青年團書記長，二個戰區長官司令，湖北省主席，武漢衛戍總司令……爲之駭然。可是，當時蔣主席正暗示何敬之以軍政部讓陳呢！

蔣主席之於陳將軍，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他是唯一可以同蔣主席「吵架」的人，說來也怪，蔣主席烈火似性格，不容任何人頂撞，只有陳將軍常同他吵得面紅耳赤，緊張萬分，結果往往還是蔣主席讓了步，說：「辭修，照你說的辦！」

大家都知道陳將軍控制全國十分之八的陸軍和全部海空軍嗎？你知道他掌握了青年團全部權力嗎？你知道他的勢力一直伸入行政和黨政而且佔着很大的比重嗎？那末，你是不會懷疑他是蔣主席最親信的人了！

胡適為什麼不組黨

當胡適校長剛剛回國的時候，許多人傳說他要組黨，這個風傳到現在已經沉寢了，但是在暗底下仍然傳之甚盛。胡適是否組黨？成爲一個謎，我們不想猜這個謎底，因爲政治的事，說穿了便是互相的騙局，說得文雅些，也只是太虛幻境的門對子，——「假作真是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不過我們願意分析一番。

以胡適個人而論，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他最初辦「努力週報」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好人政府」的口號。就說明了他的作風。在「獨立評論」時期，風頭愈來愈健。尤以「知難行亦不易」的幾篇文章，和孫中山先生唱反調，使得名氣更爲揚溢。後來，在獨立評論常常寫文章的幾位先生，幾乎都以胡適「行政院」的部長們自命了。

以目前的時局而論，政府方面，爲了要「還政於民」，總希望有幾個能爲政府所看中，又能代表「民」的黨派來接收，也未始沒有給他一個機會之意。這在「錦上添花」的作用上，自然是應有的文章了。在前年，已有過某名流受到政府的青睞，被暗示出來組黨，某名流考慮再三，終於却步。同時

各種奇形怪狀的「黨」，也爭着出場。乃至「跳舞民主黨」便這樣地出現了。像胡適這樣的人，自然比「跳舞民主黨」擺得出來一點。

然而胡適在這樣形勢之下，必然不會有所舉動。他一定以極世故的姿態來觀察風色。雖然他也作過一任「大使」的官，至少，在他自己「竊比管樂」的目光看來，他還是一個「老處女」，不會輕易談嫁娶的。

胡適的爲人是最善於投機的。他是政治交易所裏的大「空頭」。他的「好入政府」是一個最空洞而最油滑的口號。當他辦努力週報，初談政治之時，許多北大學生都說他簡直是「萬能博士」。其實這種論調是最幼稚的。因爲在那時候，他已有「名教授」之稱，如若不談政治，最多不過「名教授」終老。惟有在那時候談談政治才是因利乘便，一本萬利的手法。他現在更進步了，更巧妙了，在表面上不拍政府的馬屁，但他却至公至正，悲天憫人地打電報給毛澤東叫共產黨放下武器學英國工黨，這不是妙極了麼？老實說，憑這一通電報，他便已經大大「值錢」，緩一步組黨，也就不妨了。再看他回國後所發表的言論，和應酬的態度，已經明白地露出「看風勢」的作風。

以「北大」而論，雖然現在已經不是蔡元培時代的情形，雖然有許人已經或正或反，變成「羅家倫型」的，及「周作人型」的了，但畢竟還維持了一個「道統」。這「道統」拿現在更確切的話講便是「派系」。稍有幾歲年紀的人，總該還記到「北大」曾經爲了保全「北京大學」四字，作過最頑強奮鬥的一段怪事。在普通人看來，這是幼稚的笑話。但在他們，却象徵了一個堅強道統的建立。胡適仍然守住了這一個山寨，——若以胡校長的筆法，便應該叫做「北大店」吧——勢力就够。好在

最高的希望也不過行政院院長。

蔣廷黻丟官記

行總署長蔣廷黻的被迫辭職，正和他當時長救濟總署一樣也不偶然。要明瞭內幕情形，不能不追溯一下他早期的政治生活和背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五年時，蔣在清華大學任教講演「國際關係」和「中國外交史」，報章雜誌上經常發表獨到的政見文章，於是和當時的當權者結下了不解之緣。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因翁文灝氏向委員長極力推薦才正式出山，擔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之職。在職期間更得到孔祥熙氏的賞識，奠定了蔣氏政治基礎。十餘年來周旋於孔翁兩人之間。一九三六年出使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因有反蘇嫌疑召回，仍任政務處長兼行政院祕書長，隨着蘇聯態度的轉變，正合了蔣氏的論調，因此更受委員長的器重。一九四三年春羅斯福在大西洋城召開國際善後救濟會，（當時還沒有組織聯總）蔣氏被派以全權代表名義參加。回國後，即兼任善後救濟設計委員會主席，開始了他和善後救濟的關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美京華盛頓成立，中國代表一席，自然非蔣莫屬。年底回國後，根據聯總國際協會和當時當權者的支持，極力籌組與聯總有關之善後救濟機構，定名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行總正式誕生，蔣氏擔任第一任署長，這是蔣氏一手造成的產物，認為以後可以獨當一面，放膽幹去，以完成他的政治的理想。

誰知好景不常，行政院改組，孔去宋來，蔣氏失了靠山，不過蔣想事在人為，憑了自己的能力和

學問，再加上有直接謁見委員長及與經濟部長翁文灝文字之交的優越條件，還是大有可爲。可是他忽略了重要的一點，就是在書本上查不出的「頂頭上司」的重要性，沒有好好聯絡，因此蔣氏便成了沒有上司的外交家。宋呢？原是有名的理財家，一登台自然理財第一。然而國庫支絀是事實，一看行總是個不要本錢的大宗買賣，怎肯疏忽。按例說，應該用個皇親國戚才能指揮如意，然而蔣有晉謁委座的特權，而且和當朝人物也左右逢源，不便立刻下手，於是驀背看書般的走着瞧吧。

TV和TF就在互相的猜忌情形下各幹各的，好在外國物資還沒有來，更不必爲這塊空招牌有失大體。這其間宋院長忙著新政，釘牢黃金外匯，蔣則出席了聯總第二第三次大會，深感學而有用，莊嚴地擬訂了中國善後救濟計劃。爆竹一聲，帶來了勝利，五億美元的聯總物資，果然如宋蔣預料地源源而來，這一下，行總的紙招牌可成了金招牌了，蔣立刻將行總搬到上海，大有趨而避之之勢。

前年九月起，行總業務正式展開，租輪船租倉庫還得行到政院通過給予四千三百二十億的基金，（佔全國全年稅收百分之五十二）雖然結果是一紙空頭支票，然而心理上總還暫時樂上一樂：當時的蔣氏抱著兩個宗旨：一、力求聯總物資大量接濟。二、以忠誠穩健態度完成救濟工作。TV一看情形不對，行總既然是行政院機構的一部，豈能獨自清高撤下國庫支絀不管，想來想去，想出個外國辦法，署長之外再加上一個執行長，共同向行政院負責。執行長人選決定了劉鴻生氏，劉和宋原是聖約翰同學，很有點交情。還有一層，劉是蔣請來當上海分署署長的，由劉兼任執行長，蔣似乎也無話可說。一道指令送到行總，這不曾給蔣當頭一棒，打破了大權獨攬的局面，蔣氏氣忿不過，想出最後一着棋，懷着一腔怨氣飛到重慶面謁主席，自請辭職，他說執行長在中國史無前例，這套外國戲在中國做

不通，當然求賢若渴的蔣主席不會放他走的，於是百般慰留，保證雖設執行長，對內外仍由他全權負責。蔣出了這口怨氣，飛回上海，然而還有名無實的執行長多少有點制肘，劉和蔣是朋友，和宋更是知交，敦厚多財的劉氏，處在兩大之間，很傷腦筋，政府命令不能不服從，執行長也不能不幹，然而蔣宋衝突時怎麼辦？聰明的辦法當然就宋屈蔣了。

這其間行總發生了最大的困難，每月開支數百億而收入毫無，尤其是中央銀行老閻由友好馮鴻鈞換了素沒平生的貝祖貽，這四千三百二十億的空頭支票，自然無從承押，於是經費方面，無法籌集，眼看滿坑滿谷的聯總物資無法處理，這可逼得他走頭無路：五月間宋看準了這個弱點，利用時機，來了套杯酒釋兵權，客客氣氣請蔣和聯總中國分署長凱士到南京去談判，結果蔣交出了財務、分配、儲運三廳給劉鴻生：自己保留了有名無實的賑恤廳和工礦漁農衛生等委員會，道地的善後和救濟工作，而物資則全部轉移到劉的手里去了；相對的條件，好像是取得中央銀行的借款，實際上有人想由多財善賈的劉先生來處理物資，撥一個另頭也可維持行總職員的薪水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就是聯總宣佈對華停運令，蔣這一驚不小，立刻進京拜謁宋院長，不想遭了擋駕，再急急忙忙去看馬歇爾，才真相大明，原來自聯總中國分署長凱士辭職後，宋輕信會為行總開除，而用作刺探物資情形之高級秘書奧姆斯克之言，將聯總署長賴瓜底前聘用雷氏繼任中國分署署長的徵詢書原書搗回，一面聯總中國分署三百餘職員為聲援雷氏而向聯總控告行總工作不力，蔣氏至此，似已忍無可忍，頓萌去意，對宋之態度亦轉強硬，宋院長一向的作風，最恨人家在他意思下加一個「不」字，尤其是像蔣這樣可以直接見主席見馬歇爾的人，停運的恐怖總算在蔣的又硬又軟的外

交手腕下挽回過來，但行總的工作則因交通阻梗，港口擁塞，加上政治黨派之爭，飽受攻擊，他想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做法，是有意破壞國際條約，他辛辛苦苦出國五次訂立的「聯總國際協定」，「聯總大會決議案」，「中國與聯總間之基本協定」，他想用這三種大法來維持國際關係，現在呢？什麼都完了！

九月五日行總在京召開工作檢討會議，他抓住這個機會，在部會長官的面前宣讀了長三十餘頁的演講稿，他指出是誰在阻礙善後救濟工作，是誰破壞了國際條約，聽的人都呆了，蔣泰然地回到上海，有人警告他說：這會引起不良的反應，蔣說這反應是我預期着的。報紙上披露了蔣的辭職消息，蔣不承認也不否認，然而蔣宋衝突尖銳化，已成了不可諱言的事實，於是，反應來了，九月三十日的下午，蔣接到宋的一個電報，說有要事相商，當晚他到了南京，宋很客氣的說：「蔣先生年來太辛苦了，行總的工作愈來愈困難，蔣先生該可以休息一會了！」蔣和氣地接受了這個要求，於是，行總的主人換了不知名的蠶寶樹了。

政學系的來龍去脈

近幾年來中國的變局，是由兩大政治思潮所激盪而成的，一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另一個便是梁啟超倡行的維新運動。前者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後者因以保皇為號召，表面上是失敗了，但骨子裏還是形成了中國政治的安定力，成為政治舞台上不可少的角色。因為維新運動是清末士大夫

階級的一種自覺的革命運動，代表了中國社會上層人物的要求。康梁上書和光緒百日維新充分表明士大夫的願望不是想作革命英雄，而只想作例中興名臣，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祕密。梁啓超入民國後另組民主黨、進步黨、在袁世凱時代，推戴熊希齡出組「第一流人才內閣」，其立場更爲明顯，那就是說，梁氏以及他周圍的人羣抱定宗旨，不管皇帝好，總統也好，軍閥好，官僚也好，只要握着主權的人肯把權力交給他們去執行，他們便一定「鞠躬盡瘁，取而後已」，梁氏後來出任段祺瑞內閣部長，即基於這種政治哲學，但軍閥與士大夫的路線無論如何走不攏來，結果梁氏還是失敗，這以後他便洗手不問政治，而在野之身，從事學術工作，給中國政治以有力的影響。梁氏本來是擁護袁世凱的，至袁氏欲稱帝，則又奮臂一呼，反對帝制，蔡錫是梁的弟子，雲南起義當然也有梁氏激盪之力在內，後來軍閥竄國，五四運動勃發，梁任公的學術思想文章是這一運動的先河，自五四起的南方革命勢力突增，終至於北伐成功，梁氏與之有力焉。

綜梁氏一世，組黨數次，但都不是以黨綱黨紀來約束他的黨員，是另一種組織方法——學統，用學社、書院做基礎，以門徒師友的關係做向心力，把中國尊師重道的熱情加以發揚，政治思想的遞傳由師道直接受授，造成一個學統式的政治體系。梁氏本人是直接承接繼康南海萬木草堂的學統，戊戌東渡後，在橫濱辦東亞商業學校，留日學生在橫濱登陸後，入該校習日語，再轉其他學校，不啻爲一個留日學生指導所，人材自然匯集於此，如後來有名於時的蔣百里、李根源、熊式輝、周伯勛、范靜山都是梁氏東亞學校的學生，漸漸成了飲冰室一派的學統。後來的民主黨，進步黨即這一學統的演進，進步黨隨袁世凱倒台之後，北洋軍閥、政客的交通系、安福系紅極一時，梁氏則另組研究系與之對抗

時人如李根源、王寵惠、張君勱、張公樞、吳鼎昌、蔣夢麟、蔣百里、黃郛都與研究系有密切的關係。可是研究系在北方并不得志，其中的李根源氏便南下廣東，另組政學系。李梁關係最為密切，梁在政治上最富於理想，李長於活動，適相得而益彰。政學系份子，除由李氏收一部份軍人如熊斌、熊式輝、曹澆森者外，大體上就研究系之基礎上改組而成，可謂集梁任公一生好朋友與得意門生之精英的一個政治組織，是則政學系以研究系為前身，梁任公為開山老祖，而廣東則為其發祥地，那是毫無疑義的事。

李根源年老退休，離開政治舞台之後，政學系以楊永泰為中心，很快的蓬勃發展起來。楊氏是中國政界的一顆明星，一個怪才，但他就因為鋒芒太露，結果被人狙擊斃命，政治舞台上失了一個名角，而政學系也因此消失了一個時期。抗戰期間以吳鼎昌主政貴州，張羣主政四川，又開始了西南大後方的發展，許多軍政工商界名人都和政學系發生了關係，這系在中國政治上的力量，又形重要起來，現在張羣一躍而為國民政府第一個責任內閣首長，可說是政學系第一次正式握着政權，也就是發展到了最高峯。

今後政學系的前途如何，則要看張岳軍能否打破中國現在面臨的經濟難關而定，他們深深明白這一着關係該系的光榮至大，所以連已經退伍的領袖李根源也請出來做國府顧問，準備應付可能遭受的種種打擊了。不過有一點政學系的人很明白，那就是即使張羣失敗，最多使得政學系紅得發紫的氣色暗晦一時，到了時機成熟，中國政治有需要他們來收拾的時候，他們還可以捲土重來，因為他們無一定的綱紀，無一定的立場，很可以使政學系成爲中國政治上的不倒翁的。

新第三方面內幕

所謂「第三方面」，在中國的政治角鬥史上，的確也起過一番作用，記得前年國大召開之前，南京最後也是最緊張的一場談判，就是以「第三方面」作爲主角。當時爭執的雙方，骨子裏都已打定主意，但是彼此都願意讓這「第三方面」來「死馬當作活馬醫」盡一回「入事」。結果是死馬終究不能醫成活馬，「第三方面」在交通銀行樓上吵鬧幾通之後，不但國共雙方沒有和好，連所謂「第三方面」的本身也被碰得零零碎碎，完全瓦解了。

分裂後的「第三方面」，按「物以類聚」的通例，馬上分道揚鑣，各奔前程：民、青兩黨與若干「社會賢達」，由參加「國大」而正式「入閣」，順理成章，很自然的做了「第一方面」，民主同盟雖欲維持「中立」之局，在京滬一拖再拖終亦不能不遷居香港，重建流亡總部，宣言聯合中共「共同奮鬥」，而接近「第二方面」。時至今日，所謂「第三方面」實已成爲不堪回首的歷史名詞，在人們的記憶中也許連一絲淡淡的痕跡都不易存在了。

事隔年餘，忽然「爆」出了一個「冷門」，所謂「新第三方面」，又宣告登場了，這個「新第三方面」不是別的，却是民社黨革新派，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跡，它之爲人注意，不是這人「爆」起了什麼浪花，而恰恰相反，是由於它爆得過度軟弱沒有力量。

年來的「和談運動」，本是在暗地不斷流着的，雖然敵對的雙方誰也沒有明白透出半點口風，顯

意再聞談判，但是隨着局勢的惡化，總有一些憂時傷世，「悲天憫人」之士，在想法子來停止這場如火如荼的鬥爭，傳說中的監委們的三大獻策及范予遂在參政會駐委會上的動議，都是屬於這一類。此外，去冬宋子文南下主粵，也負有撥譚「調人」的使命。所以，去年的最後三箇月中，「和平運動」、「中間運動」，都傳遍港滬，被視為政治上的一種大規模策動。不過這種策動，都沒有正式公開，而且在暗中便告夭折了。

這種策動，曾經以李、馮、蔣為其主要對象，假若他們也可以算是「第三方面」，則這個「第三方面」是少有點力量的。不幸的是「形勢比人還強」，宋子文兩度赴港，並沒有在「親切的會談」中把李蔣策動出來，遠處紐約的馮，雖也屬意「中間」，却不肯絲毫偏右，迨李濟深的「革命委員會」成立，就連「中間」也不存在，從他們的文告看來，這般人也差不多都成了「第二方面」，或者要與「第二方面」攜手了。

在國內，自然還留下少數的「中間」派，可是他們為數極微，力量有限，而且根本被人懷疑——從流亡海外的人看來，他們能够安居京滬，就有可疑之處。所以當民社黨革新派正式喊出要走「中間路線」和重組「新第三方面」之後，警覺之士，立刻就指出又是一種新的「花樣」。

當民社黨分裂之初，革新派是很有加入「民盟」可能的，但「民盟」當時知道他們的多角關係，沒有正式談判下去。去年十月初，伍憲子自滬赴港，也跟着留港的「民盟」人物有所接觸，先伍而來的孫寶剛與民盟人員往來更為密切，可是十一月以後，伍、孫就再也不和這些人打交道了。由這些經過來說，這個「新第三方面」的露面就給人看出「馬脚」，自然不無道理。

「新第三方面」的口號，是從京滬首先喊出來的，口號後面，自然還有行動，行動的第一步，又不外乎多拉與黨，以張聲勢。但據說，在京滬一帶能够而且願意參加這個「新第三方面」的，祇有幾個佛教、道士團體，和若干名不見經傳的「社會賢達」。曾與會琦左舜生對立的「青年黨中央非常委員會」，也可能加入「新第三方面」，甚至成爲主要台柱。從理論上來解釋「新第三方面」和宣傳「中間路線」的，是民社黨革新派的孫寶毅，他先後在伍憲子主編的「人道」週刊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爲「民主、反民主、中間路線與中間黨派」，一爲「何謂中間路線」。本來，孫寶毅也是「民盟」人員，並曾一度擔任「民盟」的中央宣傳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似乎由他來倡導「新第三方面」和「中間路線」是一個很適當的人物，不幸的是他還能安居上海，而且沒有摸清楚「民盟」的整個動向，因此同樣的令人側目。

香港有沒有「第三方面」或「中間派」？有的，不過力量很小，譬如在一個座談會上爲「中間路線」起來辯護的祇有一位「文化人兼工商業家」。

「新第三方面」的命運究竟如何？也許尙未長成，就沒有聲氣了。

宋子文的政治資本

當宋子文就任行政院院長的時候，他享有很大的權力，除了蔣委員長兼任院長的時候外，從沒有宋那麼大的權力，他像白宮中美國總統那樣，在內閣閣議（行政院院會）時總是坐着說話，而其他閣

員（部長）都必須站起來發表他們的意見。他控制着各部會的預算，這就等於間接地控制着他們的工作。他重新掌握他會一度失去的中國銀行，他經由貝祖貽的手又掌握着中央銀行，他對黃金外匯以至證券交易所等比較次要的金融問題，都直接發號施令，決定政策。他經由徐堪部長控制了糧食，經由中紡公司控制了衣料，經由劉攻芸局長控制了敵偽的物資，並經由劉鴻生執行長控制了善後救濟的物資。他的經濟力量伸張到進出口和其他事業，在他直接指揮之下，成立了『最高經濟員委會』，控制全國濟的機構，至少就經濟而言，他的權力是十分鉅大的。不但如此，他是得着蔣主席的充分支持的。過去蔣宋之間雖然會有許多誤會，但自孔氏在中外輿論攻擊下下台以後，蔣宋之間的關係却顯得密切和友好了。在蔣主席無條件支持之下，是有恃無恐的。他可以拒絕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參政會的邀請，不出席作口頭的報告，他可以忽視黨內黨外的輿論，推行他所認為應推行的政策，除了蔣委員長自兼行政院長外，那一個行政院長會有過他這麼大的權力？

他的權力雖大，但也不是沒有限制的。他不能過問軍事，在軍事方面他是要尊重國防部長和參謀總長的意見的。他也沒有過問國共的政治商談，除了一度會與周恩來交換意見外，他對各黨各派的政治協商是完全不過問的。記得前年政治協商會議在陪都開會時，他除了為歡迎馬歇爾將軍一度返渝外，全部時間都在收復區工作。他的興趣似乎是集中於經濟，所以自從國府還都南京後，他在上海的時間超過他在南京的時間。因此對於宋院長的活動，住在上海的人或較住在首都的人為親切。所以在南京觀察對宋院長一年多的工作成績，其實南京的消息或者反不如上海那麼迅速與準確。因為宋院長與其說是屬於南京的，毋寧說是屬於上海的。

宋氏是在日本請降前夕出任行政院院長的。當時宋氏的威望甚大，各方對他的期望甚深。他就任以後，却來了一連串的引入反感的措施。當然，引起反感的措施不一定是錯誤的設施，但引起反感太多，自然就會減低他的聲譽的。

在各種引起反感的設施中，下例幾點是比較嚴重的：第一是黃金存款強迫捐獻四成，存戶應否捐獻，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宋院長的辦法是使變成存戶捐獻的入，也承認有兩個毛病：（一）這個辦法不公平。因為在別的人沒有捐獻時，單獨強迫存戶捐獻是不公平的。在存戶本身，一兩的存戶不要捐獻而二兩的便要捐，也不能算是公平。（二）最嚴重的是這個辦法使政府喪失信用。孔祥熙氏的十多年的財政部長，雖然有很多可以批評的地方，但也有一個——事實上恐也只有這一個——收穫。他的收穫是替國家樹立了信用：在過去十幾年中，凡政府在財政方面所答允的事，政府都是百分之百兌現的。甚至在抗戰初期，政府為着維持信用，還歸還了不少的錢給日本呢！這種經十幾年才樹立起來的信譽，宋院長輕輕地便把它毀滅了。第二是把偽幣折換法幣比率定為二百比一，這等於對收復區來一個突然的通貨膨脹，使整個中層階級都受到嚴重的打擊，使收復區的物價，不能不作跳躍式的上漲。在這個比率決定以前，陪都各報對這個問題都不主張定在二百比一（據說伍啓元氏主張定在一百比一，谷春帆氏主張定在五十比一，沒有人主張定在二百比一），而宋院長決定二百比一的比率。這個比率的後果，大家都很明白，用不着我們多說了。第三是接收偽敵物資時的種種不法行為。這雖不是宋院長所能負責，但他既是院長，則也免不了要受批評。第四是壓低公務人員待遇，而對公務人員提高待遇的要求，缺乏同情的考慮。這會引起立法、監察、司法三院的聯合攻擊。第五是對民族工業

者缺乏同情的援助，結果引起民族工業者的公開的攻擊。第六是對金融界也沒有多大的同情，六月底金融潮中便有不少的人對宋院長有不滿的怨言。第七是對出口業缺乏及時和有效的援助。宋院長從來對農工是沒有關係的，過去宋的主要支持者出自中層階級、公務人員、購買公債和黃金存款的儲蓄者、民族工商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等，但在短短一年間，宋院長把所有這些人都開罪了，因此，宋的聲譽也就一落千丈了。

許多批評宋子文的人，常謂宋無政策，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宋自始至終，對國家財政經濟有一貫的看法，有一貫的政策。他的看法有二：一為今日中國基本問題為物價高漲，而物價高漲之原因在通貨膨脹，在財政收支失衡，在物資缺乏。二為今日中國工業過於幼稚，不足重視，而商業與金融亦然。基於前一種看法，他有三個基本政策：一為財政收入愈多愈好；二為財政支出愈小愈好；三為物資供給愈多愈好。他的黃金捐獻政策，他的許多開罪工商界的政策，都是第一基本政策的結果。他的二百比一的比率，他的壓低公教人員待遇的政策，他對農工商出口金融等業缺乏援助，都是第二個基本政策的結果。他的低外匯政策，他聽任外貨傾銷，都是第三個基本政策的結果。由於他輕視工商業的看法，他對工商業界的責難，是不予重視的。

上述的政策，是宋子文做行政院長時的基本政策，這個政策是否正確，見智見仁，各有不同。在政治上，他原有三種資本：一是美國人的交誼，一是蔣主席的支持，一是他自己的強大金融商業集團。不久以前，各方盛傳他因為要加強自己的地位，可能與某集團發生密切的合作，但事實的證明，他辭掉了行政院院長，去屈就廣東省政府主席了。

太子派威極而衰

孫科先生在國民黨內之所以能成一太子派，而與政學系、CC復興社等分庭抗禮，自然不完全是倚賴乃父的餘蔭，而完全是因為他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作風上，有他自己的一套。所以自從他在民國二十二年主立法院以來，在這十五年內，的確在政治舞台上建立了相當的基礎。

太子派在極盛的時期，陣容本來不壞。像現在賦閑的三民主義理論家梁寒操，與現任中央農工部部長馬超俊、陳慶雲、劉維熾、傅秉常、魏道明、吳經熊、鍾天心、鄧公玄、吳尙賢，以及現在香港寄身李濟琛門下的王岷崙等，都是太子派中佼佼的人物。除了幾個「部長」階級的人不談，太子派中大多數的中堅，均是思想比較激烈的「左傾」份子。其實，太子派的本身，並沒有什麼組織，但過去的「中山學社」，以及在抗戰時期的「中蘇文化協會」倒是太子派號召同志的大本營。中山學社在抗戰時，是以北碚為基地，中蘇文協則以重慶為據點，這兩個團體，雖然在表面上，同是以研究學術為目的，其實，却是太子派的外圍有力的集團。因為，在上述兩個團體裏，不僅網羅了在文化界具有權威的文化工作者，而且還的確培養了不少基層幹部。因為這樣，孫科在縱的方面，是以立法院為大本營，橫的方面，便以中蘇文協與中山學社為外圍的據點，因此而造成他今日赫赫的聲勢，不是沒有原因的。

然而，最近兩三年來，由於許多的特殊的因子，和其他各種利害的關係，先是梁寒操與孫科分了

手，後來馬超俊也與孫科離異了。梁馬兩入，本是太子派中的兩員大將，但是，現實的教訓，與政敵的離開，終於使太子派由隆盛而中衰，從彗居而分離，這是太子派的悲哀，也是太子派的危機。現在馬已倒在黨方面負責人的懷裏，前次馬超俊之所以會當選中常委，便是得力於黨方面的支持；故在某次中全會選舉中常委時，馬超俊居然當選「常委」，不僅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就是孫科本人，心裏也很感到詫異；後來知道了這一回事，當然對老馬不舒服。然而，孫科也無可如何。至於梁寒操，現在與某系也拉得很好，故這次梁之夫人黎劍虹競選立委，一度被張厲生提名，而孫科却加以反對，便可看出一點人事的糾纏。但梁仍竭力與孫科維持友誼，徘徊在兩大之間，譬如最近孫科競選副總統，梁氏爲其向各方奔走，即是明證。

最近，立委選舉業已竣事，但太子派支持的人，却紛紛落選了，不僅新的未選上，就是「老立委」，也大都名落孫山。譬如，現任立委而又是財政專家的衛挺生，競選立委，也未能成功，像這一類例子，在此次大選中，真是多得不勝枚舉！因爲，將來的立法院長，是要經過民選後的立法委員會中互相遴選產生，如果自己所屬的立委佔的名額不多，則將來選舉立法院長時，恐怕沒有什麼把握。這樣一來，孫科不由得便無名火起，而大罵這次選舉的舞弊了。孫科曾經向人說過：「我副總統所以不幹，但立法院長却不願輕易的放棄！」從這一句簡單的話裏，你便可以意會出孫科的目標，也可以體驗到孫科憤懣的程度了，加之與孫科接近的魏道明，又在台灣處境甚危，不斷報警。凡此種種，莫不使孫科痛苦、煩悶、焦躁，從太子派的分離到太子派的失勢，也多少可以窺測中國將來政治上的風向是如何的了。

非正式商談的前前後後

自從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月底兩度休戰以來，停戰問題就膠着在有條件停和無條件停上面。政府主張要停戰是可以的，但要先獲得解決幾個其他問題的保證，當初政府提出了五點，後來改提了八條，最後表示先交國大名單再講。但政府某代表旋又表示：要獲得停戰，其餘七點還是要解決的。雖然不一定要中共形式上表明接受，但實際都必須辦到。

中共從要求拿保證停戰作為參加非正式五人小組時起，到同意第三方面提出的「談、停、談」的程序止，始終主張必須無條件無限期停戰，對政府提出要先交國大名單的意見堅決拒絕。并且表示交一部份，甚至幾個人也不行。

在張家口和安東相繼為國軍進佔以後，很多人對中共是否還是主張無條件停戰，已表示懷疑。有人以為中共必然不再堅持，而可以適當的接受一些條件了，有人以為中共一定更氣憤，更堅決，不會再同意無條件停戰，或者要提出相反的，要政府如何如何的要求了。然而這兩種揣測都錯了，他們還是咬定了那句話：「中共要求立即無條件停戰」，不過這句話好久沒說了。

不過無條件就地停戰和在今後駐軍區域上是否承認，依照那時的情形是很有距離的。因此，政府在沒得到別的權益的保證前，仍是不同意先停戰再談的。雖然政府一再說明要用和平方式解決國內問題，但是既然政府擁有優良的裝備，在政治上不能滿意解決前，是不會放棄繼續拿武力形成一些既成

事實的。

關於國大，表面上擱淺在交不交名單上，實際却是爭執於它的召開符合不符合政協原意。在政府的立場上，這多年受盡了在野黨派的指責，說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及早召開國大，制定憲法，對人民，對國際說起來，都比目前更好。而且已頒佈的日期就要來了，國際上正在舉行的聯合國大會又是一種迫使中國在國內問題上應該表現得更好的因素。事情實在是火急了，無怪乎政府表示只要交名單，就是先交幾個政協代表的名單作各方的國大代表也好了。

中共認為當初五月五日的日期是政協追認的，後來延期是綜合小組的意見，再定期應由各方協商決定，而且增加名額的分配，也還沒有最後決定，要交名單，也只能交給改組後的政府。現在不但不能接受十一月十二日的約束，而且行政院不和國府委員會同時改組，政府就沒有改組完成，就沒有交名單的對象。

問題又涉及到政府改組上來了，政府以為國府委員會可以先行改組，但行政院只能在國大以後再說。中共却認為這是不合政協決議的路程的。

因此有人說：「中共真是，為什麼轉一點小灣都不行，非直挺挺的走？」也有人說：「政府真是，為什麼不直着走，不轉一個灣呢！」

各方代表趕到南京的時候，第三方面宴會時，陳立夫先生和周恩來針鋒相對的一幕，大約就是對國共雙方的回答吧。陳立夫先生說：希望大家不要只顧小節，而注意大的關鍵。周恩來說：主要的固然是在大關鍵上，但小問題也不能不注意，比如X加Y等於四，然而如不追究X是幾，Y是幾也是不

行的。

不僅國共雙方在國大問題上相持不下，第三方面也不同意即時交出名單。在上海呢，第三方面就已互相保證，如不按照政協決議的程序，絕不交出國大的名單。在南京見蔣主席時似也表示過同樣的意見，雖然苦口婆心的第三方面沒有公開表示意見，怕使局面更僵，但是，事實已很少再有迴旋的餘地了。

對第三方面建議召開政協綜合小組或非正式綜合小組，政府雖沒有公開答覆，但大概是未曾同意的，否則，第三方面不會只表示重視和還要開會研究呢。這個新建議和他們過去的努力——宣傳休戰，和平方案一樣，就要寂寂無聲了。但這並不是第三方面的失敗，因為此來原就是抱着「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來的。雖然，這是中國人民一個可悲的結果。

好事多磨的國民大會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三日，國防最高委員會在國民政府主席辦公大樓三樓舉行，到吳鼎昌、陳立夫、白崇禧、陳誠、邵力子、梁寒操等二十餘人，蔣主席親臨主持，通過了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又通過了政協五項決議有效，具體辦法，另行擬定。可是中共與民盟都說這是政府片面的決定，沒有經過各方面商量，也沒有經過綜合小組來討論，要求保留對此問題的發言權。

在抗戰期中，國大問題也會熱烈地討論過，二十八年九月九日開幕的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中，對這

個問題會作如下的決定：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同年的十一月間國民黨六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有關國大的決議，即定於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可是因為準備的不充分，與代表性的不完整而改期，這却提高了人民對這問題的關切。在大後方，在敵後的游擊區，都展開了對民主憲政的研究，可以說是因參政會第四次大會與六中全會的決議所刺激發起來的。

三十五年一月十日的政治協商會議，對國大問題也會引起激烈的爭辯，在一月十七、十八兩次會議中，政府代表張厲生、邵力子、陳立夫，中共代表周恩來、鄧穎超、陸定一、吳玉章，民盟代表章伯鈞、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青年黨的會琦，無黨無派的胡政之、邵從恩、郭沫若、錢新之、王雲五等都熱烈發言，首先，由政府方面提出關於國大問題四點意見，第一點就是定三十三年五月五日召開國大，並由張厲生作口頭說明，中共方面由鄧穎超代表發言，猛烈抨擊國大組織法與選舉法的合理。她說：由這兩種法看來，很顯然地看出代表不是完全由人民直接普選的，而是由一黨主持的。並且舉出了選舉法第四條的規定：「背叛國民政府，經判決尚在通緝中者，不能有選舉權」。鄧女士說這明明是十年前對中共而言的，現在更不合適，整個的辯論焦點在舊代表的有效與否上，一直到周恩來起來作了一個明確的聲明說關於舊代表問題，只要在別的問題上找到了好的民主的出路，那末中共承認舊代表有效，雖然違背民主，人民或者可以諒解，否則對人民就不好交代了。他作了這樣一個聲明，會場的空氣頓時和緩下來，後來雖然有陳立夫與陸定一兩人因「三三制」起了一番辯論，又因張厲生發了一些題外的感慨，引起張君勱的火氣，可是終算討論完畢，而在一月三十一日獲得了關於

國民大會的八項協議，大家同意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開國大，緊接着的二中全會，對政協決議作了一個通盤的討論，對於憲草原則的協商修改原則又作了一次修改。吳稚暉提出三點很硬性的議案，大大地修改了政協的協議提案的第一點說：制憲之權責，屬於國民大會，無論何人，不能限制國大代表之法定職權。中共在三月十七日發表了一篇談話，反對對憲法原則的決議有任何修改，國共兩方的爭辯延長了一個多月，中共發表在政協會中所決定的憲法原則未得保證前決不參加國大。國府還都的前夕——四月二十四日蔣主席在國民政府茶會招待政協綜合小組的全體代表，政府代表全體出席，中共由周恩來代表，首先由主席致詞，繼由張君勳發言稱爲顧及現實，國大應延期，周恩來、傅斯年、會琦、王雲五亦發言贊同延期，蔣主席即席表示五五國大延期舉行，王雲五曾發問延至何時？主席答以俟各方面問題解決後再召開，並稱國府自明日（四月二十五日）起停止辦公，希各黨派代表同時進京共商國是。主席這一果斷英明的決定，博得全國人民熱烈擁護，可是南京早已到了不少代表，還有一部份代表乘上國大代表專輪赴京，在途中得到延期的消息，非常激動，記得孔庚老先生在國大代表專輪——民裕上面，激昂地說政府不開，我們自動開，並且就在船上忙着發電報，寫信到各地，通知各地代表即日晉京，自行召開國大，已在京的代表們也有同樣表示，在南京的一次茶會上，邵力子先生幾乎被代表們毆擊了，因爲他們要求召開準備會，邵先生說於法無據，結果還是由蔣主席親自解釋一番，才沒有「自動召開」，代表們就借這個機會，到各地觀光去了。

從此以後，國大問題沉默了兩個月，談判復談判，政府終於七月三日宣佈十一月十二日爲國大日期，另一方面，中共也一再非正式表示，如果政府單獨召開國大，共產黨也將召開「人民大會」，以爲

對抗，因此直到雙十節那天，一般人還想像國大可能又延期，而第三方面的調解方案，也是暫緩發佈。國大代表召集令爲要求，却不料十月十一日的局勢急轉直下，這一天，下午二時國軍攻克張家口，最高當局接到陳誠總長的電話，五時即召集吳鼎昌、陳立夫、吳鐵城、陳布雷、張厲生五人談話，斷然決定十二日頒佈召集令，下午八時，彭部長發表聲明，許多要人，連邵力子先生事先都沒有知道。

林世良之死

孔蘇熙先生的太太宋瀛齡女士，她雖不是當今大官，却有極大權力。女兒「孔二小姐」，更是喧赫一時的貴千金。孔太太說得一口流利英國話，早年曾當過孫總理的英文祕書，她極善經商，從經商中掙起一份鉅大家財，真是富可敵國，但是她並不滿足，更不停地興風作浪，她是今日中國官僚資本的權威，並且也是每次政治發生重大變化幕後牽線人。她對於她的丈夫很滿意，滿意的原因，據她自己對她的妹子宋慶齡說：「庸之很聽話，很會做生意」，她手下有一羣做生意的忠實幹部，林世良就是其中的一個。林世良跟她當了幾年夥計，也是因爲「很聽話，很會做生意」，蒙她的女主人用她丈夫的職權，提拔他去當中央信託局昆明分局的經理。昆明在抗戰期中，是一個經濟重鎮，當着我國唯一國際路線——滇緬路的吐納口，是發國難財大腹賈的掏金地，當然也是生意眼的重要據點，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民國三十一年仰光失守，緬甸情勢危急，我最高當局下令滇緬路停止商貨運輸，途中車輛無論官

商所有，一律搶運存緬軍用品撤入國境，因此滯留在緬甸首都曼德勒及滇緬路之轉運站黃了兩地商貨，堆積如山。如有人能運一車入國境，即可大發其財，這正是最好的良機。林世良奉命以昆明中央信託局名義派汽車四十輛，由緬甸裝運貨物入國境，車到昆明時，突被軍統人員查獲扣留，電呈蔣主席請示。林世良着了急，一面報告孔夫人，一面漏夜塗改昆明中央信託局帳簿，據說這些貨品都是公家的。蔣主席接到戴笠的報告，並且知道所扣四十大車的商貨，都是些奢侈品，盛怒之下，立命軍法總監何成溶將林扣押，解滬審辦。林在軍法庭上，抵賴不過，他相信他的主人是有辦法的，於是很祖直的供了出來，這四十大車奢侈品是他的主人孔夫人所有，他是奉這位女主人之命而這樣做的。軍法官似乎是一位患着重聽症的，他只記着「中央信託局昆明經理林世良利用職權經營商業」，孔夫人聞訊立派丈夫孔公，兄弟宋公二人，去軍法執行總監力保，何總監以案關蔣主席交辦，未便釋放。孔宋二公乃請何幫忙將此案拖擱，蔣主席以此案多日未見呈判，他猜到了擱淺的原因，於是示意給大公报主筆張季梵。第二天，大公报的社論猛力抨擊此案，要求政府立刻槍決林世良。蔣主席指着這篇社論對何成溶說：「你看，外面輿論如此，你快把林世良判了死刑，呈上來核批」。

第三天判決書呈送蔣主席核批，却把它放到普通公文中去，這當然是孔夫人的神通廣大。時正中午，馮玉祥將軍突來求見，蔣見馮滿頭是汗，手中提着光亮燈籠，怪而問之。馮答曰：「外面盡是黑暗，我在黑暗中急行十里，進了主席房間，始見光明」。說畢，將燈籠吹熄，置將主席辦公桌上，蔣聞言，立召軍法總監何成溶入室，以手令與林世良判決書付何曰：「限你在一小時之內，將林世良執行槍決，如逾時未執行，我不槍斃林世良而槍斃你」！至此，何得奉命執行。

等到孔夫人與孔公聞訊趕到蔣主席那裏，林世良已直挺挺的倒在刑場上了。

外交界登龍術

我們的老大貴國，自從滿清末年，開始和「友邦」接觸，賞識了外交的重要以來，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直到如今，將近百年了，究竟出了多少的外交人材呢？在滿清手裏，除了曇花一現的郭嵩濤、曾紀澤、薛福成等外，還不是始終靠着李鴻章在撐持！等到滿清倒了，總理衙門，由外務部演變成外交部，民國初期支持外交政策的人物，如唐紹儀，孫寶琦這些老先生，也都還是清朝的「遺產」呢。

好容易出來了一個顧維鈞，憑藉着優越的背景，因緣時會，平步青雲。北洋政府的全部外交史，也不過是他和退休了不久的顏惠慶飾靡基這幾個人，走馬燈般的來來去去而已。

革命又革命，一直到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承繼着資志以歿的伍廷芳來策劃「黨」的外交的，就是現在外交界唯一的元老王寵惠先生，純粹革命產兒的外交家，除了他之外，就祇數得出郭泰祺和現任外交部長王世杰了。

第二次大戰結束，再開和會，眼見人家友邦，幾乎都是新角出台，出席第一次和會的老前輩，不是死了，就是耆老讓賢，給下一代的英雄來表演，回看我們呢，却仍然仗着兼兼二毛的幾塊老招牌，在那裏撐門面！難道說我們就當真培養不出新人材來麼？並不一定是絕對沒有。譬如說：高致出身的

現任駐暹大使李鐵鋒，和現任常務次長劉鈞，就都是在這十年之間崛起稱雄，由部曹躍居首要的。不過，這樣的例子畢竟太少了，都在聽鼓畫諾；蓋章拿錢之間，消磨了有爲的歲月。

事實擺在眼前，外交人員任用的水準，確是高於其他機關。除了歷任首長到任時，帶進來的極少數的幾個入外，新糊塗的吸收，不外乎兩條大道：第一條是高考及格，分發來部，因為高考及格的人照例先要在中央政治學校受訓的，所以由這條路登龍的人們裏，就包括着中正校外交系畢業，分部實習的學生。另外一條路，就是外交世家和元老勤貴的子弟，依其志願而投身於外交界，像這一類的人，與前清的「恩襲」「蔭封」，頗爲相類。他們憑藉父兄的勢力，要想投入外交界，當然易如反掌，因爲平素家庭聞耳濡目染，薰陶有素，所以以外交爲職業，倒也合式。就是素以文官制度嚴密著稱的英國，在挑選外交人員時，也特別注意於勤貴子弟。前一類的人呢，當然就相當於從前的「科舉出身」了。這一勢力的發展，起始於徐謨任外次之時。徐氏本人，就是三致出身，由學習員薦升到校長的。一朝在手，要想爭得羣衆，就替高致出身的人，打開了這一條門路。因爲徐氏任外次最久，所以高致出身在外交界的地盤，打得很穩固。從這兩條路投入外交界的人員，分別系統，自成集團，像墨聚嚴，勢同水火。「蔭進來的」，把「考進來的」看作半瓶醋晃盪驕酸，「考進來的」把「蔭進來的」看作不知天高地厚的執拗，可是知道內情的三者看來，平心論斷：兩個集團裏，各有其出類拔萃的人物；也未始沒有其混混噩噩，吃飽了飯專等拉屎的驕橫。優者自優，劣者自劣，這完全是個人的問題，與來路怎樣，毫不相干。

不管是「考的」也罷，是「蔭的」也罷，既然水準比一般都高，怎麼還是造就不出新的幹材，來

繼承前輩的事業呢？第一、歷年來的戰爭和物價高漲，逼得這一般初創事業，基礎未固的青年人，喘息於生活的重担之下，他們覺得中國之大，竟沒有他們可以安息的地方，外國雖說也有有限價、黑市、計口受糧、憑證購物等種種不便，可是比起中國來，還是天堂，所以唯一的希望，就是早點「開放」，出國享福！外交部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凡是初入外交界的人，必須在部裏練習一個時期：「譬如說，一年吧，——方得「開放」。就是在國外三年住滿，調回來的人，也須在部裏混過一年，再行外派。原來的目的，是要外交人員，多知道些國內情形，免得到了外國之後，祇知道說：「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用意不可說是不深；法則不可說是不美，可是大家都把這「一年」的時限，看作有期徒刑，有辦法的人，千方百計，所求的是「破格」，「提前」，萬一到了一年期滿，還沒有出國的喜訊，就不免要長呼短嘆，萬念俱灰！外交人員的圈裏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譬喻，說是：進外交界，就好比是在街頭等公共汽車，僥倖得以錄充部曹，就和排上了隊一般，總可以有上車的希望，至於早一刻，遲一刻上車，其間變化因素太多，誰都沒有十分把握，甚至於等你好不容易輪到掛頭，忽然來了一個蠻不講理的大漢，把你擠得後退一步，也都不算是意外的事。等到一紙令下，調補外缺，其心緒恐怕就相當於候輪船等車的人，擠上了車，聽得一聲哨子，絕塵駛去，在這種情形之下，外交人員的唯一目標，就是「出國」；所講求的手段，不外乎「奔競」，「鑽營」，更能夠有什麼餘暇，可以把心情安定一下，研究研究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呢？還有熱中於榮華富貴之流，爲了「出國」，更不惜降格相求：外交部頂頭上級機關的堂堂參事，爲了「出國」，可以屈尊俯就他平常所不屑一顧的總領事缺；以外交爲終身職業，熟了半輩子，應該當大使的人，爲了「提前出國」，也可以不卑小官，欣

然去當公使。

第二、人事上的牽絆也會影響了新外交幹部的產生。外交系統的人事制度，在政府的任何部門中，算是比較上軌道的，但是仍然不能做到完全合理的地步，代表一個國家，長期駐紮他國的外交代表，假若不是熟悉國策，技術精深的人物，是絕對不能勝任愉快的。現在放眼一看，我們的外交代表，有許多是冒充的腳色，所見到的是；不甘閑散的中央委員；因故去職的將軍；某名公的舅子，看吧！說不定將來國大代表名額內所安插不了的社會賢達，也要以出國充當大使公使爲出路哩！固然，政務官的任用，在公務員任用法裏是有明文規定，不限資格的，大使公使都是政務官，所以政府對於他們的任命，是有選賢任能的絕對自由，不必一定在計資循序的外交人員裏去挑選的。可是，在這種「拉到籃裏就是菜」的辦法之下，究竟提拔了多少外交方面的賢能呢？這一羣在國外獨當一面的新貴，一方面既沒有法子叫他們去折衝樽俎；另一方面他們却阻塞了不少在外交界裏磨白了頭髮的人的陞遷之路。資格較深的人，尚且上不去，資格較淺的年青人，是不問可知，更難望有翻身之日了。

在本身的頹廢和環境的壓迫這雙重的斲喪之下，外交界縱有可以培養的幼苗，也早就枯死了。不信，請看民國以來外交界的情形，我們幾時才能看見中國產生一個像威廉底特這樣的外交家出來。

馮玉祥的得意傑作

馮玉祥將軍有一手拿手戲，他會用一句話把千萬士兵說得服服貼貼，也可以把一句話說得士兵們

勇氣百倍。在民國十五年時，他與中央對抗，中央軍飛機去轟炸他的隊伍，士兵們對飛機恐懼萬分，一聽到飛機聲大家亂逃，馮於是把全體士兵集合起來訓話，他說：「我們頭上的鳥，比飛機不知要多多少，鳥在空中拉糞，尙且沒有拉到我們的頭上來，我們還怕這一二架飛機來投彈嗎？」士兵們大家想一想，果然不錯，以後有飛機來大家就不再慌亂了。

三十一年他到江津縣白沙鎮（是四川省有名的大鎮）去發動良心救國捐獻，他召集了當地萬餘個老百姓，叫他們在烈日下向大資本家下跪，非得到那位大資本家認捐了一筆大款不起來。馮很會隨機應變，腦子非常奇巧，那一天他召集該鎮學生（抗戰時學校內遷，該鎮雖小，而大中學校林立）要他們去義賣，但他並沒有義賣品交給學生，這豈不是文不對題了嗎？不，他自有他的異想天開的妙法，他先對學生來一下情感的激動，說：「救國八人有份啊！學生是救國的先鋒啊！他看到學生們大家都激昂了，於是他把言詞轉到正題上，他說：今天我召集大家去義賣，爲什麼不把義賣品交給你們呢？這就是要測驗諸位同學愛國的程度如何？既云義賣，則義賣品當然不必限制，隨便什麼都可以，譬如你們身上穿的襯衫啊！背心啊！都是很好的義賣品。」詞猶未畢，全場的學生，大家紛紛把身上的衣着或日用品騰出一件來，拿在手裏去義賣，引起一般入的同情與興奮，一霎眼，每個學生都獲得相當好的成績，總數很驚人，馮將軍非常得意，接着他就開始向那些出錢買義賣品的入宣傳了：「諸位都是熱心愛國人士，以極大的代價購買不值錢的舊東西，可敬！可敬！諸位要曉得這些義賣品都是這班窮學生身上脫下來的破襯衫，舊背心，諸位拿去沒有用，他們少了要受凍，還是請大家還了他們吧！」結果，這些義賣品又重新回到每個學生的身上了，學生高聲呼着：「馮副委員長萬歲！」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馮在重慶有一幕滑稽的演出，據說他是爲了看不慣當時在渝的那些大入先生太太小姐們的奢侈，他上了一個呈文給國民政府蔣主席，呈文內容如何，我入雖無法探悉，但在國民政府公文收發簿摘由欄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登記着：「爲呈請准予購買豬肉三斤山」。這種舉動大有淳于髡之風。

記民社黨南北內訌

在國共談判之際，國大召開之前，幾個黨合組成了民社黨，這一個新黨的出現，早就有人意味到民盟內部將再有一次新的分化。國共兩黨的爭衡，是棋逢對手不相上下，可是在他們爭衡的天秤以外，依然堆着一堆大大小小的法碼，即所謂第三方面，待他們爭取與運用，這一堆法碼，越拿越小，而價值也越大，最後最小的法碼，必是一個決定的法碼，兩大之間難爲小，總使第三方面精誠團結，潔身自好，始能絕對保持超然的地位，在國共兩黨黨性發揮盡致，而不惜以人民所不喜歡的手段與做法，來謀壓服敵黨的時候，是否由於第三方面的斡旋而有補於國事，却是一個未知之數。「只准成功，不准失敗」，不過是國人的願望而已。如果第三方面一再分化，天秤以外的法碼，越拿越少，增加法碼的一方，氣餒增高，沒拿到法碼的一方，羞怒譏罵，雖然最後的法碼價值增高了，而她能使得雙方平衡的力量無疑的愈小了。哀哀的小民困不在一起，說不出話來，國家人民只有做黨爭的犧牲品。

民社黨在南方倉卒組成，北方的老黨員雖與聞其事，多未前往參加，南北老少當然步調難趨一致

，民社黨提了國大名單，北方老黨員即表示不參加，共產黨說張君勳先生本人的不參加，是「妓女的貞操」，國民黨方面也有人在竊竊私議，說他們是腳踏兩頭船。民社黨的參加國大，顯然與民盟的裂痕更深了，而民社黨本身也呈露着分裂的跡象。民社黨面對着這一個困惑的問題，南北信使往還，力謀打開這一個爲參加國大而招致來的本身的分裂。

號稱民社黨北方三元老之一的梁秋水，他並不是北方人，原籍廣東肇慶，生長在桂林，十七歲時來北平，後又到上海入愛學社讀書，因參加反清運動流亡日本，曾入早稻田大學讀書，後來又去美國，轉往檀香山，在檀香山一方面辦報，一方習英文。他自稱在檀香山三年的生活，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期，因爲那時有一位美國的老密斯很賞識他，來教他讀書，給予他很多的幫助。民國改元之後，他回到北京來，做了十年的報人，先後編過「晨鐘報」及英文「北京導報」，隨陳友仁編英文京報華文版時，因爲反袁，曾受過袁世凱多次的警告與威脅。他現在六十四歲的人了，已經兒孫滿堂，眼睛不甚好，談到過去辦報時的情形，時常提到他寫文章怎樣，似乎對自己的「才氣」很自負，脫不掉中國新聞事業初期才子玩票辦報的色彩，據說民社黨還有意思辦個機關報，請他主持筆政。殊不知現在辦報是自己認識問題，幫助旁人認識問題的時候了，已經不是才子玩弄筆墨的時候。他從十三年閉門家居，二十年的光陰是怎樣度過的，頗使人納悶。他的住宅裏佈置得古香古色，據他自己說，他非常的喜歡北平，愛好一個個的小庭院，佈置上一些小花草，他斜在他自己的客廳的暖閣裏，似乎與那裏的一切都很調和。因爲他不贊成民社黨參加國大，拒絕張君勳邀他南下的請求，賦詩言志道：「多謝故人珍重意，久甘岑寂舊生涯，愧無三徑能種菊，猶有一畦堪種瓜。漫道鸚鵡爭腐鼠，却憐彩鳳逐羣鴉

，聞來誰與謀排遣，日過南城賣酒家。」他的詩和他的態度，競爲北方各報刊載，於是他成爲新聞人物了，多少人去追他，可是也追不出什麼來，大雪節前一日，一夜西風緊，突然有了梁秋水胡海門南去的消息，這該是民社黨一個將有新發展的信號，又促使大家對他更大的注意了。

也算是巧合吧！梁胡南飛前二日，東北經委張主委張公權飛到北平來了，張氏對目前時局拒不表示任何意見，他到北平的當午，就由梁胡兩氏到西郊燕大將張東蓀先生接來東城史家胡同梁秋水的家中，從下午三時起，張、梁、胡、張四人就長談了三小時，七時由張公權作東同去萃華樓吃飯，直至九時始散，有的記者當晚追逐到了他們這個「起居佳」的活動，有的還不知道，標題上寫作「張公權蔣晤張東蓀乎？」

他們四人談些什麼呢？外人不易得知，次日梁秋水向八表示，張的北來，係願便向他們傳達乃兄常時決定民社黨參加國大的經過，並沒有旁的意思，記者曾詢梁氏，張先生對和談的看法如何，他說：「張先生認爲還有恢復的希望」。張氏來平，很明顯的是爲了回東北，可是在這個當兒，就增加了很多人的臆測，梁氏曾向記者表示，他們的南去，並非決定於張氏北來之後，可是他們的飛機票倒在前兩天由東北經委會北平辦事處代爲洽購的。張來當然不是啣有政府使命，對北方民社黨人士有所接洽，也不是爲乃兄代促梁胡南飛，不過傳達了一番乃兄決定民社黨參加國大的經過，自然會增進北方民社黨人士對乃兄的諒解。有了初步諒解，益加堅定其南飛意向，因此民社黨也有了調和南北老少的轉機，由黨而國，自然對國事還要推動一步。怎樣推呢？推向一個什麼方向呢？這得看民社黨演完「南北和」的一幕喜劇以後了。

梁胡東南飛第一日下午九時，他們在史家胡同招待記者，記者們去了，是梁秋水一人在那裏，兒孫隨侍在側，他說他預備發一個書面談話，書面以外的話不希望發表，但是書面談話遲遲不拿出來，說是由旁人抄寫去了。大家坐着無聊，就圍爐閑談起來，梁氏很健談，同大家談他過去的歷史、讀書、教書、辦報、到北方來、去日本、在美國等，這天是北平入冬來最冷的一天（零下十度點七）外邊的風嗚嗚的響，屋裏也有些寒意，過一點鐘比梁秋水長一歲的胡海門老先生來了，長髯憂癯，前額有點像沈鈞儒。又過一會短髯的中年人陳班侯來了，攜來了梁秋水的書面談話，顯然那篇談話是經過什麼人主稿，又經過審慎修正過的，交給胡氏過目以後，大家將椅拉開，梁氏面向北，記者羣坐在對面，在宣讀書面談話之前，當然梁氏還有幾句前言，那位憂國憂民的老人，具有辛亥及五四時代的典型，說到如果不怎樣，即將亡國滅種時，幾至涕淚交流。前言說過之後，由站在梁氏椅側的他的哲嗣宣讀書面談話。宣讀完畢，記者們當然還有的提一些另外的問題，有的是關於整個時局，有的有關於民社黨的本身，多數都在旁敲側擊來探詢張公權同他們談話的內容。梁秋水是個神經質的老人，他很喜欢說話，而胡海門與張班侯則時常怕梁氏把話說多了，一邊盡力的給他開脫。有人問「張公權是國民黨員？」他們說，「不清楚」。「張氏兩弟兄（指君勳與公權）對時局的看法一致嗎？」答以「差不多相近」。「有多大距離？不同的點何在？」又答以「不遠也不近」。丈八的和尚使人摸不到頭腦。更有人直爽的問：「張公權先生算國民黨的外圍呢？還是算民社黨的外圍呢？」答以「都不算」。胡海門是民盟盟員，（據說民社黨僅有民盟盟員十餘人）梁秋水並不是民盟盟員，談到將來民社與民盟的關係，梁秋水倒說：「宏仁堂同仁堂都是藥家老店」。從他們的談話中有人做這樣的推測，北方民

社黨員不參加國大之主張，以梁秋水爲最強，胡海門爲次強，張班侯則是隨他主張不參加的而希望能一致參加的人，這推測正確與否無法證實。談話越扯越遠，不知怎的談到婦女參政問題上來了，梁氏主張婦女不必受大學教育，當然更談不到參政，胡張的意見不同，他還說：「這話不能在張申府先生面前來講」。民社與民盟如果和談機會重來，共同致力和平工作是不可能的，但從種種跡象上看，確已難期「百年偕老」，就是他們的書面談話中，也透露出一點弦外之音來。

書面談話是以梁秋水一個人的名義發表的，胡張當然是百分之百的支持贊助這個談話的人。梁氏書面談話全文如次：「我們此次赴滬，係因二日接張君勳伍憲子兩先生有急電要我和張東蓀胡海門三人同去商談一切，大概是滬方已得海門先生的去函，知道我們既有脫離黨的意思，上海方面，遂已深切感覺到這一次事件：是完全起於黨的不健全，乃有重新整頓的意思，我們以多年友誼，故甚願貢獻一切關於整理的意見。所以此行決不談憲法，亦決不談政府改組問題。至於政治方面，是否恢復商談的時期又到來，現在未能懸斷，萬一能有這樣的機會，我們亦願隨同愛好和平的國人，爲之呼號，甚至於從事奔走。因爲我們以爲這十年來，全國人們犧牲生命財產，爲的是抗日圖存，萬料不到敵人投降以後，內戰反從此爆發，試問此次內戰，爲的是什麼？爲的是誰？今日人民的痛苦，視十年來抗日更加十倍，長此下去，非到亡國滅種不可。老百姓死光了，我們還談什麼政治，更談什麼黨。故今日問題，只有和平，才是國人的生路，任何問題，至低須建築在人民安居樂業的條件上。別人以黨爲重，本黨則願犧牲黨以爲國爲民，個人更願犧牲一切以爲黨，先謀黨的團結，再謀國的和平，由和平而得統一，這是於現政府最有利的；所以願在這一方面多盡一些力。關於整理黨事，我們尤注重一個原

則，就是要特別提高其中立性，因此對於和民社黨有關係的民盟，我們亦要求其自動加重中立性，倘使外間所傳太偏於另一方面的確是屬實，則本黨更應提高中立性，保持第三者立場，我同海門先生先走，東蓀先生隨後就來，因為他有學校功課，非覺得代課者不能離開。以上所說，是我們在此處所見到的，最後則需交換意見，方能有所決定。」

軍人政治家黃紹雄

六尺高的軀幹，寬廣的腰圍，却有一雙秀美的手，差不多常常出現在籃球架次，網球場邊，這就是我們要談到的黃季寬將軍。他是極少數懂得政治的軍人之一。他喜歡運動，打得一手好網球，如果全國軍人來一個網球賽，他無疑的可以穩獲冠軍。——他的打球老搭擋是一九二五——二七全滬網球錦標郭啓達君。不久以前，上海網球錦標賽請他行開球禮，他來一記強勁有力的發球，有目共賞。

白健生將軍不同意他這玩意兒，對他說：網球運動不值得提倡，中國人玩不起。他回說：可是我不能因為老百姓坐不起汽車，就提倡人力車，牛車呀！

他今年五十二歲了，可是體格矯健，還可以在球場上奔馳，還可以主持連續十小時以上的會議，或者講三個鐘頭的話，講不在乎。

民國以來，出現了一批軍人政治家，有兩種典型：一是「封建割據型」，羣圍是固，個人英雄主義發揮到了極致，如韓青天閻百川馬鴻逵等皆屬之；一是「正統死硬型」，一脈相承，牌頭茶硬，殘

殺報人，糟塌百姓，如某某等皆是。

黃季寬氏在三十左右，即以亂世英雄的姿態，奪得廣西政權。自任省長。二十年來先長內政，後長交通，一度主鄂，兩度開府浙江，前後任封疆大吏凡十五稔，黃氏闢修甚專，加上實際經驗，故對政治了解頗深，尤諳治理，與一般半瓶醋的軍人不同。有一個縣長於督見時，大吹政績，天花亂墜，辦了多少學校，多少合作社，他僅僅描淡寫的問：你有多少錢。

東南日報南平版社論及黃氏，指為「在全國軍人中資望最深，氣度最闊」，確是有見而云然。最可稱頌的，是他的民主風度，他主浙十年當中，東南日報對省政設施，抨擊不留餘地，他從來不以為忤。有一次黃氏召開全省行政會議，東南日報甚至出專刊來罵，並派一個記者去覘黃氏的態度，黃氏告訴那個記者說：報紙能够正面批評政府，這是社會一個大進步，不過程度上還不夠，希望能够做到輿論可以強制政府做他所應該做的才好。不由得叫人傾折他的雅度。

黃氏御下甚厚，信任甚專，所以他的幹部樂於為他效命。抗戰初期，軍風紀第一巡察團巡浙江視，收到很多狀紙，其中什九是控訴各縣縣長，巡察團據以公開批評浙江吏治不好，黃氏即在紀念周上予以答覆道：「被控最多的縣長往往就是最好的縣長，抗戰時期，一個好縣長要推動政令，不能不得罪於巨室，就不能免於被控，一味敷衍的縣長和土豪劣紳打成一片，反而不會被控」。事實上當時被控的縣長確有很多循吏能員在內，一時省府同巡察團鬧得很僵，

二十三年會受命宣慰蒙旗新疆，跋涉萬里，歸來之後，深以邊垂僻遠，國家顧長莫及，會草萬言書，請纓經營新疆，如左文襄故事，使邊民內向，中央可紓西顧之憂。蔣主席甚為嘉納，命計劃進行

，黃氏當時請准派兵五師，經費五百萬，卡車數百輛，以交通不便，擬一面前進，一面築路，路綫的勘定，蓬帳的設置，都有了眉目，突奉令停止進行，黃氏大受打擊：後來才知道有人進讒，每當邊疆有事，輒附膺長嘆，以爲國家籌邊之疏忽。

未幾，楊暢卿被殞，黃氏奉命繼長湖北。

抗戰聲聞，他受第一戰區副長官，助閻錫山防守三省，氏富於韜略，惟以部隊作戰不力，娘子關一役，頗受挫折，氏頓萌辭意，乃有長浙之命。

第二次長浙，適在抗戰時期，以掣肘孔多，精神上彌感苦痛。省府之內，民教兩廳長均非黃氏親信，黃氏的左右手原任民政廳長黃克強，被勒令去職，氏以不攝兵權，大敵當前，措施艱難，他的政敵，所以打擊之者，無所不用其極，以黃氏起厝青年，作風開明，詔其「容共」，（其實當時國共合作，無所謂容共也）而以周恩來返浙省親，使此一風波，發展到了頂點，當時黃周一舉一動，皆上達天聽，兩氏在天目山作外交儀式上之談話，竟有八報告：兩入密談竟嘗云云。事後黃氏深感鬪讒之苦，幸中央信認弗衰，乃免於厄。

黃氏爲桂系軍人，與李白黃又爲保定同學，以黃氏傾向中央，頗不相能。西南之變，黃氏曾於炮火連天中，命飛廣州南寧調解，卒化干戈爲玉帛。

黃氏早年蓄鬚，美髯于思，粵軍之變，倉卒割鬚跳窗，自粵垣乘輪脫走香港，間不容髮，至今未再鬚著。

某次旋里，與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氏同觀桂劇，一旦角出場，依稀爲兒時所認者，因問馬氏，這

不是名且「鴨蛋」嗎？馬氏道：「不錯！」黃氏又問：「鴨蛋，鴨蛋！是不是爲了她的臉長得像鴨蛋才那末叫她？」馬氏大笑，說：「你弄錯了，她叫「壓且」，意思是蓋單一切且角的意思，那里是「鴨且」呢！」

有一個時期，他一心於科學研究，曾創製「七七式步槍」「轉機關槍」和「七七式鎗溜彈筒」，尤其是後者曾得中央獎金，在美式配備未到前，曾爲全國部隊所愛用，後又發明「萬密電報機」，但未行世。在浙曾設置「紹雄科學獎金」。

他能填詞，家學淵源，不同凡響。「上有好者，下必盛焉」，一時東南日報副刊，裝載廳長專員廳長們唱和佳作，惟多爲「四聲未協，八病俱全」之作，讀者苦之。

氏長於領導，而短於組織，浙江的「四年建設計劃」成績未著，良以是也。當然人事掣肘過多，亦不爲無因。

黃氏政治道德，有一點值得爲之表彰者，卽不任用私人是也。在浙十年，桂籍縣長不過一二人而已，且均地處僻壤，在裙帶政治中蔚然一股清泉。

飛虎隊怎樣成立的？

我國空軍的歷史很短，在抗戰前組織很小，設備很簡陋，因此對敵作戰頗感捉襟見肘。民國三十年春，緬甸失守，唯一的國際接濟路線——滇緬路被切斷，我空軍之必要配備缺乏補充，更陷於無

法應戰之狀態中，最高統帥派航委會副主任毛邦初去美選購飛機，用以加強我國空軍力量，並以對抗日寇零式飛機。敵零式機之速度，非常快連，我機常感無法應付，自第一次蘭州與第二次成都之大失敗，我空軍一聞警報，無不相顧失色，當局不得已採取一種不是辦法的辦法，規定如聞敵機來襲，我機即四散向西康萬山叢中飛去逃避；而敵機來襲時的時間常常很長，我機每有因汽油用罄而失事，刺激我飛行員極度的憤恨，多願效卵敵石，情願與敵機死拚，不願逃避。這當然是太重意氣，決不是合理的辦法，所以最高當局決定向美國購買新式飛機。毛氏負了這個使命到美國，去後却是空手而回，毛氏在紀念周上報告去美購機經過，他說他已採用過任何方法，除了沒有向美當局下跪，始終未能獲得一機，詞未畢而淚湧下，參會者皆爲之悽然。

宋美齡先生時爲航委會委員，對此問題頗感煩悶，她偶然想到前次去美時，曾與陶格拉斯飛機廠試飛部主任陳納德談過一次話，認爲在他身上可以獲得一些線索，她馬上寫一封信給陳納德說：「你如何可以幫助我」？陳回信說：陶格拉斯廠有一種P-51式飛機，它的速度可超過日本的零式，零式機只顧到他的速率而將機身裝甲非常單薄，容易受傷，這是零式的大缺點，P-51却沒有這個缺點，制勝可操左券。這個消息被日寇知道了，在敵飛行雜誌上登出了一篇文章，說P-51的性能遠不及零式，而且P-51還有一種毛病就是升高速不穩，我空軍當局對P-51性能本來不明白，而對敵零式却領教過多次，因此發生猶疑。陳納德原是一位很有經驗的推銷員，他似乎知道這種心理，他向航委會委員宋美齡建議說：請你們不要猜疑，我可以做一下子廣告，貨色好不好當場試驗，飛機汽油全部由陶格拉斯廠免費供給，由陳納德本人率領該廠試飛員數人到中國來，一切費用完全自理，如有損失傷亡，亦不

必由中國政府負責，惟雙方約定，每擊落敵機一架，由中國政府付給陳方美金十萬元，如中國政府對 P-51 認為滿意時，再談買賣交易。

那時美日尚未宣戰，陳氏等以志願名義出現，這個志願隊定名為飛虎隊，由陳自任隊長，並請宋美齡為名譽隊長，駐紮在昆明。當時我國財政很困難，能够不化一文錢得一支强有力的新空軍，又何樂而不為呢？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零式飛機十二架來襲昆明了，其目的當然是來尋 P-51 的。陳納德立即命飛虎隊隊員各駕駛升空迎戰，結果擊落敵機十一架，剩餘一架被逃走了，衆隊員窮追無着，陳納德大呼倒霉，「損失十萬元美金」不止。如此，每次敵機來襲，總給他殺得片甲不留。飛虎隊隊員每聞警報，無不喜形於色，蓋大家可以麥克麥克也。隊員如有未被派升空迎敵者，必與隊長陳納德大吵大鬧，說「你太欺侮我，你使我 Lose Money——」因爲不去參戰，就分不到錢。

自從飛虎隊在昆明成立後，昆明的老百姓就不逃避警報了，一切均照平時一樣，因爲大家都相信 P-51 一定可以把來犯的零式敵機擊落或打跑。警報一拉，舞場和酒吧的老闆，更忙得手舞足蹈，笑口大開；舞女與女招待們擦粉抹脂，等候「天使」們的降臨，「頂好！頂好！」一張一張的美金票，都到了她們的袋裏。

可是好景不常，昆明一到七月，雨季來臨，就見不得敵機蹤跡，於是飛虎隊員個個鬧窮，大家喊着「沒有生意」！吵着要回國去。舞場酒吧間裏鴉雀無聲，老闆坐着打呵欠，打算關門大吉。陳納德着了急，不得不要求當局移駐衡陽，否則在昆明敵機不來，勢必坐吃山空，後經當局批准了，陳和隊

員們大家重復笑逐顏開，同聲喊着「生意又可興隆」！陳納德恐怕敵人不知道，不能馬上有敵機來，他還想了一個巧妙的方法，將「中國空軍主力轉移衡陽」的消息，轉送給敵人知道，逗引敵機來襲。後來珍珠港事件爆發，美日宣戰，飛虎隊在中國已建立了殊勳，美國軍部於是把飛虎隊正式編入美國空軍，共番號定為第十四航空隊，陳納德也被破例給予少將的銜頭。

中大教授的派系與鬥爭

提起國立中央大學來，令人想到一匹雍腫的駱駝。的確，就中大編制上說，就現有教職員人數與學生人數說，中大無疑的應該站在中國最高學府的首位。背着中大招牌的，掛着中大徽章的，以及倚靠中大來吃飯養活一家的，甚至形成「中大系統」的政治派別的，真是洋洋大觀。最近幾年來，中大換了好幾任校長，自顧家倫下台，換了顧孟餘；不久顧氏去職，最高當局自兼校長，由教務長朱經農處理校務；不及一年多，朱升調教部次長，由原教次顧毓琇任校長；又不及一年多，顧調任上海教育局長，由吳有訓任校長，至今恰好二年了，中國是個講人情面子的國度，即使出洋吃過外國麵包的高等華人如大學校長者，也在所不免吧？於是，每當校長更換的交替時間，人更異動的速率就加快起來，結果是你添幾個，他聘幾個，不管名額如何，弄得老太婆吃芭蕉，有進勿出。詳細分析一下中大教職員的派別，彼此不相上下，雖然明裏課堂飯廳相見，一笑嫣然，而暗裏免不了互相傾軋，劍拔弩張，最顯著的，中大教職員有三個派別：

(一)中大派。這是包括中大前身的南高和東南，以及中央大學成立以後的畢業生輩，不消說，這一派勢力最雄厚，旗幟也最顯明。他們曾經公然喊出「中大管理中大」的口號，其勃勃的野心可以想見。但是，這一派有很大的缺點，即他們之間的認識和步調並不一致，「南高」和「東南」出身的教授們，鬻然以中大的地主自居，對於後輩的「中大」畢業生，簡直視同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子！而後輩的留校服務的中大校友，對於這班唱唱生鏽了的留聲唱片的老先生們，頭腦迂腐頑固，簡直嗤之以鼻！南高和東南出身的一系，如孫光遠、張江樹、張士一等口口聲聲是「年資第一」，「服務至上」，（現任校長吳有訓，系出南高）當然三句不離本行，都是爲自己打氣罷了。至於中大少壯派，他底領袖是誰？言人人殊。現任教次的杭立武，曾以中大老大哥自命，但他聲望有餘，資望不足，因爲中大畢業同學錄中，當過次長的不止他一個，何況同學中有魄力有手面的人物，實際上並不少呢。不過，元老派已經日落西山，暮境堪傷，未來的「中大系」，只有期待於毛頭小子了。

(二)清華派。這一派來頭也不小，都是筆挺西裝，洋派十足的司麥脫人物，分佔工學院、理學院、文學院、法學院的大部份主要講席。本來，清華派在中大不怎麼出風頭，一直到顧毓琇出長中大，這纔惹人注目起來。顧氏爲人圓轉機杼，敏捷周到，但他器識不及羅家倫，氣魄不及顧孟餘，加以接任在最高領袖蔣兼校長之後，所以，一時聲勢雖召也不甚起色，風雨波濤也不易撐架。不過，總算慘澹經營，渡過難關。一年中建樹平平，譽毀參半。清華系的優秀人物，如樓光來、周承鑄、陳章、柳無忌等，有第一流的學術修養，對於政治活動從不過問，因此甚得大部份學生的愛戴。總之，「清華派」是中大的主要根脈，中大少不了它來撐撐台子，沒有清華人物的中央大學，是不可想像的。

(三)北大派。這一派在羅家倫和顧孟餘時代是相當活躍的，因為羅、顧都是北大的淵源人物。據說：羅家倫所以當中大校長七八年，即是爲了善於利用這鼎足而立的三系勢力的矛盾與均衡。畢竟北大出身者是懂得政治玩意的，好容易撐持了這樣久的時間。往後爲了某系要將政治勢力打入中大系統，首先向羅豬頭（外號）開炮！羅氏對內有餘，對外不足，如何招架得住？但中大畢竟非同小可，所以顧孟餘繼其後，只是一個轉變的萌芽，中大已開始蛻變了，它要變成國民黨培養政治幹部的大本營。作爲現存北大領袖的顧孟餘，眼見得斛刺裏殺出一彪人馬，情知不妙，毅然掛冠而去。從此北大出身者在中大便有冷落之感！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系主任伍叔，北大出身，與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誼屬聯襟。楊晦、吳組湘均係該系教授，近以故離職，可見以『兼容並包』聞名的北大一貫作風，施之於中大，在目前已有修改的必要了。

中大現任校長吳有訓，是中大校友，無籍籍名，但據說他是中大校友中在學術上最有成績的一個，原任清華大學的理學院院長，研究的是物理學。前任校長顧毓琇的去職，是在朱家驊長教育部不久以後，朱氏是留德的，與留美派不大融協，因此中大留德教授中有戈定邦其人者，活動甚力，此君係中大出身，以校友會核心代表資格施展渾身解數，加強中大派與清華派之磨擦，當顧氏堅決表示辭職時，教部苦於無適當中大校長人選，終於由中大校友會通過提出吳氏長校，認爲適合而發表。事後，吳氏感恩知己，即以柏溪分校主任一職予戈某，作爲酬報。

關於中大編制，教部會令飭調整，主要者爲醫學院附屬醫院之減少，與師範學院各系之裁併，這一變化的原因，自然不問可知了。

于右任由紅變黑

于右任院長在民國初年，是國民黨中的活躍份子，如今却是元老的身份了。論目前政治上的力量，于已不及居正和戴季陶院長，可是，蔣主席對他非常尊敬。有一次，蔣主席到他公館裏去問候，走下石階時，看到石階下有二顆石子，他立即對副官說：「怎樣不當心，于先生年紀大了，不要給石子碰了」，可見蔣主席是如何尊敬元老了。

于被蔣主席所重視，在民國十八年，那時國民政府從都南京未久，基礎不穩，于想回陝西，于的副都楊虎斌，正抹馬厲兵，躊躇欲試，蔣主席自然不願于回陝西，以免另生枝節，派了邵力子先生去疏通，時間非常急促，邵奉派到了于公館時，于已將整裝待發，行李堆在天井裏，送行的人會集在客廳裏，亂烘烘地，邵見事情已經如此，也不便再來勸駕，勸也無効的了，他一走入門，便說：「真的走了嗎？走的如此快，來不及送行了，什麼時候回來？」「沒有一定，南京我住下去，也不適宜。」這是于的答復，語氣間仍然有些意氣未消。邵先生不作聲，遂即打一個電話給蔣主席的隨從副官，他在電話中說：「于先生決定走了，報告一聲主席，我不回來了，要送他上車。」這些話，好像邵先生有請假。人家吃了中飯，便動身了，邵和于走出大門，邵對于說：「你坐我的車子吧，你的車子，送行人多，恐怕坐不下，我們在車內，還可以隨便談談。」

於是，于便坐了邵的汽車，隨着送行的人，足有三輛汽車，邵的車子到了三元巷口（那時兼國民

革命軍總司令，總司令部設在三元巷。邵對汽車夫說：「開總司令部」。又回頭對于說：「走過這兒，順便澆澆」。又吩咐汽車夫，跟在後面的三輛汽車，直開下關火車站，在車站等候。

于未及表示可否，車子開入總司令部了，這樣，于蔣作了一次重要會談，當時談了些什麼，外間無從知道，然而有二點，可以看出他的重要；第一、于進總司令部的時間，大約在下午一點鐘左右，他晚上九點鐘才出總司令部到下關車站，送行的人，在車站上足足等了八個鐘頭，火車已經奉命掛上一節花車，升火待發，好容易于先生來了，蔣主席偕行，且行且談，狀甚親密，邵子力先生跟在後面，微笑着，在邵先生的臉孔上，可以看出于蔣之間已有協商，果然，于院長回陝不久，便回南京，一直在中樞担任要職。

西安事變前，于院長在南京，一向以西北領袖自居，他人也以西北領袖目之。這個「西北」，至少包括陝西政治舞台上的角兒。在西安事變前，以為陝西有什麼動作，于院長終是有辦法的，西安事變的主要角色，為張學良與楊虎城。張學良那時為剿匪總司令，而楊虎城與國民黨歷史較深，並且為陝西軍隊士著首領。擁有地方武力，如果他不同意或者出而阻梗，則西安事變萬萬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可以使張學良孤掌難鳴，事情極易解決。後來證實了楊較張還要難弄。於是，中樞不能不把希望寄託在于院長的身上。論關係，楊為于之舊部，楊之見重於中樞，由於于之力薦，平日楊對于恭敬備至，論情誼，于為中樞負責人，排難解紛，自然責無旁貸，於是，臨行前發一電給楊，以為試探，電文很簡單，只有「擬即來陝」幾個字，豈知楊以「不必來」復之。於是于院長不敢飛陝，在政治上講話力量，遂減輕不少，迄至今日，情勢未變。但是，于院長對黨國的貢獻，却是不可磨滅的。

副總統競選內幕

副總統競選引起了軒然大波，三位候選人由競爭而棄權，又由棄權而再競選，這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問題的癥結，自然是在自由競選與統制選舉之間。副總統競選。本來因為擁孫集團乃是黨的中堅，而這一集團在國大又佔絕大的優勢，以為左券可操，不妨大方一番，因此決定了自由競選。那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的兩場選舉場面，却不如人們理想。第一天李宗仁以七五四票壓倒了孫科的五九九票，程潛亦以五二二票進入複選之列。第二天，李宗仁復以一一六三票擊敗了九四五票的孫科，程潛亦有六一六票、以這票數獲選副總統，固然不足，但在反作用上，的確也是孫科的心腹大患。

再加之李程的桃園結義，于右任初選失敗，其選票便應約轉移到了李宗仁名下，因此第二天李的票數破了一千大關。假使再選一場，程頌雪再依法淘汰，那末其選舉票再轉移一次，李宗仁便有穩坐寶座之可能。在另一方面，救國日報的幾篇文章的確使孫科在代表中的印象受有損傷，廣東代表在救國日報一打之後，間接就更影響了孫哲生的競選，在這樣的一方面如日昇，一方面如日西下的情勢之下，除非不希望孫哲生上台，否則「自由競選」的辦法必須加以修正，孫先生自然是被人們要求着作為未來的副總統的，那末，祇有修正一下自由競選的方式了。

於是，擁李、擁程的黨員們，一批一批的被警告：誰選李宗仁，誰就有陰謀，擁李的代表紛紛受

到警告，精神上受到干涉，一時由「吶喊」而「徬徨」了。再一方面，二十四日的夜晚，四巨頭夜訪李宗仁，請他考慮退讓問題，他們願意保證，如果李退讓，可以給以一名院長，和補償李的全部競選費用。可是李沒有答應，但爲了他的選民被認作了「有陰謀」，他祇有在深夜二時，決定退讓了。

程頌雲在這次競選中，扮演的是一個幫襯。如果李宗仁棄權而程依舊堅持，則李的選票一定在程的囊中，孫哲生依舊無當選之望，因此要孫氏上台，非請程氏一併退讓不可。程潛在整個局面中，雖然已無當選希望，但他却是舉足重輕的腳色。程潛終於退讓了，雖然，有人說他是「奉命」退讓的，他自己却承認了「自願」退讓的，但無論如何，在他的地位上是不能不退讓的。

二十四日的夜晚，程李先後退讓了，這個夜晚是一月來最緊張的一個夜晚，李宗仁還是堅持競選呢？還是毅然放棄呢？這不僅是擁李代表所踌躇不決，就是一般旁觀者也十分關心。

可是，李宗仁在二十五日晨，聲明退讓以後，向助選的國代們致詞，曾一再表示，他主張的革新運動，仍然要慢慢地开展開。這在某些人聽來，是有些不大那樣的，而二十五日的下午，李氏助選團一千餘人所組織的「民主憲政運動委員會」成立了，晚上，程潛的「憲政協進會」也成立了，後者擁有一會員六百餘人，兩方的合流祇是時間問題，而且還準備收非國代的會員，各地設分會，成立永久機構，這種種，在某些人看來是頗爲那樣的。

再加兩個助選團的人員在廿五日下午的國大裏大鬧，以致無法開會，他們是準備鬧得國大開不成而宣告閉幕，二年後再選副總統，如果真的永久鬧下去，鬧得國家沒有個副總統，也是太不像話了。

於是，孫科也在廿五日中午晉謁主席後宣佈退讓了，這個退讓乃是一種「表現」。

於是，中常會依舊決定了「自由競選」的原則。雖然，這「自由」的限度還是疑問。

實際上，李孫兩人，都是採的「以退爲進」政策，李是硬功，而孫是軟功，惟有程潛則是真的祇有退的一途，因爲以他的票數，絕對沒有當選之望，但「退」也得有條件，他決不願意因他的一退，而使非理想的人當選。在三度投票中，程氏雖然還是參加競選，但他是保守齋既得之票已足，準備淘汰後移交的前途。據說這幾天來，程氏助選團的費用，已不是他們自籌的了。

魏德邁使華的前因後果

去年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終於演成爲一齣不歡而散的鬧劇。當馬歇爾離華返美時，若干接近官方的人士即推想司徒大使即將辭職，將由魏德邁將軍奉命使華。那些接近官方的人士所以有這種推測，至少可以想見，他們是如何的希望：美國的駐華大使是一個全面同情政府，反對共黨的人物，而不是一個支持民主，提倡新五四運動的人物。三十六年六月下旬孫科副主席發表了幾篇露骨求援的談話，接着黨方或半黨方的報紙便大寫其「杜魯門主義快來」的文章。白宮不久也就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於是羣情歡呼，以爲救星來了。

官方最初對於魏德邁的中國之行確是滿懷興奮。在他們看來，魏德邁是反共的，魏德邁是支持國民政府的，馬歇爾離華以後，美國對華猶抱觀望政策，現在杜魯門突然宣佈派魏德邁來華調查，在官方及接近官方的人們看來，杜魯門這個措置，顯然表示美國對華政策即將改變方向：決定全面支持國

民政府。魏德邁個人反共和支持國民政府是不成問題的，但假如認為杜魯門派魏德邁來華，就是表示美國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剿共，我們認為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我們認為魏德邁這個人的傾向是一件事，美國的對華政策又是一件事；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決不能由這個國家所派遣的駐外使節他本人的看法與傾向來作代表。我們認為杜魯門總統所以選任魏德邁來華調查，原因很多，其中一點，就是因為魏德邁是一個最容易和蔣主席說話的人。

為什麼魏德邁是一個最容易和蔣主席說話的人？我們可以分析在過去幾年中蔣主席接觸的幾個美國軍人。在過去幾年中，美國先後任命來華和蔣主席接觸的人物，有史迪威、魏德邁、赫爾利和馬歇爾等幾位。這四個人的性格、作風、以及和蔣主席接觸的情形，都不相同。史迪威氏性較魯莽，他比較同情共產黨，他不贊成政府在配備上對於共產黨的不公的分配，他對於整個國民政府在軍事上的組織和訓練，都不滿意。他原是蔣主席（中國戰區統帥）的參謀長，是蔣主席的下屬，然而他顯然企圖在美國的國力上來挾持蔣主席，這是蔣主席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對共產黨問題上，兩人無法一致，結果終由羅斯福將史迪威調了回去。與史迪威極端相反的是赫爾利大使，這是一個極右的人物。他是一個完全崇拜蔣主席的人物。但在兩國外交衝折中，一個外國駐在本國的大使，太崇拜了駐在國的元素，這外交也不會辦得有勁，和一個政治家軍人接觸，太硬了固然要鬧翻，太軟了也沒有味兒，所以赫爾利又代表了另外一種典型。馬歇爾和蔣主席的接觸，實在最標準，最精彩，一個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的元首，他會完成了現代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他會領導全國抵抗日本，終於獲致勝利。另一個是指揮着全世界海陸空三軍打倒了赫赫一世的希特勒的英雄，他是當

今世界第一強國的最孚衆望的風雲人物。這兩個人都有高度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並各自充分瞭解對方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而且這兩入各有極強的個性，在彼此的談話論辯中，都想制服對方而不爲對方制服。所以在這兩位人物的接觸中，雖然互相尊重，然而每次談話的空氣，却常常是極不愉快，甚至非常令人氣憤的。祇有魏德邁，這一位繼史迪威的中國戰區參謀長，最能贏致蔣主席的歡心和信任。他不像史迪威那樣的傾向共產黨，也不像史迪威那樣在美國的國力下來挾持蔣主席，這些都使蔣主席不致對他發生敵意。他也不像史迪威那樣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是蔣主席的參謀長，他在蔣主席面前陳述他所以爲然的一切，他所不以爲然的一切，他建議，他批評，一切他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然而最後，他會說，委員長，我的責任是告訴你我所知道的，告訴你我所認爲最好的，但是你採納不採納，你以爲對不對，權力在你手裏，一切應由你最後決定。這個態度大大滿足着蔣主席的自尊心。而且，魏德邁還有一點與史迪威不同，史迪威是當了蔣主席的面常常說許多不好聽的話，背了蔣主席的面，也是那一套不好聽的話；魏德邁則不，他當了蔣主席的面，是坦白的批評，但是背了蔣主席，他說的都是擁戴蔣主席的話，他不在背後批評蔣主席。

就因爲在這種背景之下，官方與接近官方的人士，對於魏德邁的來華，一律表示歡迎，並且充滿着許多的幻想。

官方對於魏德邁個人雖有好感，但這次白宮任命魏德邁來華調查，事前確是毫無所知。若從國家的尊嚴來說，官方對這些當然也是不快的；而且把中韓並列在一起，在中國人的感情上，也是一種苦痛的刺激。但是尊嚴、面子、感情、這些都是抽象的，而中國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抽象時期」，而是

一個「實在時期」，把抽象的「尊嚴」「面子」，早已擱起，所關切需要的是實質在在的錢、軍火、物資。中樞核心層於白宮任命發表後，會集會研究，當時一致認識三個前提，即：（一）美國對華的基本政策是希望中國成爲一個民主、團結、和平、統一的國家，這個基本政策是不會變的。（二）美國的世界政策是反蘇防蘇。在這個大原則下，美國是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的。（三）美國國會尚在休會期間，「立刻援助」，一時無望。

經過多次研究，對於魏德邁此次的中國之行，政府方面決定了兩個基本立場：（一）遵照既定政策，進行戡亂。（二）不向魏使其體討論任何援助問題。這兩個基本立場，前一個是因爲政府決定用兵到底，至少到目前爲止，政府不擬改變這個戡亂政策。後一個是認爲魏德邁的任務是「調查」，他既無權力討論任何具體的援助問題，自然不提出爲是。

在做法上，中央決定祇供給材料，避免說話。避免說話的原因是因爲對於魏德邁這次來華，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還摸不清楚，所以盡力避免說話，想先從魏德邁及其顧問們方面得到一些線索，再作決定。不料魏使也是抱着不說祇聽的做法，兩個「不說」相關，據說結果還是魏使的「不說」政策成功了。

同時中央方面儘量策動民間力量來包圍魏德邁使團，使有利於政府的人士得更多的機會和魏德邁使團接觸。並佈置嚴密的情報網，使魏德邁使團在中國各地的活動，都能隨時有報告到達中央。

魏德邁抵京以後，始終緘默，不表示態度。但他和政府之間的往還，還在正常狀態之中。政府還不能從魏德邁的態度中得到任何特殊的感覺。但是自從魏德邁從北平、天津、瀋陽、台灣等地旅行返

京以後，態度大變。九月一日張羣院長單獨接見合衆社記者，據稱：當魏氏訪問中國時期，渠曾與魏氏會晤多次，而魏氏並未與渠認真舉行會議。蓋魏氏對政府以外之人物較政府人員爲着重也。又說：許多人頗欲謁見魏使而不可得，（見九月二日大公報）確是事實。據說魏使自各地旅行返京後，即盡量避免和政府方面的人物接觸。他看見了張羣，僅僅描淡寫地招招手：「哈囉，你好不好」，而不與張羣作任何嚴肅具體的討論。許多部長去看他，他不是說忙，避而不見，就爲見了三分鐘，就推諉要開會，起身送客。魏德邁既奉命來華調查，身爲中國首相的行政院院長，竟沒有機會和他從事嚴肅而具體的討論，許多部長階級的人物沒有機會和他交換意見，也確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政府方面因此而引起的氣憤與不滿，實亦人情之常。但是政府人物，於氣憤之餘，亦應自我檢討，爲什麼會弄到這樣的局面？爲什麼外人對於政府人士竟然表示如此不信任的態度？政府方面又深責許多要見魏使的民意機關代表以及工商界代表，無法見到魏使，但是我們很坦白的說，今日中國的民意機關，到底代表「民意」到什麼百分比的程度？外人對於這一套，可謂瞭若指掌。外人既然在根本上不能信任政府，他爲什麼還要接見那些在政府羽翼下產生出來的各界代表人物？我們覺得政府當局還要打起官腔來指責魏德邁，殊屬不智。

爲什麼魏德邁於旅行各地返京以後的態度變了？還有各種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爲魏德邁很受各地所接見的民主人士的影響，但大部份人還是認爲魏德邁很受各地美國領事館人員和美國商人的影響。他們認爲魏德邁之信任各地的美國領事館人員和美國商人的意見的程度，遠在信任各地民主人士的意見之上，而各地的美國領事館人員和美國商人，自然不會有人說國民政府的好話，而他們攻擊國民政

府的話，亦必極其透澈詳盡。

魏使一行定八月二十四日離華。當局有意在魏使離華前，設宴介紹魏使與國務府委及各部會長官正式會晤。魏使因為吃飯太費時間，建議改為茶會。在這一頓茶會上，魏德邁講了許多話，把中國各種缺點，痛加指摘。二十四日臨行前又發表了一篇文告，而言辭的率直，即使是最左的人，在最初也未料到有此一着。這一次演講和這一篇文告，在政府方面引起了極大的激動，認為奇恥大辱。有人認為美國人太豈有此理，為報此仇，竟宣稱誓願棄投共產黨，這當然是一時氣憤的話，而且十分幼稚，然而亦可想見魏德邁所給予南京官場的刺激是如何的劇烈了。有兩位大員在國務會議中堅決要求政府向美國提出抗議，因為他們自認絕無貪污的行為，假如政府不抗議，他們祇得被迫呈辭，幾乎整個政府對魏德邁本人及美國發生着最大的仇視，一切都是爲了傷了他們的自尊心，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自省，這二十年來，不知有多少中國平民在他們的統治下傷失了他們應有的自尊心！

魏德邁此次到中國來，動機到底何在，至今還是一個謎。動機當然不止一個，各人的看法不一，有的人認為魏使的中國之行，僅在敷衍美國國內的親華派，這不失爲一種有根據的看法。馬歇爾在華一年，調解國共糾紛，以他的聲望、經驗、和自尊心，還是一無結果，悄然而去，實在說，他對於此舉不能不耿耿於心。他對於中國的局勢及人物當然有全盤瞭解，他對於蔣主席，恐怕也不無介懷。所以他返美國出任國務卿以後，對於中國即採取袖手政策：「看你怎樣」？他把美國外交的重心，放在歐洲，把中國擱了下來。但是，六月下旬孫科副主席那幾次露骨求援的談話傳到美國後，美國右派一看共產黨的勢力一天一天膨大，眼見國民黨快到沒有辦法，所以逼迫美政府不能不管中國的事情，在

這種情形下，杜魯門（實際上是馬歇爾）派魏德魏來華調查，實在是爲了應付美國國內的要求。魏德邁是馬歇爾系統中的人物，而這次跟魏德邁來中國的顧問們，大多數也是由馬歇爾指定的，所以可能的是，魏德邁到了美國後，提出的報告書，關於國民政府的一部分，也如他離華前發表的文告一樣，馬歇爾就可以應付那些要求支持蔣主席的人說話了。

周佛海死後種種

周佛海死了！他實在當得起中國第一個大漢奸！三十年來，他從極左，跑到極右，從一個窮學生爬上了統治者最高的職位，他的一生事績是足說盡了他的無恥。

周佛海是湖南人，一九二〇年時在日本求學於京都帝國大學，學習經濟學，受日本經濟家河上肇的影響殊深，一九二一年「中共」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各重要都市都有代表出席，其時李達代表上海，張國壽劉仁靜代表北京，董必武代表武漢，陳公博代表廣州，毛澤東代表長沙，周佛海就以留日共產黨學生代表資格出席，當時選舉的結果，陳獨秀任中央委員會會長。

周佛海被舉爲副委員長以後，他奉派往湖南工作，因追捕共產黨甚嚴，他即逃往日本，到帝大讀書。當時國民黨優勢已成，而且清黨甚烈，於是，他就加入了國民黨，仗着他一支能辯的文筆，他寫了一本「三民主義的理論與體系」，從此就成了國民黨內的政論家，先後被派充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主任、中央民政訓練部長、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職。當時他走進了某系的路綫，人們都稱他爲智

義團之一

抗戰初期，某系勢力日為降落，他見機行事，走進了改組派的門道，他一面當了中宣部副部長，口口聲聲堅持抗戰，一面却在暗中陰謀「和平運動」。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汪精衛出走，周佛海也在五月跟蹤潛逃，他以詭辯的三民主義迎合日本的大東亞主義，那時他已經「榮任」了偽「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兼祕書長，「最高國防會議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軍事委員會委員」。「東亞聯盟中國總會常務理事」，「中日文化協會名譽理事」，「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名譽董事長」，「新國民運動促進會常務委員」以及偽上海市長，偽司法行政部羅君強手下特務系統的幕後指揮者。

抗戰勝利，他看風轉舵，立刻接受重慶中央特別總隊總指揮的任命，調動偽軍，防護京滬，頃刻之間，又成為我方地下工作者。湯恩伯將軍飛到上海的時候，他還到機場歡迎，儼然變成「自家人」了。自他被捕入獄，判處死刑以來，百般活動，終於改處無期徒刑，我國今年行憲，大總統選出後，將舉行特種大赦，周佛海未始不想藉機恢復自由！可惜死得太早了！

蓋棺論定，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首都高等法院，判決他是一個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的漢奸，可是與他同犯一罪的羅君強，竟然說是「五百年名世光芒，蓋棺何必著論定」。周佛海究竟是民族的罪人，還是他在高院公審時說的：「來收拾破碎的半壁河山，以備復演民國十六年的甯漢合流呢？」現在周佛海雖然死了，他有的是楠木棺材可睡，尚有生平友人主祭，而他在政治上所留下的一切，

食其惡果的，還是我們這些無知無識的善良老百姓。

不過，周佛海的死，倒是給做政治投機生意的一個好榜樣。

一個漢奸的死，在抗日勝利後的中華民國，本不值大書特書的，但是，我們如果能從活潑的漢奸口裏，聽聽他們對周佛海的「評語」，當能更清楚周的爲人，而且知道他是如何落水的。筆者特地到老虎橋監獄，去看周的親信羅君強和江亢虎。

羅君強「風采」依舊，和去年筆者去看他的時候差不多，圓圓的臉，臉上發白發紅，鬍子刮得乾乾淨淨，帶着一付玳瑁眼鏡，和毛線睡帽，藍大褂絲棉袍，所改變的，他已經沒有那次做發言人，用花生米招待筆者時那種風趣，提起周佛海，他說：「民國十一年，方才看見周先生夫婦的照片，十四年在上海相識，十五年開始在國民革命總司令部共事，以後雖然分散一個時期，但是從未失聯繫，他是一個人才，當然沒有問題，就是到南京來，相信他總不至於故意做禍國殃民的事，他對財政金融幣制非常關心，可惜他死早了，如果晚死兩年，可能有點具體的意見貢獻。他生平對蔣先生一向崇敬，即在南京始終未有一言不敬之處，離開重慶，當然是主和主戰的意見上不同，而他引爲遺憾的，就是未向陳布雷先生說一聲，因爲那時布雷先生是侍從室的主任，周爲副主任，在友情上他始終內疚。勝利後的中日問題，周佛海沒有談到，不過他在未生病前寫有日記，幾年來從未中斷，不過日記是純私人的東西，誰也不能去看它」。

江亢虎是僞考試院長，判刑執行在監。偌大年紀，弓着背，精神還是很健旺，一見面，他就知道筆者的來意，他說：「他與周佛海並沒怎樣深切的關係，是在民國十二三年之間，我在上海辦南方大

學，楊淑慧的父親在當會計，那時周佛海剛由日本回國，我看他生氣勃勃，是一個有作爲有才氣的青年，因而相識，後來他當江蘇教育廳長，有時也見面，在南京時，他是想有所作爲，至於結果，誰也預料不到，人是越有權利，越容易做錯事，他部下這樣多，那能個個約束得嚴格」。

談到周佛海的死，江亢虎和羅君強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病重了，應該讓他保出去，死也應該死在醫院裏，對司法行政部的不准保出就醫，頗有微詞，談到這點，江羅兩人，都眼淚汪汪，不勝淒然，並說：「臨死時，家裏一個親人都沒有在，同難的親友也沒在身邊」。

另外談了些江亢虎在獄中的情形，他的牙疾自今年正月將顎上的兩顆大牙拔去，疼痛已止，請洪宇代鑲兩顆，索值兩千四百萬元，江亢虎說：我因爲三年與世隔離，物價漲到怎樣的程度，我也不知，但是這樣大的費用我出不起，就是我孩子的薪金，一年也拿不了這樣多，雖然吃飯不方便，我也不管了」。

談到他是否有著作，他說：「我近來只有一點詩，旁的沒寫什麼，主要的是沒有參攷書。我曾經有一理想，想整理五經，因爲這東西雖然陳舊，然而中國文化的總淵源，一般只知批評舊的不好，而實際上並不了解，了解了之後，再來批評，那是科學的，他就叫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白話文固然好，五經時代，雖然過去，但在中國文化上，尚有整理的價值，一般人動不動說中國有五千年文化，而實際他連五經都不懂，豈不可惜！」除此而外，他還想在可能範圍內，翻譯一點英日文的書籍，以助收入。

最後，他爲筆者寫了一首詩，據他說：從詩裏可以知道他的心情。茲將原詩抄錄如後：題爲「戊

子元且試筆」。詩曰：「獨中已過三元旦，海內今存鷄故人，買醉難求千日酒，埋愁撻送百年身！羣龍隔歲猶相戰，尺蠖隨絲會自伸，爆竹如猿驚破壁，及時飛去又新春」。

政治舞台上的十大派系

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間有鬥爭，民主黨與共和黨內也有鬥爭；英國的工黨與保守黨間有鬥爭，而工黨與保守黨內也有鬥爭；同樣，中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間有鬥爭，而國民黨與共產黨內更有鬥爭，但鬥爭儘管鬥爭，只要雙方不拿「人民」來作犧牲，尤其不應拿「戰爭」「破壞」來作要挾手段。因為，鬥爭不一定是壞的，正因為要進步，所以才有鬥爭，而鬥爭也要有鬥爭的道德。

國民黨因執政已久，歷史較長，故在政治舞台上之有派系鬥爭，源遠流長，遠非一日，目前國內的派系，最有實力的計有：

一、以張羣爲首的政學系，與之有關係的首腦人物計有：李根源、吳鐵城、吳鼎昌、翁文灝、張公權、熊式輝、吳國楨、陳儀、王世杰諸人。

二、以陳立夫、陳果夫弟兄爲首的CC系，與之有關係的首腦人物計有潘公展、谷正綱、程天放、張道藩、顧毓琇、方治、邵華、余井塘、洪蘭友、趙棣華諸人。

三、以孫科爲首的太子派，與之有關係的首腦人物計有魏道明、馬超俊、陳慶雲、劉維斌、傅秉常諸人。

四、以朱家驊爲首的留德系，與之有關係的首腦人物計有杭立武、田培林、周鴻經、曹芻、吳研因，以及中央研究院的薩本棟、陶孟和等。

五、以于右任爲首的元老派，首腦人物如邵力子、張繼、吳敬恆、戴傳賢、王寵惠、居正諸人。

六、職教派：以黃炎培爲首，首腦人物計有梁漱溟、楊衛玉、陶行知（已故）等。

七、救國會：以沈鈞儒爲首，首腦人物計有史良、鄒韜奮（已故）、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已故）、按該兩派人物，現在均已大半加入民主同盟爲盟員。

八、利他社：以馮玉祥爲首，與之有關係的主幹人物計有鹿鍾麟、薛篤弼、許廣平、吳組緝等。

九、社會賢達派：首腦人物計有莫德惠、王雲五、胡政之、繆雲台、邵從恩、吳貽芳、郭沫若、李燭塵、傅斯年等。

十、孔宋系：（一）孔系：首腦人物計有徐堪、俞鴻鈞、盧松舟等。（二）宋系：首腦人物計有貝祖詒、霍寶樹、劉攻芸、彭學沛等。

在上述十大派系中，孔祥熙雖已下台，但在財政經濟上的潛勢力依然很大，不過在政治激流中，目前已無能爲力。至於元老派，一向抱着息事甯人，明哲保身的態度，除非到萬不得已時，決不願捲入漩渦。職教派與救國會，因爲目前正在戡亂時期，已失去以往權衡作用，無法再談政治。而朱家驊系與太子派，目前正在養精蓄銳時期，因爲實力較弱，只能在一旁等待機會，徐圖後計。至於社會賢達派，因爲沒有實力，在政治上起不了什麼作用。說到利他社，則以歷史較淺，幹部尙無若何知名者，一時也不容易出人頭地。故目前祇有政學系與CC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在政治舞台上，彼此明

爭暗鬥，頗爲激烈，加以大選時期，各黨派爲了國大代表與立委的名額以及地方政權等問題，已經爭得面紅耳赤；而政學系與CC爲了要達到競選的目的，彼此在幕後的角逐，幾已達到白熱化的階段。

政學系沒有政綱政策，完全是以首腦人物爲中心，談到人物方面，都是當今在朝的顯要，社會的名流，的確都具有一點幹才，這是政學系的優點，但缺點却在缺少幹部，沒有下級基層人員，故政學系所有的部會與省分，都是大的據點，而所控制的地區也僅僅是「點」。但CC方面却不然，除了在核心人物方面略遜政學系一籌外，基層的中下級幹部，幾乎遍及全國，故所掌握之地區完全是「線」，甚或是「點」，這是CC方面的長處。

目前在政治舞臺上，雖然是政學系的天下，但在廣大的縣鎮方面，却是CC的天下。因此，在中央的各院部會首長中，CC的比例雖沒有政學系大，然各省政府的民政廳廳長和社會處處長以及省黨部主任委員，却大都是CC的主幹。

中共為何拒絕和談

關於中共爲什麼拒絕和談這一問題，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傳說，究竟誰是誰非，外間很難明白其中真相。梁漱溟先生在去年六月七日出版的觀察週刊（二卷十五期）上有一篇「中共臨末爲何拒絕和談」，可以窺見一些和談失敗的內幕。現在把梁先生的原文轉錄如下：

此次國民參政會，許多人呼籲和平，在大家談話中間，很容易談到內戰責任是誰。我以過去會奔

走變方，當然比較外間一般人清楚些，但一半不想寫，一半亦真無暇把它寫出。適有友人自香港來，出示五月十四日香港新生晚報一紙，載有重慶航訊一篇，有意歪曲了我某次的話。承友人問及，却迫得寫出幾句作答了。

先是張岳軍先生（羣）於二月初旬到成都，二月半過重慶，準備回京。在二月十八日那天，曾和我有一度晤談。他敘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從國外返抵南京，那已是國民大會開幕之第二天了。十七日他訪周恩來於梅園，談了許多話，他並沒有感到和談一定絕望。不過在國大開會才是不能進行，只有期待於國大閉幕後。在國大閉會後，當局決定恢復和談，內定他和張治中（或邵力子）去延安一行，却不料竟遭中共拒絕。他自己以至政府許多人都爲之失望，他敘說到此，就接續說彼時京滬一帶，對於中共此一拒絕之分析，分析中共所以拒絕之故，不外三點。第一，是在軍事上，中共有他的如意算盤。算計着如何如何，定可制勝，於是便不想商談。第二，是在經濟上，眼見政府毫無辦法，想着可以拖倒政府，而不想談。第三，在外交上，期待三月十日莫斯科會議之到來。因爲上次（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外長會議，對中國問題之如何解決是有根底，到那時形勢必大大有利於他。這三種想法合起來，就決定不要談，而悍然拒絕政府代表之去延安。

岳軍先生在說了這許多話之後，就問我：你看這分析對不對？我回答說，我不敢完全否認這種觀點；但我却認爲有在此三點之外者。

我說我早就覺察到，中央方面是非打不可了。其「非打不可」之意念，實決於去年雙十節之次日（十月十一日），政府軍攻佔張家口之時。如我你所親見，六月一臺月之和談，中共都是在委曲求全

。事例甚多，不暇枚舉。七月初，蔣公召見周恩來，以蘇北等幾個小問題交付陳誠邵力子王世杰，與中共周董等直接商談（馬歇爾不參加）。必要中共再讓步一些，方肯把六月所協議者簽字。那時中共却是堅持着不讓，堅持到七月十二日無結果。十四日蔣主席上廬山，蘇北就大打起來了。從七月半到九月底，兩個月有半之時間內，從蘇北以至冀熱察遼處都在大打。中共解放區各大據點，幾乎全被政府軍取得，此時縱或不說是政府軍在實際上具有壓倒優勢，至少亦可說是政府軍在聲威上具有壓倒優勢了。乃末後政府竟還想要拿張家口，中共便不能再忍。所以九月廿九日周恩來從上海送備忘錄致馬歇爾轉政府。警告政府不得進攻張家口；進攻張家口，便是政府決心破裂，從此無可再談。他們這句話不是隨便說底，實具有決心。乃政府終於不管不顧而拿下張家口。並且於高興之餘，同時宣佈了國大準期召集開會。……這是十月十二日的事。

形勢發展至此，實在已是絕裂了。我因為正在其間奔走，所以我看得出。但政府却不在意，而美國朋友竟亦昧昧。（註：我是雙十節夜車自南京趕赴上海，十一日午前與第三方面全體會談，午後與周恩來會談，當夜又趕回南京。十二日天明到京下車，乃知局面已變，原與美大使約好回京見面者，至此即不往見之，以事無可為也。入夜美大使館來電話，強邀往談，我告以無可為，均不甚相信。）然而經過雷震、吳鐵城、邵力子兩次三番赴滬相邀，特別是留滬之第三方面同人之百般挽留，周恩來畢竟還是於十月廿一日隨大眾來南京了。這可以說，他是再一次之忍耐。不料眾人應邀來京商談，而作主入底蔣主席却又出遊。——蔣公於當日接見周恩來及第三方面同人後，即飛台灣去了。按照六月間的經驗，和談中大小問題，幾乎都非取決蔣主席不行。他偏於此時出遊，使我們為和談來底朋友都

感到失望，則周心裏之不耐，亦可推知。但他還是耐煩談下去。不料三四天後，政府軍又把安東拿下。安東是中共在東北重要據點，人所共知。拿他的張家口，他不肯談。好容易勸着他來談了，又拿他的安東，請問：政府這是何意？當十月廿五夜間，我同仁之先生等一些朋友，在梅園把安東消息告知周時，周面色立變，即不肯再作和談。然而畢竟又經我們許多人勸下來，繼續進行。——這可以說，他是再再一次之忍耐。

雖說還忍耐着談，他心裏早已是一團要絕裂底憤火。所以不久以後，終於談不下去。我於十一月初，便早早抽身而退，正是有見於此，轉過年來，一月間馬歇爾仍在等候作調人：國大會後，政府還期望共產黨就範；延安之行遭受拒絕，還在分析其故：那真未免太遲鈍了。所以上面三點分析，假如不為全非，亦不是其根本理由所在。其根本理由，照我所領會底，就是不能在對方儼若有壓倒優勢下來言和。——除了對方的撕毀停戰協定，撕毀政協決議，是不能言和的理出而外，就是這個。他們一定要國民黨認識了他們的力量不可侮，而後言和。那樣，國民黨方才重視此和平，愛惜此和平。不然底話，若不以力量作基礎，而寄和平於一紙契約，那是萬萬靠不住底。

在我夾敘夾議底，說了以上一些話後，張氏點頭承認其不錯。到二月尾，我偶去北碚歇馬場鄉村建設學院，學生邀我談時局，我就把我與張氏談話又說給他們聽。不意香港滯晚報有意歪曲，以張氏口中分析三點，作為我的見解，並且加一個講題在上面，而把我自己的話不提，真是豈有此理！

末後總結兩句：照我所了解底，去年七月間內戰是國民黨要打底；到去年年尾本年年初，却是共產黨要打底。而兩方面本意，都是只要作有限度底打。七月間國民黨之打，只要奪取某某幾據點和某

幾鐵路線；並不想一直打到底。後來共產黨要打，亦只想打個平手，覓取真實和平。但儘管彼此均無意打到底，而事實上不可能適如其度而止。今天便是這種收不住疆底局面了。所有上面說話裏，只指出過去某一段事實如此，還沒有論斷兩方面誰是誰非底責任問題。要論斷，既須從頭至尾把事實弄清楚，更須有一番理論作根據，那就非幾個月工夫寫數十萬言莫辦了。

李品仙在安徽

遠在民廿七年，安徽北部劃入了李宗仁主任下的第五戰區，廣西的子弟兵就擁進了皖北一帶，作保衛大安徽之戰，當然在抗戰時軍事第一之下，李宗仁就名譽上兼了皖主席，派了一個安徽合肥人而會服務於廣西有淵源的去掌民政代拆代行。當時是合肥人擠滿了戰時的省政府，廣西入在那裏大吃其醋，趁那位老兄貪污腐化無能、弄得一團糟之際，把他弄下了台，代之而起的是在上海作戰大敗而回的第七軍軍長廖磊主省政，這位老粗武夫當了政，當然就聚集了許多廣西同鄉，安徽入在軍事第一原則下，默默地不作聲，不過這位老粗主政，却切心求治，用了一些幹材，還大量地訓練了基層幹部，安徽老百姓對這位廖主席的設備，都表示了好感，可是廖的夫人是湖南人，帶來了大批的湖南同鄉，他們勾結了安徽的惡勢力和進步的勢力大起明爭暗鬥，弄到結果一塌糊塗，活活地給廖磊氣死在立煌金家寨（戰時省會），於是以前司令長官地位的李品仙，就攪得安徽的政權，一直掌握到現在。

李是廣西四集團軍的參謀長，他是廣西蒼梧人，會署龍州法越邊界的對汛督辦。抗戰時任十二集

團軍總司令駐安徽，純爲軍人，無多少政治頭腦的，毫無見解與果斷，那些幹部都稱他爲隔夜油條，這綽號非常恰當地寫出了他的爲人。李接主皖政時，地盤祇有皖西北十幾縣，皖南有敵人和共黨的新四軍，皖東全部也淪於敵手，甚至於連省府所在地附近，新四軍的勢力都漫佈着，新四軍事變後，政治形勢惡劣，他派了僅有的部隊去打共產黨的新四軍，同時在立煌也展開了對左傾份子的清算，這樣一來，舊勢力的氣焰自然萬丈，在平時工作能力較強的人，尤其是廣西人，壓迫得很利害，於是大量的工作幹部和從廣西出來的學生軍，就隨着新四軍走，倒轉頭來攻打李品仙。這批人一走，立煌就慢慢地爲清一色的舊勢力所把持。同時CC的力量很快地長成起來，打仗是在休眠狀態中，許多幹部做生意，修屋子安住在金家寨的山裏。而李品仙就在這種氣氛中，和姨太太遊山打獵。到了三十一年夏天，敵人來了一次立煌旅行攻勢，早晨得到情報，說敵人有來襲模樣，下午就來到了，弄到狼狽而逃，什麼也搶不出，敵人到了三天，一把火燒得精光就走了，李品仙帶了人馬回立煌，連屋基也認不清楚！那些會作他們享樂之所的滿山谷的小茅屋，安樂窩一點也沒有了。這一次的打擊，說明了當時的政治情形是如何的了！

李品仙之主皖，當然是桂系白健生李宗仁的關係，而且他有軍隊在皖，又是戰時，可是中央總是不願意給「桂人」成爲「系」的力量，個人做官沒問題，造成「系」的力量就可怕了。所以李品仙主政之後，所有「桂人」都漸漸地在主客鬭爭之下遭到排斥，尤其較爲公正進步的人就無法立足下去。在這種鬭爭下，就發生了所謂「麥案」。當時有廣西籍麥世法其人，任省府祕書，被認爲共產黨員，牽聯了許多廣西人，結果殺了十幾個人，另外有若干被監禁。據說這是爲了與黨部不調協的緣故，

從此以後，容籍安徽的「桂人」都噤若寒蟬，一部份也就加入了本地的惡勢力派系以苟安其官職。李品仙這時認為應該更中央化，把在安徽組成「桂系」勢力的念頭，權衡利害打消了，而轉其志趣為「發財」，穩定紗帽。可是好景不常，貪污舞弊事情太多了，就讓政敵運用許多方法給他大大地打擊，前年在重慶的安徽人，就在某系勢力支持下發通電要他滾蛋。李着勢頭不對，紗帽搖搖欲墮，即刻看風轉舵，把廣西人在安徽的勢力，用力壓制，安徽人拚命的告發縣長貪污，迫得他不得不懲辦了幾個如合肥縣長隆武功，蕪湖縣長李志成等，都是轉舵期中以緩和安徽人的作法。再扶植起安徽人的腐化勢力集團做成參議會，參議會也就運用職權控制了李品仙，拚命打擊「桂系」的較好幹部，聯合那腐化的官僚，表面上擁護李，但主幹要由他們來做。在CC要想整個一手抓住黨部的力量之前，他就先行改組黨部，使一位姓方的去職，也沒辦法，於是形勢變成：李品仙要組織安徽的土豪劣紳腐化集團，重新支持他的存在，打擊「桂系」的幹部，使其瓦解。而CC的力量，在黨部教育文化方面爭取控制，整個安徽，就在這烏煙瘴氣過了勝利後的一年。這樣一來，當然無成績可言，毛病百出，中樞對他不滿，時有更調他的消息，而且接收時的「覓收」，李品仙的荷包也漲得使安徽人眼紅，去年的秋天，他到了南京謁主席，主席對他表示不滿而加責備。見宋子文，也碰了一鼻子灰，告訴他說：「主席對你不滿，最好辭職」，李乃向白健生氏訴苦，白乃為其緩頰，商之宋，條件為去年徵實徵借一粒不少。宋子文在徵借這一項頭痛的事情下，接受了這條件，李的主席乃得做下去。李品仙得意洋洋，返回合肥之日，電令部下郊迎十里，以壯聲勢。官暫時固然可以做下去，可是這條條件一訂，安徽老百姓，把血汗換來的粒粒谷麥，就要不折不扣的為保持李品仙的王座而被征繳。在這條件下，就不知要

有若干屍骸來建築這座王位！

「發財」的行進是這樣佈置下的，安徽省銀行行長，是交給隨他十年做祕書而貪污技術相當高明的張岳靈主持，運用了這個機構，大做其「合法」的經營，將「覓收」來的錢，組織了一個「民營」的什麼公司，據說由張控制下的資產就在七八十億以上，這些當然是安徽人民的血汗結集起來而為他們獨佔的！

據說有一位廣西人曾被派做縣長，辭職歸合肥，窮得沒法，向李求濟，李乃痛責其無能說：「給你金飯碗，去討吃嗎？」這位不貪污的正直君子，第二天就向北跑進共產黨的陣營裏去了！最近他起用了一些嬌親的幹部，以他的弟弟（又說是姪兒）為中心，現任蚌埠市政籌備處處長，雄據在這安徽第二大的都市，另外還派了好些這一類幹部去做縣長，爲了緩和安徽反李情形，祇要是安徽人想做官，而有人紹介，所以有句普遍流行的話：「籍隸安徽，中央八行，就可做大老爺」。李氏是知道征實繳足以後要放下紗帽的，他現正在一不作二不休，來個臨別的聚散呢！

張瀾是怎樣一個人

張瀾是四川南充人，前清廩生，日本優級師範畢業，遜清四川諮議局議員，保路同志會首腦，民初進步黨首領，作過川北宣慰使，川北道尹，四川省長，四川速成軍官學校監督，南充中學校長，成都大學校長，紅軍入川時代的安撫委員長，抗戰時期的參政員，現任四川慈幼會的理事長，今年七

十四足歲。

光是這些名義，頭銜和經歷，並不是他做民盟主席的重要原因。對他的批評，從好的方面說，他是：一、平民主義者。二、人才主義者。三、民主主義者。四、開明、正直、剛毅、前進的中國主義者。但如果要從壞的方面找他的瑕疵，他又十足是高明政客。密勒氏評論上說他是「中國近代有數的學者」，似乎捧得過火，反民盟的人罵他是過去二十餘年內操縱四川內戰的罪魁，也未免把他的力量估計得太高，真正的張瀾，我們應該說是一個眼光遠大，見識卓越，有充分現代知識和頭腦的前進策士。在「保路風潮」中，他進了監獄，始終倔強到底，在川北道尹任內，上任便殺掉擁有五十餘萬弟兄，左右川北道廿六縣地方政治的「仁字旗」大爺冉射平，在成都大學任內，他明白袒護不合政府標準的教授、學生、乃至工友。若干禁書，他特准儘量購藏，若干校外不滿現狀的人物，他極力包庇、保護，所有「非法」紀念集會，他允許在校內召開，當時的「成大」確乎有點像租界，左的人物在校內絕無問題，可是一出校門便被抓走，他招考學生絕端嚴格，題鶴甚高，但並不注意文憑的真偽，「楊作霖」借用「陳作霖」的文憑考進學校，他允許還他的本來姓名和籍貫。當時的「成大」學生會恰如過去的政協會，各黨各派都有，他允許信奉三民主義的健行社，信奉共產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社，和信奉國家主義的揚社同時存在，在校內公開活動，每月由學校各撥經費二百元，作正式開支，讓他們各出刊物，公開鬭爭。

他對於教職員，祇問學識、能力、道德、不問其思想信仰和立場，他同時聘請了國民黨的黃季陸、曹四勿，和青年黨的李璜、陳啓天作教授，也聘請了那時還沒有完全脫離共產黨，正在要求恢復黨

籍的葉青作祕書，讓其在校內出版「科學思想」，鼓吹唯物史觀和馬克斯學說，費用由學校全部津貼；他聘用反對白話文的吳芳吉教國文，也聘請「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吳又陵教諸子；他重用國民黨的吳君毅作教務長，又重用青年黨的魏時珍作理學院長，也重用中立派的張季民作祕書長，和那時還是無黨派的包國華作圖書館主任。每年暑假，都通過教授會派出左、右、中的教授各一人，出川延聘各色各派的著名教授來川講學。

爲了這，當時川主席劉文輝的兩個旅長，硬說他是共產黨，親自帶人去他的住宅搜查過，若干學生及其親友都爲他捏一把冷汗，他却依然一聲不響，照樣不帶衛隊，沒有車子，一早便從支線石街步行到學校去辦公。民國二十二年，中央勢力入川之初，他召集全川師長以上的軍官開「廣漢會議」，提出「川人治川」的口號，雖爲某巨公所不滿，但也不能不在各機關錄用大批川人。

抗戰到最緊急關頭，參政會與政府開起了誤會，參政會對政府的十大要求，經六折七扣變成了四個要求之後，委員長召集各黨各派首要人物開談話會討論，在會談中，他向某要人爭論了兩個小時，會後他又致函王世杰，說明如果下屆參政會里沒有羅隆基、張君勱、梁漱溟、沈鈞儒、黃炎培、李璜等人在內，他是不出席的。第二屆參政會果然沒有羅、張、梁、沈四人，他也果然拒絕出席，經張羣再三堅邀，他託張羣帶去五千餘字的長信給委員長，內中強調委員長的左右「無忠直之士」，爲了這，陳布雷先生罵他是瘋狗。三十三年春間，他出版了「我們需要怎樣的民主」一本小冊子。

在八年的參政員任內，他認識了國內各黨各派的首要，同他們都私交甚篤，他請過梁漱溟到南充去演講，同黃炎培一起生活過，他同李璜、曾琦等是舊識，而且往還甚密，他支持過羅隆基、張君勱

等人的立場，同情過他們的遭遇，至少在道義上給予過他們的援助。他同沈鈞儒、李公樸等人討論的若干時事問題，普遍地對若干不滿政府的人士以保護和支援過，最後他供給了民盟初期活動的便利、費用、和開張的「鋪面」。當民盟在成都尚未完全公開的時候，會議是常在他們的住所舉行（即鄧錫侯所供給的南門外巨宅），省黨部函逼省府去函阻制，他用私人名義回函曰：「此事由濶個人負其全責，貴府無庸過問」。

因為這件事，反對他的人叫做「錯牛」（五川人稱蠟強人之不敬語），但尊敬他的人都稱以張先生而不名，或直稱其字曰「表方先生」。他也如于右任院長一樣，長了一嘴好鬍子，因此，他的學生又往往稱他爲「鬍子」。

他爲什麼能如此？下面的事實也許可以答覆你一半，其餘的一半，你可以從上述的事實中自己去找尋。

民國以來四川當權的軍人中，「速成系」的劉湘、楊森、王懋緒、潘文華、唐式遵、賀國光、鮮英是他一手教成的學生。王陵基是他聘請的速成學校的教官。「士官系」的熊克武、劉存厚、賴心輝等是他留日時代的同學。「保定系」的鄧錫侯、田頌堯是他的拜門學生。劉文輝與他雖無關係，但他是劉湘的公叔，借着劉湘的勢力長大的。成都大學辦了七年，前後的教職員和學生，約計五千人，都是抗戰期中各界的各級首要，特別是劉湘和鮮英，不特是他的學生，還是他一手提拔的幹部，與民盟最有關係的鮮英，作過四川的師長、參謀長、和行政督察專員，在重慶上清寺一帶有房屋，還有成渝

龔德柏與救國日報

在副總統競選開始的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二時，副總統的票數還未揭曉，大多數人正集中注意開票的時候，南京却發生國大代表搗毀救國日報的事件。

據救國日報的人說：是日上午十一時五十分，突有國大交通車第三〇九四號及三〇六七號兩輛，開到太平路娃娃橋口救國日報門口，車上走下國大代表約七八十人，下車後先將該社大門及門口貼報牌取下，旋即擁入社內，毆打營業部職員，並將營業部和資料室的電話傢俱等搗毀，後來又至二樓職員宿舍，搗毀傢具，並將職員沈俊秀、胡雲濠、仇仲文等六人打傷。當時有警察趕到，把門的人告訴他：「我們是國大代表，你們不用管。」不許他們入內，等到搗毀完畢，即在門口塗寫「打倒軍閥走狗龔德柏」，然後登車而去。十二時五分，這兩輛汽車開至曾公祠二號該報印刷廠，將印刷機九架及全部鉛字澆版機石印機紙張全部搗毀，現在救國日報社已依法起訴了。

同時，廣東國大代表高信等也在國大休息室招待記者，說明：事件起因係由於救國日報第一版刊載「廣東代表不投孫科的票，一個廣東代表的來函聲明」的一篇代論，廣東代表集團前往質問此一代表為誰，並索閱原函，報社方面避不答覆，彼等認為「造謠」，乃予搗毀，且對救國日報將提起法律訴訟，並須向全體廣東國大代表道歉，當前往搗毀時，據稱代表中有張發奎、沈哲臣二人亦被毆，究竟這一次事件誰是誰非，我們不想下判斷。筆者僅想在這裏把救國日報作一簡單的介紹，使大

家明瞭國大代表爲什麼要和救國日報過不去。

救國日報是無人不知的極右派的報紙，一向以反蘇反共著名，當國共關係尙未惡化的時候，救國日報便稱中共爲「共匪」，蘇聯爲「蘇俄」。其實救國日報不止是反蘇反共的報紙，而且是專門罵人的報紙，他有四分之一的篇幅專門登各種罵人的稿件，甚至對新聞界同業也肆意漫罵。不過罵人的技術甚爲笨拙，隨便給人戴紅帽子，大家因爲他俊潑婦罵街，也就毫不介意了。

救國日報的主持人是龔德柏，早年留學日本，自稱爲「日本通」。抗戰以前，在南京辦救國日報，戰時會在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任職，後來該所主任王芃生認爲他過於狂妄，遂加撤職。他的狂妄實在驚人，例如他戰時寫文章或演講，每每預言日本在某月某日投降，假如不投降的話，砍他的腦袋，但是事實上每次都不中，而始終沒有人去拿他的腦袋開玩笑。他過去時常替大公報寫文章，後來因爲王芸生把他的稿子退回了，他便在別的報紙上大寫文章罵大公報及王芸生是共產黨。南京市長沈怡在大公報上登廣告，他便罵沈怡同情共產黨，他的啓事登在共產黨的大公報上，等於資助共產黨。去年國民黨中宣部派遣記者赴日，沒有選到他，他便大登啓事質問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長彭學沛，甚至說在學校中比彭高兩班，論年齡也比彭大兩歲之類的話，實在使人聽了要笑掉牙根。

龔德柏在重慶相當窮困，本來沒有能力恢復他的救國日報，但是眼見抗戰勝利了，千載一時的機會不能失去，乃設法請人介紹給何應欽，以陸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的名義，隨着冷欣第一批到了南京。於是他向冷欣將軍說：「我要恢復救國日報，但印刷器材一再遷移，很難復原，現在不能辦報，我想以少數代價，向日本人手裏購買，免其逃避。」冷欣答應了他的要求，他便向日本木村、岸田談

判，接收了他們所辦的華中印刷所，同時又接收了日本派遣軍總部印刷所的黑報紙及道林紙，這次被搗毀的機器與紙張，便是這樣接收來的。後來國民黨中宣部認為該報不能私自接收，會派張文伯前去接收，暫交他保管，敵偽產業處理處南京分處成立，想加以另行處分，去年會鬧得一塌糊塗，這場接收案後來不知如何結束。

這一次副總統競選，龔德柏認為又是一次好機會，乃與程潛閻錫山等拉攏，由程等輔助一些經費，幫助他們宣傳，於是救國日報便經常在會場免費贈閱，在於李程桃園結義以後，救國日報曾發表一篇社論，題目叫做「我們反對孫科担任副總統」，對孫大肆攻擊，已引起擁孫集團的不滿，而副總統投票那天，他又在報上登著「廣東代表不投孫科的票，一個廣東代表的來函」，以致引起全體廣東代表的公憤，集體前往交涉，要求取閱原函，結果把他辛辛苦苦接收來的鉛字機器及紙張都搞光了，雖然龔德柏可以向人報銷，但是又要費一次力氣了。

民社黨的家世淵源

張君勱先生領導的「民主社會黨」，原是由戰前的「國家社會黨」與一在海外未經成名的「民主憲政黨」，在民國三十四年合併宣佈改稱的，他的前身自然還是「國家社會黨」，所以我們應該先從國社黨說起。

國社黨的組織是在九一八（民國二十年）之後，那時國際上正是希特勒的國社黨大為活躍時期，

大家對於這國貨的國社黨，尙不知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過當時相傳他們多少與北方軍人有些聯絡而已。直到二十一年五月，他們的機關雜誌「再生」半月刊問世，這才正式露出面目來。當時他們的主張是「全民政治」，反對當時的「訓政」，這與當時政府的立場自然不免衝突，因此，也就不能過份明目張胆的活動了。

這情形一直到抗戰發生後，政府放棄一黨專政，邀請各黨各派參加政府，一致團結禦侮，籌組民意機關的參政會，來共同負責抗戰大任，這才彼此默認，於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與當時國家主義派演進的青年黨分別以書面向國民黨蔣、汪兩氏投書，說明他們的主張與中山先生民族、民權、民生三大要義，措辭容有不同，而精神初無二致；並認爲政府態度，與在野黨的要求，不謀而合，所以自當開心見誠，公開予以說明云云。隨即於四月十七日由蔣、汪兩氏聯名覆書，正式承認國社與青年兩黨爲在野的政黨。（原書具載當時各日報）

假使我們要進一步研究它的過去情形，還可以替它慎終追遠的，上溯到清末戊戌變法的康梁。張君勳與張東蓀，都是梁氏的得意人物，尤其對君勳，認爲是可以傳他衣鉢的。

康梁的維新黨，當時是與國父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對立的。民元冬，梁啟超先生歸自東瀛，會另創一「民主黨」，次年五月，民主黨又與當時的「共和黨」及「統一黨」合組爲「進步黨」，由黎元洪、梁啟超、湯化龍、王揖唐、孫武、蒲劍英、王印川等任理事，仍是一脈相承，與國民黨對立着。

後來南北政府對峙，進步黨在會中分裂爲「憲法討論會」與「憲法研究會」，研究會的幹部人物，便是梁啟超、熊希齡、汪大燮、林長民、范源濂、蔣百里、張一麐、藍公武、蒲殿英、王家襄、徐

傅蘇、劉崇佑等，這就是世稱的研究系，而張君勱與張東蓀均是系中的幹事之一。

當民八五四運動後，研究系在文化方面確曾努力過一番，功不可沒。當時他們在北平辦有「北京晨報」，「時事月刊」；在上海辦「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月刊，時張君勱在吳淞主辦「自治學院」，張東蓀在滬主持時事新報筆政。君勱與東蓀同姓同庚而不同字，君勱江蘇寶山人，東蓀浙江杭縣人，他們一直是在一起的，直到前年因參加國大，張東蓀才脫離了民社黨，但據傳二張的私交，仍維持着很好的關係。

反豪門運動是誰發動的

反豪門運動，就是反孔宋運動，實際上豪門還多得很，不過因孔祥熙宋子文二人，為其中魁首，擒賊先擒王，所以一般人的目標都集中在他們二人身上，不過反對儘管反對，豪門還是豪門，當局對他們二人，還相當倚重。講到反豪門的先鋒，當首推傅翼兩大砲。

傅為傅斯年，為參政會大砲，他的大作「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把宋子文轟下行政院長的寶座。傅的後台為北大校長前駐美大使胡博士，事後胡博士陪同謁見蔣主席，不久前以養病為名，到美國去了。一般人的推測，傅之出國，係接受友好勸告，平平宋子文的氣的。龔為龔德柏，為南京新聞界的大砲，他的社論「請殺孔宋以安全國軍民之心」曾得全國報紙半數以上的轉載。同時并會接到部隊擁護信件五百餘封。不過風波的起因，在南京中央日報新聞記載的小數點之錯誤。我們知道

南京中央日報是國民黨所辦的最具權威的一家報紙，而國民黨的內部，大多數人也是反蔣門的。蔣主席下令澈查上海揚子孚中兩公司，已經是數月以前的事情了，因為揚子建業公司係孔祥熙公子令侃主持，孚中實業公司係宋子文介弟子良主持，故一般對之頗為注意。去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記者偶然在財政部發見財政部與經濟部奉令澈查後之會稿報告材料，乃抄錄其中數字，攜回報社，該報編輯不能作主，乃以之請示於總主筆陶希聖，陶考慮良久，囑在第四版發表。但刊出之後，一日間即傳遍全球。

原來中國人民固然反蔣門，就是美國在華商人，因利害衝突，也是反對孔宋蔣門的。早在半年之前，紐約報紙，即常有不滿中國官僚資本的記載，在五億元貸款決定階段，上海美商各商業團體，也會致電華府，反對貸放。迨至後來魏德邁特使自京轉滬，聽取彼邦商界人士之意見時，此事之發展，遂達最高潮。美國商人公然提出在中國蔣門存款項沒有提取完畢之前，美國暫時不予中國以貸款。此項建議，出發點雖不同，但與中國人民的願望却完全相同。因為中國大多數人民，也主張先徵用蔣門資本，特別是美金存款，到不敷應用時，再向美國舉債。外國記者的耳目特別靈敏，中央日報的記載縱然刊在第四版不重要的地位，但也很快的給他們發見了。於是合衆社的電訊立即向世界各國發佈，并註明來源係中央日報。三十日上海各報，大都採用了合衆社的電訊，申報和大公報也都刊出了，不過銷路最廣的商業報紙新聞報却獨付厥如。推究其原因，原來新聞報的社長錢新之也就是孚中實業公司的董事長。照中央日報所載，孚中公司結購外匯為一五三七七八七二三美元，揚公子司結購外匯為一八〇六九一〇六九美元，中國建設銀公司結購外匯為八七七六二美元，照算孚中公司結購為一億

五千萬美元，揚子公司結購爲一億八千萬美元，那當然是駭人聽聞的大事了。而實際上，所謂一億五千萬，祇是一百四十萬，所謂一億八千萬，也祇是一百八十萬，因爲漏列兩個小數點，相差竟達一百倍。揚子孚中等公司，三十一日即在上海各報遍登啓事，敘述真相。八月一日，甚至登到消息發源地的中央日報。此事在財政部官員當然十分着急，因爲事關機密，是不應該洩漏的，但以事實俱在，又不便致函中央日報否認。中央日報，則於七月三十一日在第四版原地位登一加邊新聞，題爲「孚中揚子等公司，結購外匯之實數」，更正爲孚中公司結購外匯爲一·五三七·七八七·二三美元，揚子公司結購外匯爲一·八〇六·九一〇·六九美元，中國建設公司結購外匯爲八七七·六二美元。不過合衆社的報導，它是有成見的，它是否跟着發電更正，以推翻它顯已產生的效果，却是頗滋疑問的。除此之外，還發生一趣味的插曲。

在冀大砲主辦的救國日報，素以反共反豪門著名，自中央日報的消息披露後，該報於七月三十日，即以七粗標題「請先沒收孔宋豪門資本」爲題主張嚴懲孔宋，其結論有云：「吾人希望執政者猛省，家天下的作風是太危險了，不要把一世英名墜于姻戚之手，而重蹈歷史上外戚之禍的覆轍。到今天還不裁抑孔宋二家豪門資本，沒收其財產，則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不料三十一日下午二時，有人打電話至該報恫嚇，於是在八月一日，該報又登出大幅啓事，內云：「三十一日下午二時許，有人以軍統局名義，向本報打電話，謂昨日社論，過於厲害，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多管閒事，否則不利。查軍統局已不存在，顯係孔宋豪門之走狗，藉名恐嚇，本報職司輿論，苟有害國奸人，不論其具有如何權勢，在所必攻，終不爲一嚇而中止，目前孔宋豪門盜竊國家財富之證據，已被發現，本報當盡職責，絕

不畏縮。至於孔宋豪門任何法外行動，自有國法制裁，同人等不畏共匪之暴行，更何論孔宋豪門走狗之暴行也」。慷慨激昂，倒也好像是一篇反豪門的宣言。

孔宋豪門資本，現在正爲國內外人士集中攻擊的目標，國內的攻擊可以置之不問，但國外的小數却必須設法應付，如應付不善，則可能影響美國的經濟援助和鉅額貸款，也有人以爲中央日報的小數點倒錯得非常之妙！開始時雖似漫天風雪，頗感沉重，旋經證明不確，許多人也就淡然置之了。

李公樸聞一多之死

凡沒有到過昆明的人，聽人說起昆明的夏季，總是十分羨慕的。沒有疑問地，從天氣來說，昆明是沒有「暑天」的。雖然在重慶、漢口、京滬等地的人感覺到十分炎熱的時候，昆明還是過着一種清涼的生活，但在昆明居住的人，對於這種清涼的天氣，却不一定感覺到十分愉快。就是純粹從天氣來說，夏季雖然不熱，却先後受「風季」和「雨季」的風雨的打擊。而每年的夏天，追隨季節性的風和雨而來的，總有一些政治上的風雨。

在各種政治上的風雨中，最使人感覺不快的就是「黑名單」的傳說。在近幾年間，每到暑假的時候，總有一些「黑名單」的傳說，有時說聯大要辭聘曾昭掄、潘光旦、王韞愚等教授，有時說雲大要辭聘某某等教師，這些傳說有時並且刊載於重慶的「新華日報」。但經過了夏天的風季和雨季後，這些被傳說列入「黑名單」內的教師全體都照常上課，傳說才告一段落。在前年的暑期中，又有人「黑名

單」的傳說了，正如前年的風季和雨季的風雨比較往年暴大一樣。「黑名单」的傳說也較以往爲嚴重。此次的謠言，說「黑名单」共有四十幾個人，包括批評政府最力的聞一多、張奚若等教授，從事政治活動甚力的李公樸、馮素陶、楚圖南，前年昆明學潮發生前夕參加演講的四教授以及許多已經不在昆明和不少沒有列入黑名单理由的人。有人並且說這次列入「黑名单」內的人不只將被停聘，而且可能會被暗殺。這種謠言大家是不相信的。因爲謠言中所列的四十多人，有許多是絕不會被停聘或暗殺的。就是到了今天——李聞案件已經發生了的今天——我們還是不相信有這樣的一個四十多人的名單。因爲所有原任教職的人，今天都照常收到聘書，並沒有一人被停聘。同時，許多所謂在名單內的人，我們至今還不相信會因政見的不同而被暗殺的。

但是，無論有沒有「黑名单」，李公樸和聞一多兩先生是被暗殺而慘死了！在李公樸遇刺以前，昆明的政局早已有了解瀾。那時，開往東北的滇籍軍隊，在東北「叛變」或「投降」了一師，這一師人據說還自稱「民主同盟第一軍」。那時恰好龍雲第二公子所領帶的一師人，不願奉命他調，自請解散。於是市面上便有許多謠言，這種謠言包括某某等黨派在滇籍軍隊方面活動，希望來一個政變和成立「民主同盟第二軍」。這個時候，教場口事件的出色人物李公樸回到昆明，於是更增加謠言的色彩。不但如此，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曾出動搜查軍火，並且搜查到監察史的案裏，引起不少風波。所以在李聞慘案沒有發生以前，昆明便已風聲鶴唳了。

在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的一個晚上，李公樸和他的太太往南屏戲院看電影，九時散場後即在南屏街口乘公共汽車，公共汽車停在青雲路大興街口的一站時，李公樸和他的太太便下車，準備回到

他們居住的北門街。但同時也下來了幾個衣冠不整齊的人，結果在李氏夫婦沒有察覺的時候，李公樸先生便被刺身死了！據李太太說，行刺用的是一種無聲槍，否則起不會不察覺的。

李公樸這樣的慘死後，昆明市上自然免不了會起了許多傳說，通常有四種推測，一種傳說是國民黨某某等方面所指使的，例如周恩來便會這樣的公開說過。一種傳說是「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人主使的，報上一再傳說龍雲的三公子和此案有關，即因他是這個同盟重要主持人物之一。一種傳說是共產黨的苦肉計，某某等親政府的報即會如此刊載。還有一種傳說是「桃色案件」。凡是認識李公樸的人都一致認為「桃色案件」是不可能的。李公樸和他的太太感情極好，他的爲人也還謹慎，絕不會因男女關係而被殺的。共產黨苦肉計的說法不近情理，因爲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會殺得力的李公樸。至於說國民黨指使的，這自然祇是一種懷疑，在未獲得證據前，無人敢隨便定論。至於「自由民主大同盟」是否有此舉動，也屬推測之辭。

這事所提及「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報紙又一度傳說李案與龍三公子有關，我們要順便對不瞭解「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的讀者，略加敘述。龍雲共有四位公子，大公子現在辦了一個報，其中主持人物不少是和民主同盟接近的。二公子現任師長，正因他那一師的事情，現在在南京久住。三公子是一位江湖的人物，是「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重要主持人物之一。這個「中國自由民主大同盟」又是怎樣的一個組織呢？我所知不多，但有三點是相當確實的：（一）這個同盟是一個雲南的地方組織，至今仍沒有出雲南境外。（二）這個同盟是很右傾的，它是百分之百是「反共」的。（三）它的分子相當複雜，龍三與李案是否有關，我們不知道，報上曾幾次說他與此案有關，但經龍雲在京鄭重

否認後，也就不再有此傳說了。

李案發生後，曾有一似瘋似癡的女人，跑到聞一多潘光旦和若干其他聯大教授住家的宿舍內說了許多「瘋說」，其中有「殺了李公樸，再殺聞一多，再殺潘光旦」的話。這不知是一種友誼的警告，還是一種惡意的恐嚇？自此癡女人出現後，聞、潘等行動已較小心，出入至少都有人同行。

七月十五日李方家屬友人召集各界開了一個大會，報告李案經過。當時聞一多發表了一篇很富於情感而批評政府甚力的演講。他開始就說「我不怕死的！」他隨即向「特務」挑戰，說在場如有特務，請他站出來，給大家看看。誰相當天下午他就給人暗殺！——不，是明殺！——而身死呢！

聞氏被殺前是到府通道民主週刊社辦理一些事情，他的大公子與他同行。約在下午四時，他由府通道回到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這兩個地方相距不足一百步，以爲不會發生事故的。但在他們到達西倉坡後，即有數人向聞一多開槍，聞即應聲倒地，聞的大公子爲保護他的父親，用他自己的身體蓋在他父親身上，被中五槍，因此他也受了重傷。這樣地，一代的國學大師和一代的大詩人，便與世長辭了。

聞案發生後，昆明的形勢相當緊張。潘光旦、費孝通等十位民主同盟的領袖和張奚若教授都避入了美國領事館。他們都受到美國領事館的招待。但他們初到領事館時，局面還是十分緊張。據說保護美國領事館的五個美國兵，每晚都守夜，保證這十一位客人的安全。在這時候，龍雲以前的楊副官長被捕了，主管當局正在追查龍三的蹤跡。昆明市上的謠言很多，一度傳說許多與龍家有關係的人（甚至李培天等）都被捕，事後證明這些謠言是沒有根據的，但也可見當時昆明是多麼緊張。

逐漸地，昆明的空氣和緩下來了。中央限期破案和嚴令保護有關人士安全的命令下來了。教育部代表劉英士到了昆明，把潘光旦和費孝通保護到南京，顧祝同和盧漢主席都來了，民盟代表梁漱溟、周新民也來了。

最後，聞案由中央社公布了，行刺的是雲南警備司令部特務營的兩個現役軍人，聞案時據供是因爲聽了聞的演講，不滿聞所說的話而行刺他的。經過幾次審訊，把行刺聞一多的兩人處死了，李案却沒有下文，這兩大案件就此了結了。

我們對李公樸所知較少，但對聞一多所知較多。聞是一個研究國學深有成就的大師，他本來對政治是沒有興趣的。但是是誰使他從故紙堆中走到政治舞台？頗堪尋味。他是出於熱情和十分勇敢的人，他是「不怕死的」，誰又使這一位不怕死的人終受刺而身死？聞一多死後，是否還有無數的聞一多繼續走他的路呢？

西藏的政治人物

西藏向有祕密國之稱，連我們自己入對它都很隔膜。它的西部和南部，均與印度及英屬的不丹、尼泊爾相接壤，所以久爲大英帝國所垂涎。對於內地，雖東北兩面均與新疆、青海、西康等省毗連，但因交通阻塞，情意難能貫通，彼此僅保持着若即若離的一點關係而已。當勝利之初，蔣主席出席去

年八月二十四日國防最高委員會與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時，曾有一「完成民族主義維護世界和

平」的長篇致詞，內容除對外蒙表示承認獨立，對於西藏則決定予以高度的自治。如果他們將來在經濟條件上能够達到獨立自主，我們政府亦將與對外蒙一樣，扶持其獨立。這是多麼明爽乾脆的表示！

無論如何，我們對於西藏的內情，總應該有一些知道的必要。

考西藏歷史，在明代永樂以前原為紅教（註一）勢力，自宗喀巴（註二）入藏傳佈黃教成功圓寂後，乃遺囑二大弟子，永以化身轉世。其二大弟子一為達賴喇嘛，一為班禪額爾德。（註三）其時第一輩達賴乃係藏王太子，捨王位出家受戒，尼傳黃教衣鉢，因其有二重身分，遂以主教而兼藏王，故傳統習慣上，班禪地位次於達賴。

「達賴」「班禪」均為稱主教之尊號，世非人姓，惟藏人習慣，對主教不呼其姓而祇稱其尊號，所以世人祇知「達賴」「班禪」，而對其每一輩之真名，反不能舉。達賴本蒙古語大海意，謂其語慧廣如大海，藏文譯為最高權力之統治者。班禪一辭，原為梵文「班智達」之簡稱，乃對學者尊稱，謂博學多能，無所不通。禪為廣大意，謂人學問淵博，廣大無匹，歷來達賴駐前城拉薩布達拉寺，已傳至第十三輩。班禪駐後城日喀則城札倫札布寺，已傳至第九輩。

藏中政教兩權，向來時有分合，大致須視每一輩達賴本人能力為定，蓋近年行政組織，其最高主腦為「葛廈」，直譯之為行政廳，乃藏中行政的最高會議機關，其性質彷彿內閣之國務會議。由四「葛倫」組織之，葛倫直譯為高級政務官，彷彿內閣制之各部長，例定為三俗人一喇嘛，此四人以合議制處理全藏立法、司法、行政等民事，「葛倫」係由達賴任命，任期無定。

在「達賴」與「葛倫」間，近年又另設一「司倫」，直譯為政治大臣，其地位係承上啓下性質，

彷彿內閣總理，普通俗人充任，資格須爲達賴屬意人物。「葛廈」議決案件，須先報告「司倫」，經其審核後，再呈達賴裁決施行，前充司倫的「噶杞冷青」，係一青年人物，極爲精幹。

宗教方面，設有「伊倉」處理。伊倉直譯爲祕書廳，職員一體爲喇嘛，由「中譯」四人組織之。「中譯」意爲祕書，專管喇嘛事務，兼及達賴私人文書。藏諺有：「政治四葛倫爲對外四柱，宗教四中譯爲對內四柱」。

軍事方面則由「馬基」負責，馬基直譯爲軍長，管理全藏軍務，直轄於達賴。前充馬基者名「龍霞」，曾留英數年，係一親英分子，達賴死後，遭藏人挖去雙目而死。

故十三輩達賴名「牟尼故海」，西藏人，於清光緒二年轉世，五年卽位，光緒三十年，英兵入藏被逐，遠走印度，民元始回藏，旋對中國宣佈獨立，並排擠班禪出藏，所有全藏軍、政、教、三大權，均在其掌握之中，後又將政務主持人「丁傑德林穆」驅逐，而以其表姪「噶杞冷青」爲司倫。

當達賴宣佈獨立不久，民元八月，袁世凱會接獲駐藏的鍾穎電告，謂達賴有意議和，袁乃以大總統名義，封爲「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但以後內亂頻仍，政府迄無暇顧及邊事，彼此隔膜敵視者達十餘之久年。

十八年八月，英人擬建自拉薩德慶、江卡、到加尼；及自江孜到日喀則之兩鐵路以圍後藏，達賴表示反抗，頗有誠意向內，借當時中央政治力弱，糧長莫及，川邊地方官兵不明大體，致發生康藏軍事糾紛。二十年三月，中央會派唐柯三赴康調查真相，旋達賴電京已令藏兵停止軍事行動，以「貢覺仲尼」爲代表。六月國府錫達賴爲「護國鴻化普慈大師」，二十一年七月，忽又與青海方面發生軍事

糾紛，經代表及蒙藏委會斡旋，翌年五月始告解決，後達賴並對班禪回藏亦表示同意，此時雙方關係，似有轉變現象，不料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達賴竟在拉薩圓寂。

國府對達賴身故，亦極優遇；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南京會舉行追悼大會，中央派行政院長汪精衛致祭，旋又派黃慕松爲致祭達賴專使，於四月二十六日起程赴藏，九月中一行安抵拉薩，十月一日在拉薩舉行隆重祭典。

故九輩班禪名「羅桑吐丹」，西康達克堡人，清光緒九年轉世，十四年在拉薩認定。光緒三十年英兵入藏，達賴走避，當時清廷駐藏大臣有泰會奏請飭令班禪兼管前藏政教，乃胆怯力辭不就，是年冬會隨英太子游印度，歸來仍返後藏日喀則，後因與達賴疏隔日深，互相疑防，並傳達賴將加害于己，遂於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五夜出藏，沿北路荒徑，經青海、甘、涼州而抵皋蘭，備受辛苦，次年往北京謁總統曹錕，報告藏局，當時正值內訌外侮，相繼而來，北庭無力爲援，渠乃趁此周游國內，冀、魯、豫、晉、陝、甘、察、綏、吉、黑、蘇、浙、皖、甯夏等地宣傳佛法。

國府成立後，對他備極優渥，初畀以「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名號，曾在京滬杭啓建時輪金剛法會，盛極一時。二十一年特任爲西陲宣化使，二十三年又任命爲國府委員。二十四年五月，經綏遠伊克昭盟、甯夏、甘肅抵青海，駐塔爾寺宣化。自達賴圓寂，渠更極力回藏準備，實則當時藏中已有實力派執政（詳後節），故好夢終未能圓，竟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齋俱圓寂於青海玉樹行轅。

依慣例：老達賴或班禪圓寂後，即派人四出尋覓轉世之靈童數人，再舉行抽籤決定。十四輩小達賴名「拉木登珠」於二十四年生於青海西甯公湖地方祁家川，母祁氏，其兄爲塔爾寺（在西甯）小活

佛。同時所獲靈童尙有西康二十九旗碧儒方一名，又西藏山南們珠崗地方一名，但因熱振驗掛、觀海、及護法附神所示情形，均與「拉木登珠」符合，經西藏僧俗大會公認爲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故並未舉行抽籤，卽行決定。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小達賴第十四輩「拉木登珠」在拉薩舉行坐床（卽位）典禮，國府會派蒙藏委員委員長吳忠信前往參加主持，小達賴時年僅六歲。

至第十輩小班禪，在三十年七月間報載康定消息：甘孜班禪行轅派來尋訪轉世靈童之人員，已分南北兩路查訪，刻在理化縣屬灌桑尋得靈童「卯土登奪吉」，係康定折多塘人，二十七年十一月二日生，（舊歷）靈童及其父母均留住灌桑會拉等，尋訪人員已返甘孜復命。後據悉：第十輩小班禪已於三十三年二月八日卽位，惟是否卽爲甘孜行轅方面所尋得之「卯土登奪吉」則未詳。

現在達賴班禪均在幼年，當然還沒有能力，實際執政的人物，乃爲「結澤熱振」。藏文「振澤」爲代理統治者之意，「熱振」係人名，原爲呼圖克圖，藏中慣例：老達賴圓寂後，新達賴未卽位前，在此青黃不接時代，由全藏人民推選英明才智之呼圖克圖（喇嘛中之尊者）代理達賴職務，所以十三輩達賴圓寂後，卽由熱振呼圖克圖代攝藏政，國府會於三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明令照准，此公青海人，有才智，有魄力，二十八年夏將司倫噶杞青予以免職，現爲全藏實際上最高之領導者。

註一、紅教爲舊教，黃教則係新教。

註二、宗喀巴明永樂十五年生於青海西寧，爲蒙族人，八歲出家，二十四歲入藏，三十四歲圓明黃教。

註三、額爾德厄爲蒙文寶貝意，係用作封號，班禪於清康熙五十二年被封此號，喇嘛直譯爲上人，亦稱活佛。

江亢虎和它的黨

汪記僞組織的考試院長江亢虎，在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六日已經判處無期徒刑，居然免其一死，在他個人，總算是叨天之幸了。

綜江逆的平生，實在是一個熟中名利的小人，祇是他命途多乖，官運欠通，年過半百，並未到手一官半職，一直到民國二十九年汪記僞府在京成立，號召各黨各派參加和運，這時他才以久已湮沒無聞的中國社會黨，亦即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資格，混到一個僞考試院副院長，後來僞院長王揖唐調主華北政務委員會，他才算扶了正。僅僅過了四年半的官癢，就他個人講，雖說是走了老運，然而也可憐得很。

當民國建立，帝制剛被推翻，各方都在憧憬於政黨政治，這時正是他黨魁夢開始，乃乘勢組織「社會黨」，以社會主義的學說來號召，那時皇帝制剛下台，袁世凱正想創業垂統，一個國民黨已使他頭痛，何能容許你再來宣傳什麼社會主義，結果就被袁氏下令解散了，說這是洪水猛獸的邪說，並且還咬文嚼字說是：江，洪水也；虎，猛獸也。對他個人，則予以拿辦。以組黨被當局解散拿辦，在他個人，到是足以自豪的事，而無形抬高了他的身價。

可是，他所倡導的社會主義，不是「安那其」，不是「鮑雪維克」，也不是「基爾特」，更不是 I. W. W. 據內行人談：他的社會主義實在够不上稱主義，只是「一些社會政策」。那時有一位真正的安那其主義（一作無政府主義）的大師劉師復，把他的言論駁斥得體無完膚，移來師復還將那些文字收集一起，刊印了一部叫「伏虎渠」。所以有人說：當時使他不能立腳的不是袁世凱，而是劉師復。

組織既遭解散，學說又被駁斥得半文不值，當然國內不能容身，乃不得不出洋遊歷，實則當時是拿辦未着而被通緝，那祇好亡命海外了，這是第一次政治投資的失敗。

他在歐美住了八九年，究竟做些甚麼呢？據說那時由清室某王公接頭，專替溥儀等作古董販客，弄點外快。他曾與溥儀通信，居然還自稱為臣。讀者當還記得，有一年溥儀被逐出清宮後，清查宮內文物，即曾發現他稱臣的親筆信件，鬧動一時。

民國十一年左右，他回國了，當然還不忘情於黨，還想完成他黨魁的好夢，這次他是捨棄了北平（當時政府尚在北平）而在上海為根據，先在公共租界（似乎舊麥根路油板廠橋附近）辦了一個南方大學，同時另組一「自勵會」以吸收份子，作為組黨的梯階。隔了兩年，便宣告成了「社會民主黨」，倡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他個人則到處演講，歷經長沙、南昌、濟南等處，大有席不暇暖之勢，頗受地方當軸的歡迎，一時鋒頭之健，得未曾有。不過濟南去見張宗昌時，却未交數語即被端茶送客，張對他說的兩句話，真有點妙，他說：「先生的主義太多了，我實在弄不清楚！」張長腳真可謂腹習多靈。

以這次的情勢而論，本可以有點成就，豈料霹靂來自晴空，馮玉祥於十三日驅逐溥儀，接收清室

時，把他稱臣的文件，被發覺公佈了出來，這一下可糟了，黨魁的人格破產，黨的生命當然完了，於是又不得不走三十六着的上着，他的去處，自然還是海外，這是他又一次的政治投資的失敗。

後來，他便在加拿大紀默大學担任漢學教授，兼主圖書室，直到「九一八」「一二八」諸役之後，國內的政情變了，好在國人又大多是健忘的，於是他又動了鄉思，於二十二年又重回上海。

這次他的花樣變換了，不再抄從前同老文章了，黨的事既厄於情勢，祇好放棄不談了，於是乃披上外衣，以博士的頭銜從事講學，於是便有在文廟按期講經，清涼寺教文（那時他住清涼寺，名其居曰匡廬）並假座新新公司傳聽講券說文化等幾套把戲，又組織所謂「存文會」，一時聞人多被邀入，可是，已餒之鬼無靈，沾泥之絮不起，終於號召不起來什麼人。同時，曹聚仁、徐懋庸所辦的「芒種」月刊，對他明槍暗劍，大施攻擊，也使他十分難堪。

接着他便去旅行綏、晉、冀、察，那時正是德王舉自治的時候，後又旅行到福建，又遇着人民政府的狂潮，他是否有心去投機，當然不能武斷，不過二十四年他觀光首郡，却因闖案嫌疑被衛戍司令部逮拘了十幾天，還是汪精衛爲之緩頰得釋。後來他復去華北，那時華北已有些特殊化，一度傳說他往來冀東股奴耕，但報章並未證實。此後抗戰發生，他的蹤跡也就無人注意了。

他的外形很魁梧，一個龐然大物，面部輪廓肥碩，一付深度的近視眼，說起話來滔滔而極快，作他演講記錄的人，筆頭不敏捷是要「脫班」的，他是安徽旌德人，但他有時也稱江西弋陽人，是清末科舉出身，曾留學日本、比利時、美利堅，曾任京師大學堂教席，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校長，南方大學校長，加拿大獸醫大學教授等職。蘇聯十月革命後，他也曾以中國的社會黨領袖的身份，去蘇考察一

番，所著有「新俄遊記」「南遊回想記」等書，他與汪精衛同年庚，今年是六十五歲了。

九龍城血案始末記

芝蔴大的九龍城，竟掀起了軒然大波，構成了國際間的糾紛，對於不是身臨其境的人，這也許是一個不解之謎。要解說這個謎，對於地圖上都找不出的荻爾九龍城，先來一個輪廓的介紹。

如果以為九龍城是九龍，那就錯了。九龍城只是九龍市區裏的一塊一英里大的地方，是西式九龍中的一座「中國式」的孤城。自從日本人在戰時把殘餘的城牆拆去以後，一片破舊的木頭房子就赤裸裸地露在外面。住在這裏的是兩千多居民，他們只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住的是中國土地，可是，在一八九八年的中英條約上却寫着「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們可在城內各司其事」。中國人說是中國的土地，英國人却說屬於英國，顯然當時的條約是含糊不清的，幾十年來九龍城始終成爲一個問題，一直到最近，這個久懸未決的問題終於爆發了開來，演成了一幕九龍城的悲劇。

去年年底，香港政府明白表示，爲了「防火防疫」，要把九龍城的木屋拆除，要把二千多居民遷出，九龍城的居民聽到這個消息後驚恐萬狀，他們推出代表奔走呼籲，他們要弄明白的是：九龍城究竟是誰的土地？它的主權究竟屬誰，誰來保障九龍城居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當時外交部兩港特派員郭德華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相當堅決而肯定的。他給九龍城的居民吃了一顆定心丸，讓他們相信我國政府至少在九龍城問題上是不會讓步的，不會把主權拱手送人的。

然而，郭德華的定心丸失了應驗，九龍城的居民一覺醒來，却是形勢全非了。

一月五日的清晨，香港政府派出了十幾名西人幫辦率領全副武裝警察二百五十名，帶着銅盔藤牌及防毒面具，另外還有一百多名工務局工作隊員，帶了兩塊黑底白字的木牌，上面寫着「催淚」，兩塊白底紅字的木牌，上面寫着「速即離開此處，否則立刻放鎗」等字樣，浩浩蕩蕩殺奔九龍城，實行拆毀工作。七時二十分，警察首先把南門近審砲位的一間沒有人住的新屋拆毀，西人幫辦命令在場的人分散動手拆毀。當時，拆屋聲，磚木倒坍聲，婦女小孩的哭泣聲混成一片。九龍城居民聯合會代表劉毅夫、朱沛唐等在城區內奔走狂呼，要居民鎮定，唔駛懼（按即不要着慌），有中國政府在進行交涉；很多居民口中都在提着外交特派員的名字，他們還在企盼外交特派員會給他們好消息，然而一直到劉毅夫、朱沛唐相繼被西人幫辦拘捕，一直到九龍城的民房整個被拆毀，依然什麼消息也沒有。

拆屋工作一直進行到晚上六時許，九龍城東隅五六十家木屋沒有一家完整的了，工務局的人員，也已經拆得筋疲力盡，才停下手來，延到第二天再拆。幾百個無家可歸的男女老幼，不願意離開這塊生根的土地，甯願在山頭設帳露宿，他們中有的是在坐褥期中的產婦和出世只有幾天的嬰兒，筆者親眼看到一個產婦，懷抱幼嬰，面無血色，呆呆的坐在被拆毀的廢墟上哭泣。夜裏，每一間被毀和尙未拆毀的木屋前都點着一盞油燈，天是漆黑的，銳利的風，濃厚的霧，一點點燈火，遠看簡直像鬼火。

一月六日午前，隔夜沒有拆動的房子，現在已全部拆光。整個九龍城除了老入院和龍津學院兩座宏偉的建築物外，已成一片荒土，即連一座保存了八十年幾經變亂的石屋也不能倖免。

這一個傳說了一個多月的，屢次被中國外交機關宣佈說是主權治權都屬於中國的彈丸之地，現在

是毫無保障毫無防禦也毫無準備的被拆毀了。

但居民們是留戀他們的土地的，他們仍然露宿在四無圍欄，寒風砭骨的曠野中。他們還在癡癡地等待着外交當局的交涉結果。一位居民說：祇要中國政府說一句話，九龍城是英國地方，我們立刻搬走，但是現在我們只有在露天等候。至於口口聲聲說要主權治權的外交當局又如何呢？

當一月五日早晨，九龍城居民正遭受着條空襲或颶風一樣的襲擊的時候，七點鐘，有一位居民在無援狀態下打了一個電話給外交部特派員辦事處，電話鈴響了十五分鐘都沒有人接。無奈又打電話到郭公館，一個傭人接電話，顯然九龍城拆屋的消息對於外交特派員並不比早上的睡覺更重要，傭人回話說九點鐘到寫字樓再說。

上面已經說過，九龍城居民一面眼看着自己的房屋被拆毀，一面仍寄希望於外交當局的交涉。從五日清晨到六日中午，三十多小時過去了，他們所企盼的人和消息一樣杳然。但人是總要活下去的，一千多個無屋無食的人，經過一度商議，派出了五十個代表，懷悽慘慘過海來到匯豐大樓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請願。那些手上抱着嬰孩帶着尿布的女人，那些腰駝背曲的伯爺公和伯爺婆（按：廣東人對老年人的尊稱）眼淚汪汪的進了特派員辦事處的大門，四個代表會生、梁煥強，胡金、張忠武由區樵秘書引進了特派員的辦公室。

梁煥強第一個開口說：現在重要的問題要請特派員解決，九龍城的房屋已經拆掉了，……但是郭德華還沒有等他說完就回答了，他說得很多，他解釋九龍城的問題不是今天的問題，是五十年來所沒有解決的問題。他說：九龍城主權屬中國，治權現在是英國，產權是廣東省政府。現在交涉正在繼續

中，由王部長和英大使在交涉。

以下是四位代表和郭特派員的談話：

代表說：我們相信中國政府，等候部令解決，但是部令還沒有到以前我們怎麼辦？

郭說：中國政府沒有要你們去住。

代表說：是中國人地方，中國人都可以居住。

代表說：兩個居民代表被捕，特派員應該去保釋。

郭說：這事情牽涉到了大問題。

代表說：現在房子拆掉了，工作地方也自然沒有了，睡露天等於無業游民，九龍城要出來祇有搭巴士，隨時隨地都有被捕機會，說不定還會遣解出境，被拆掉屋的同胞無居無食怎麼辦？

郭說：到香港來總是為兩餐飯，不如現在先找地方住，交涉自然要進行的，這需要候部令辦理。

代表說：現在大家睡在拆掉屋的地方就表示期望政府熱切，希望政府早日解決這項事情。

郭說：住是一件事，爭氣是一件事。

這就是九龍城代表謁見特派員談話的全部內容。一切等候部令，一切沒有辦法，誰叫你住在九龍城？誰叫你生為中國人？

香港當局要拆九龍城的房子，連這次已經是第五次了。現在房子已經拆掉，好像這事件可以結束，然而實際上却是一個新的開頭。為什麼是開頭，這就不容易講了。但不久一定會有層出不窮的新事件出現，所以九龍城拆屋事件，只能說是一個小小的肇端而已。

徐繼莊案前因後果

貪污數千萬萬鉅款，畏罪潛逃的前中國郵政儲金匯業局局長徐繼莊，匿藏了好幾個月，終於一月廿一日夜十一時在香港薄扶林道一三二號被捕了，現在正由香港政府審訊，俟中國政府交出徐氏犯罪的證件後，如港方認為滿意，經過法律手續，就可引渡押回上海了。

徐繼莊自去年十月三日以全國四大貪污案之一的嫌疑罪名，被上海地方法院提起公诉後，因徐事前略知風聲，出入非常謹慎，到十月下旬因蔣主席對此案異常震怒，親下命令付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緝捕，徐氏在某方掩護下偕其愛妾王白梅化裝難民乘搭三等艙逃港，初住九龍尖沙咀萬邦公寓，一度往澳門，返港後匿居東山台，被捕四日前始搬至薄扶林道一三二號友人奧德爾（電影業經紀商）私宅居住，準備候機赴美。

上海警備司令部於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泰安路廿二號徐氏寓所將其太太徐金珊逮捕，始悉徐已避居香港，乃派密探跟踪往港偵察，因徐深居簡出，雖偵察者從徐之友人方面追尋線索，來去港滬數次，終未獲得要領。不久以前，警備部稽查大隊長戚再玉因他的案子被捕後，於是他的行踪便神祕了起來。一月初旬，滬滬警備司令部再派偵緝大隊長羅靜芳率領幹探鄭重爲、馮仲連、趙廣祿等赴港偵察。諸幹員抵港後，即與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郭德華特派員聯絡，由外特處介紹與香港警署，備述中國政府追緝徐繼莊的理由和決心，請求香港政府協助。經十二日之探察，始從徐之愛妾王白梅之行

踪中，獲悉徐之住處。

廿一日夜十一時許，正細雨濛濛，衆警探於週圍佈置適當後，即由西人警員進行捕入。威廉臣警長敲開大門後，即向開門的人說明來意：「據中國政府派來的人說，知道有一個他們要逮捕的人住在這裏，他們想看看這屋子」。在這樣的情勢下，於是，正擬就寢的徐繼莊被「請」了出來。當徐繼莊發現有人來逮捕，立刻變色，呆了半天，才鎮定下來，要求更換衣服，於是便跟警察走出門口，他就被捕了。

徐繼莊被捕後，首先押在荷理活道的中央警署。夜間企圖自殺者凡三次：第一次撕毀襯衣，結成布條縊頸自殺，因布條中斷未果。第二次、第三次則以頭顱向牆壁猛撞，幸被看管人發現，而未得死。警署恐生意外，遂於廿二日午后移押赤柱監獄，特別加以看管。

他的愛妾王白梅，自徐被捕後，即四出活動營救。在法庭上，徐亦否認有罪，並且反對引渡，延請律師予以聲辯。

香港法庭審訊徐繼莊的日期是廿二日早晨十點半鐘，由第一庭法官亞利馬打主審。徐繼莊出庭時身著灰西服，襯衣上未繫領帶，撕去的下襟勒在襠內，徐所還看不出來，近視眼鏡已被取下，雙目凸出微垂，顯得十分憔悴，頭髮凌亂不堪，滿臉倦容。

提堂後，法庭書記即宣讀案由：「被告徐志章，又名徐繼莊，四十四歲，無職業，香港無住址，中國政府引渡之逃犯」。

法官即詢徐對本案有什麼申辯？徐聞言馬上即以上海話回答說：「我絕對沒有罪，如果我有犯罪

行爲，則我不反對引渡！」並聲言要延請律師爲之申辯。

法官當即告以：「此案係一引渡之法案，將解由中國政府審理」。

檢控官威廉臣（香港中區偵探部警察）就在這個時候，亦向法官申述辦案經過，他說：「本月廿一日晚上十時三十分，奉命率警探及負責此案的中國官員，同至薄扶林道一三二號地下，出示拘票，將被告拘捕，落案時被告矢口否認犯罪。」

法庭分別登錄供證，因被告不承認在國內犯罪，故照例應由香港法庭先行提審，屆時並由緝捕引渡方面出庭，出示被告犯罪證據，然後始能引渡。

但據上海派來的人員談：「徐實係罪犯，並非嫌疑，當時上海地方法院發出的是拘票，並非傳票，故徐本身，實爲一逃犯」。香港政府方面，業已通知外特處要求交出徐所犯罪的一切證件，俟證件到港後認爲合格，再經過法律手續，才可引渡，所以辦案的人已急電上海準備正式引渡公文，將徐引渡回國。

徐被捕的第二天早晨，筆者曾往薄扶林道一三二號訪問。

這是一座半山上非常安靜的洋房，在瑪麗醫院上面一個小山坡上，陌生的人找起來是非常不方便的。屋主人是一位六十多歲的叫做 *Powen Odell* 老太太，看起來非常慈祥可親。她和氣地招待我坐在她的臥室裏，她說：徐繼莊才在這兒住了四天，四天前他和他的姨太太王白梅和一個廿幾歲的孩子一起坐了一輛「的士」來的，就住在樓下，她與徐繼莊從前並不認識，他認識一個姓徐的中國人，是做船務生意的，幾天前那個姓徐的來看她，說有朋友要到美國去，住在九龍城不方便，希望在這裏借

住幾天。老太太認爲大家都是朋友，當然可以，於是徐繼莊他們一家就搬了過來。「一個很有禮貌的人，誰會想到他竟會舞弊那麼多的錢！」

據這位老太太說：徐自搬來後，從來就沒有出過門。前三四天裏門口總有幾個不認識的人在旁邊走來走去，也許就是逮捕他的人。

老太太有一個女婿，是一家影片公司的經理，現在到馬尼刺去了，並且有一個外孫，現在還在外面沒有回來。

最後我們去參觀徐繼莊住的那間房子，打開門一看，被蓋還是摺得好好，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的一樣。

徐繼莊在上海所犯的嫌疑罪計有：一，去年政府發行美金公債四億美元，徐經手售出的五百萬美元，竟中飽四百萬美元之多。二，在中國郵政儲金匯業局任內，他利用職權，有侵吞公款國幣一千億元以上的嫌疑。三，據去年九月江蘇監察使署公佈：徐繼莊及其屬員貪污舞弊嫌疑罪有下列三項：第一，承做押匯，不按手續規定，對押匯借款人及保證人信用，均於事後敷衍補查，承放更漫無限制，致遠洋貿易公司擔保的押匯本息計達一百四十餘億元，迄未收回。第二，未奉核准承做外匯，違反該局迭次通電的指示，備巴山銀行一筆，結欠本金達五億元。第三，違反政府法令，承做外匯進口押匯，並且放款未曾歸還，即先行發還抵押品，致立達國際貿易行結欠本息美金十八萬餘元，迄未收取。四，遠洋公司一案，徐投標沖糴島大批剩餘物資，出價五百萬美元，投得後，以七百萬美元售與遠洋公司，由徐繼莊許可彭秉澄向郵匯局透支千億元國幣，而彭則送回黃金數千兩與徐以爲交換條件，因

此徐彭兩人，便假冒十六個商行圖章，做成這件買賣，不料正和銀行一倒，結果虧了下來。

徐繼莊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據徐氏友人稱：徐現年四十四歲，原籍浙江鎮海，在金融界鉅子中他是最年輕風流倜儻的一個。他的父親徐青甫是浙江財團有力的人物。徐初為中國銀行練習生，後往美國研究銀行學，返國以後即在銀行界服務。最初跟黃郛在北伐軍經理處做事，不久便成了黃郛的契子，就因這種關係，再加上他父親與當軸的師生關係，徐剛過三十歲，就進了中央銀行，做過濟南、九江、漢口分行的經理。當豫鄂皖贛四省農民銀行擴充成立中國農民銀行時，第一任總經理郭外峯死了之後，他便扶搖直上，被中央破例賞識，任為總經理。在這個時候，他還是一個清廉嚴謹有為的幹才，也就是在他任內，農民銀行才逐步發展成爲國家銀行中四大行之一。據說農行在英國德納羅公司印鈔票，照例公司要送一筆巨款給總經理做禮物，他却將這筆厚禮原封退回。同時，他也不任用私人，甚至他叔叔介紹的人都遭到他的拒絕。

中國的官場是罪惡的淵藪，終於在日黨月染之下，他變成了一個同流合污的官僚。一九三四年接長郵匯局，他就完全的轉變了。

他活名釣譽：一九三九年在香港他熱中了體育，在郵匯局裏發養了一批終日不辦公的球員，挪借公款，出資興建東方會的七姊妹游泳棚，資助東方體育會，南華體育會，創立香港銀行體育會。一九四〇年徐享領隊的東方足球隊遠征菲律賓、南洋一帶，全部開拔費都是他墊借的。

他愛玩女人：所以在重慶時代喜歡多用女職員，使儲匯局變成了重慶數一數二的紫香園，致風流

案屢有所聞。太太隊中，亦有「黑市」「明市」之分，在重慶時曾一度鬧離婚糾紛，付給某太太贍養費六百萬元，才了結這場桃色糾紛。他的太太究竟有多少，沒有誰弄得清楚，但從他已有卅多個兒子來說，也就可知一般了。

他熱中地位：在重慶時代爲了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耗資達數千萬元，結果弄到一個候補。

勝利後到上海，他又愛上了跳舞，以重金買得上海米高梅舞廳的紅星玉白梅的青睞，而與之同居，專房擅寵。以黃金二百八十餘條購得極司斐而路前上海市長錢大鈞的別墅，金屋藏嬌，內部陳設之華麗，素有上海廣寒宮之稱。

他以爲有靠山，滿不在乎，終於鬧出了這個大亂子，而揚名海內外，成了一條臭新聞的主角。

救濟特捐的由來

財產稅經過了漫長的「蛻變」變成救濟特捐，原先徵課對象是豪門巨富，現在已變成全國公攤了！而且，勸募總目標僅十萬億元，若以美金計算，不過三五千萬而已。在私人存在外國銀行的四十八億存款中，僅爲一百四十四分之一二，即使全靠由外國存款階級拿出，也是九牛一毛，何況這些人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爲」的角色呢！

記得在七八年前，那是抗戰初期，很多經濟學者都主張開徵財產稅，因爲軍火戰費在在需錢，政府完全增加通貨發行，不是辦法，應該平均財富，本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以廣財源。這個意

思，也就是要發國難財的人掏出錢來，這種聲音，雖然已經得到國內外輿論一致讚同與支持，可是，政府沒有澈底實行。

重慶開參政會的時候，幾次提出正式提案，請政府「迅速辦理」，復員以後的參政會，又舊案重提。同時國民黨二中全會上，全體一致通過，請政府徵課財產稅，立法委員亦以不動聲色熱烈研究這個問題，並成立正式建議，請政府立即實行。監委們也作同樣主張，在國內外輿論一致催促下，財產稅已勢在必行，結果一再拖延，外國報紙也等得不耐煩了，竟直率的提出批評說：「中國政府是有錢人的政府，至少，可以說政府對富有者是偏袒的」，這種批評，雖嫌過火，但也有幾分道理，在那些要人中，清風亮節之士固不乏人，但富有者為數亦不在少數。可是，他們怎麼願意訂定一個辦法來掏自己的腰包呢！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這個「蛻變」的過程，去年年初，財政部會邀集專家討論，在文字上用盡推敲功夫，把起徵點定為五億元，對象是全國富有資產者，外表看起來很公平，實際上是不公平，把豪門巨富為對象，一變而為五億元資產的中產階級。草案訂定後，送請行政院核定，行政院又交全國經濟委員會研討，至六月中旬，全經會開始審查，始而交回財政部重訂徵課方案，繼而決定邀集參政員、立法委員、京、滬、民意代表開座談會，九月中旬，全經會改定財產稅名稱為建國特捐，並訂好了「建國特捐條例草案」，呈請行政院核示，立法委員們等得心焦，又再度決議「促請行政院速訂辦法」，行政院遂呈請國府核示，於十二月十二日國務會議正式提出，決議交財政部研究修訂，一直到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國務會議才正式通過，建國特捐又改定名稱為救濟特捐，範圍也就日漸縮小了。

孔門四傑

孔祥熙先生號庸之，他的爲人，正可以用他的號來表現得很清楚，也可以說最恰當沒有了。然而，這樣一個平庸的人，却做到一品大員，掌握了抗戰前後的經濟大權，這也是一件奇事。在中國，政治上以及任何方面，只講關係，不講能力，遑論品德。孔爲國父之連襟，後來又爲蔣主席之連襟，自然不愁不飛皇騰達了。孔爲山西太谷人，家裏本來有錢。在民國初年前，銀行錢莊未發達前，山西票號左右了全國金融。太谷人又執山西票號的牛耳。孔家也有二家票號，一家在青島，一家在北京。以前沒有囤貨，也沒有銀行錢莊之類，山西有錢的人，就把銀子鑄化在地窖內，這樣強盜來了，也搶不去，所以稱爲「莫奈何」。那時山西論人財富，不曰金條而曰「莫奈何」。莫奈何自然也有大小，普通都在千兩左右。孔家當時有三個「莫奈何」，雖算不得首富，自然也是在太谷城內稱得起的一家。前二年，有不少人攻擊孔，他自己說：「我本來有錢，做了官自然也積聚點下來，我自己又省吃省用，這才有錢多。一般窮小子，自己不會弄錢，就攻擊我，太無聊了」。孔確是本來有錢的，自然大家不會否認，然而減爲中國人存在美國的美金最多的五個人之一，不能說與「官」沒有什麼關係吧！

孔爲山西人，既然稱孔，所以他常常自稱爲孔子之後，至於什麼時候由山東搬來山西，他自己也不清楚。曲阜孔家，倒也願意認他這位同族的人，反正向財政部領錢，可以便當一點。在民國二十九年，後方反孔運動已十分普遍，昆明尤爲激烈。那時孔還自持無恐，乘了蔣夫人到昆明去視察，他

也到昆明西南聯大去演講。他一登台，開頭便說：「近來有不少人攻擊我，這都是無中生有，其實我是姓孔的，我那裏會做壞事呢？我們孔氏門中，向來沒有壞人的。」西南聯大的學生聽了覺得好笑。等到孔第二次再去時，西南聯大的牆上貼了「孔氏門中，並無此人」。孔自己看到，也做聲不得。

不管多少人攻擊孔，說他生活奢侈，甚至有人在民國二十八年時，說他每天吃的水，都用飛機自香港運來。這話，未必可靠，孔雖考究，然而香港水究竟帶點什麼味兒，照化學成分分解起來，也仍是出口而已。孔在民國二十九年，在重慶便提倡節約食糧運動。他主張吃糙米，他主張吃雜糧，他還組織了一個營養學會。這番舉動，有誰能來相信他呢？

孔的用人，也是另具隻眼的，他非常賞識高秉坊。高是孔當大權時灼手可熱的人物，氣燄之盛，開了稅吏之先例。高為山東人，跟孔歷史很久，孔當青島電報局長時，高便當庶務科長。高有一特點，就是替公家採辦用品，都用比較少的錢去購得，多下來的錢，就買些實用品送孔。高對孔說：「這樣公家照舊把公辦了，沒有遺誤，私人也有利益，豈不公私兩便。何必一定弄得公私兩困呢？」孔對高非常佩服，認為不可多得之幹才，所以後來高就跟孔一步一步地升上去。孔的用人，注重幹才，所謂幹才，就是經營商業的才能。孔常說：「凡對於經濟沒有辦法的人，對於任何事都沒有辦法。」又說：「對於自己經濟不會打算的人，那能會對團體或國家打算呢！」孔抱了這樣的用人方針，結果他門下的經濟學士，自然是多財善舞了。在戰前，已有孔門四傑之說。這四傑，都是在孔氏手下掌握經濟大權的。那四傑呢？就是：「宋子良」「徐堪」「陳行」「鄒琳」。宋子良為宋子文的介弟，戰前已任中央信託局經理，戰時主持西南運輸公司，這是全國做生意最有苗頭的地方，然而他替國家沒有

辦好，在自己呢，却不負姐夫孔祥熙的期望。陳行爲中央銀行副總裁，勝利後以財政部特派員的名義來上海主持東南金融。徐堪辦理糧政多年，說起糧政弊端，有人說已查明者有一百二十種之多！鄒琳主了十年的財政，成績何在，很難說得清楚。

所謂孔門四傑，如此如此而已！

國大糾紛真相

國大代表報到，是在三月十八日開始的。各地代表，紛至沓來，日有數起。南京城內裝飾得喜氣洋洋，大會堂擴大了，門前新建的照壁，綴有「中華民國萬歲」六字，和「天下爲公」的橫額，閃閃相對。兩座綠色大牌坊，繞以松柏，配着紅字，富麗堂皇。六百個職員忙得不可開交。代表們從四方八面齊集首都，餐館旅舍早已被定一空。百輛大汽車穿梭街頭，惹得市民望車興嘆。對於齟齬的南京市面，國代們之來臨，宛如打一針繁榮的興奮劑。

每一代表月領膳費一千四百四十萬，宿費九百萬，如果會期超過一月，再行補發。另外每人辦公費一十萬元（暫定），旅費開支四千萬。當然，代表們自己也要帶錢來南京零花的。各省市地方當局，照例要致送一點敬意，其名亦爲旅費。上屆制憲大會時，某省當局會創最高峯，每位代表致送三千萬。今年的法幣更不值錢，平均每位代表從當地獲得一億的路費，不能算是高的估計。至於縣政府的敬意，可以不必估計數字。到會的代表，計有兩千八百餘人，每人所領得的路費公費及地方當局敬意

等，曾以二億計，合共五千六百餘億。這批來自偏僻小縣的貴客，既到首都，免不了要購置一番，歷酬一番。

據說司徒大使曾有過緩開建議，其原因與和諺有關。制憲的國大是國共分裂的起點，行憲的國大能緩開，或者還可以做試探和平的文章。但和諺既如曇花一現，所以司徒的建議也只好付之流水了。

國大是三月二十九日開幕的，但選舉糾紛臨到開會的前夕還沒有解決。國民黨爲着保證民青兩黨的名額，發生了政黨提名與簽署當選之爭。在選舉法上，二者本來是並立的，事後在國務會議上又通過了一條選舉補充條例，黨員非經政黨提名不得當選。這本來與法不合，只是爲着保證兩黨名額而設的，糾紛也就因此發生了。

未經政黨提名而簽署當選的國民黨員，共有六百餘人。這六百餘人發生了退讓問題。其中應讓與本黨的是三百人，應讓與青年黨的一〇一人，應讓與民社黨的七十人，有已協議退讓的三十七人，已預寫辭職書的六十四人，提名時因未寫辭職書而被取消資格者二十七人。於是，這些退讓代表，組織了一個「民選代表聯誼會」，向中央請願，要求發給當選證書。他們的理由是護憲，意志非常堅決。

正當問題鬧得難分難解的時候，首都新民報上突然發表了某教授的一篇爲簽署代表打抱不平的談話，說民意選出的代表，任何人不能任意變更名單，並以歐美選舉爲例，說得頭頭是道，這可影響了中央的決策，由司法院作簽署代表於法有據的解釋。於是決定同黨的不再退讓，但以黨護黨的原則，友黨的仍須退讓，這個原則仍須維持。這樣一來，問題簡單了不少，六百多個簽署代表，減弱了一半的力量。

蔣主席對這件事也感覺得棘手，幾次對選舉嘆氣，認為「黨人太自私，不爲我，也不爲國」。在中訓團十週紀念會上還批評了某部長一頓，認為「既然控制不了黨，談什麼保證名額」。其實某部長心裏明白，主張政黨提名的不是他。辦黨的成績是要黨員在競選時能夠勝利，不是要使黨員失敗，異黨當選。政黨提名和保證名額，是別人爲着拉攏民青兩黨參加政府玩的把戲。所以陳立夫先生接見簽署代表時，他充分表示了同情他們的意思，答應可以發給證書，要他們找吳鐵城去。吳氏也有說不出的苦衷，政府要對民青兩黨履行諾言，否則他們將以退出政府爲要挾。好在簽署代表減少了一半的力量，退讓給民青兩黨的一七一人總好想辦法。誰知民選的代表一致行動，加緊請願，清晨去看吳鐵城，深夜坐候陳立夫。日夜不息，輪班坐候，張厲生被弄得沒有辦法，曾自請處分。他說，誰叫當時選總誤聽黨的約束，而沒有把民選票多的即行公佈。

至此，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因爲簽署的不讓，而中央提名落選的也請願不息，在中央黨部雙方天天唱對台戲。中央在沒有辦法中想出了一個辦法，凡肯退讓的，組織戡亂動員委員會來容納，其待遇爲簡任一級。但會爲選舉而傾家落產的，那在乎這一官半職，風潮還是不能平罷。中央提名的以維持黨紀爲理由，簽署當選的以護憲爲名目，各不相下。但後者的理由要比前者的光明正大些，於是當前者屈服的時候，後者又有一幕精彩的演出。

蔣主席的最後王牌使用出來了，首先召見了中央提名代表，說他們沒出息，中央既已提名，反而落選，有什麼理由再來吵鬧。他們被主席一罵，一口怨氣放在肚子里，只好唯唯而退。蔣主席同時召見簽署代表，說明政府不得已的苦衷，本黨的以法解決，不再退讓，而退讓友黨的，是一個政治問題

，希望善體國家這番苦心，以退讓爲榮譽。主席還發表了一篇聲色俱厲的談話，公告全國。在以往，以主席之威嚴，當然可以迎刃而解，不幸得很，簽署代表却依然不肯遷就。

在開幕前夕，民選代表周游、顏澤滋等十人跑到大會堂去絕食，李化成更登報聲明，不能讓與漢奸張願，要絕食到底。經洪友蘭去勸說無效。而那位候補民主烈士趙遂初也一定要抬了棺材入會堂。雙方堅持至深夜，問題還不能解決。偷真把棺材抬進會堂，未免太不像話，旁觀的人到處在說，國難中演此一幕，真有抬棺沖喜的意味了。

中央的要員一方面要和民青兩黨最後協商名額，一方面要處理這吵鬧的簽署代表問題，弄得進退兩難。當民青兩黨代表前來報到時，而簽署代表仍然未去，並繼續絕食。但深夜中十代表忽告失蹤，棺材也被不知名的大卡車劫掠而去，用強力清除了開幕前夕的會場。

當初有人曾試想用和平方法解決。主張提名與簽署各担任三年，也有主張提名者以遴選方式當選出席，但都遭民青兩黨拒絕了。

民青兩黨也自有其苦衷。青年黨原來提名的是三百名，民社黨二百六十名。而選舉揭曉時，正式當選的，青年黨只有七十名，民社黨六十八名，徐溥霖氏說：假若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名額，我們也不說什麼了，而且現在只有五分之一，面子上實在過不去。幾經商量，國民黨答應在簽署代表中讓予青年黨一〇一人，民社黨七十二人，其餘再由緩靖區的名額補足。民青兩黨後來又有重選的名額，民社黨二十七人，青年黨十九人。他們爲什麼如此努力爭取名額，試看民青兩黨提名的黨員中，有布店大老板，有公司總經理，更有不少跨黨的土豪劣紳等。有人說，這是出了法幣或者金條買來的，試想，

假若不能當選，如何還清這筆欠帳。

除了代表退讓問題以外，熱鬧的場面，要算副總統競選的風波了。

副總統的競選人共有六位，李宗仁最早表示競選。孫科、程潛、于右任、莫德惠、徐溥霖表示得晚些，而來頭最大的孫科院長。足與孫科對抗的，可以說只有李宗仁，他是桂系軍人的領袖，廣西方面的選票已無問題。而他利以來在華北的作爲，也能博得華北人士的擁護，再加白崇禧幫忙打入西北代表，故早有一般人推測，孫科在職業團體代表中佔優勢，李宗仁在區域代表中佔優勢，據說莫德惠和程潛的競選便是有人授意企圖分散李宗仁在東北代表與軍人代表中可能得到的票數。

到了簽署提名副總統候選人以後，各方競選的角逐已到短兵相接的地步，這一階段已不止是孫科的鬥爭，而是于李程對孫的圍攻了。他們認爲依照總統副總統選舉法的規定，須有代表半數以上的票數方能當選。但計算一下，却沒有一個人有此票數，於是李宗仁乃向于程提出休戰協定，集中力量對付孫科。他們認爲CC固然擁有三分之一的代表，但其中難免有人自由行動，再加上太子派自己的基本票，一時也不會有半數以上。依照總統副總統選舉法的規定，須有半數以上的票數方能當選，假如候選人中沒有人得到這一票數，則就得票較多的前三名重行投票，如無人當選仍舉行第三次投票，如第三次仍無人當選，則就第三次中得票較多的二人中，圈選一人。孫科既不能一次得半數以上的選票，所以大家約定第一次選舉中各自比武，到了第二次選舉則三人中將所有的票數支持其中得票最多的人。李宗仁在三人中本來得票較多，再加上于程兩人的支持，自然更有希望。

事實果然不出所料，在四月二十三日第十六次大會選舉副總統時，沒有一個人超過半數以上的票

數。開票結果：李宗仁七百五十四票，孫科五百五十九票，程潛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四百九十三票，莫德惠二百一十八票，徐溥霖二百一十七票。選出李宗仁孫科程潛等前三名，在二十四日第十七次大會重選。

十七次大會選舉的結果，計李宗仁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孫科九百四十五票，程潛六百十六票，雖然李宗仁的票數還未達到法定的票數，但比孫科已多二百十七票，第三次選舉時，只就頭二人中圈選一人，程潛已無希望，自然將選票轉移於李，那末李宗仁又要加上六百多票，自然較孫科優勝，故李宗仁的當選，照理不成問題。

正在這萬分緊急的關頭，程李突然放棄競選了，這樣，孫科就無法一人獨選，亦非放棄不可。於是，孫、李、程三人都放棄副總統的競爭。

二十五日下午，中常會開會討論此事，由蔣總裁親自主持，報告三人聲明放棄，國大主席團無權接受，必須要大會表決，希望三人不要放棄。中常會乃決定派大員六人分三組往勸三人，繼續競選。下午擁李代表在重慶安樂廳決議，仍請李競選。擁程代表亦於中央飯店開會，公請程氏競選。孫則向記者們表示競選是義務不是權利。擁李程代表中立者復組織民主憲政護憲運動會，準備反攻統制。另一方面，孫李二方的競選活動，並未因聲明放棄而停止。李的人仍到處拉票，孫的人也積極活動。二十九日四次投票之後，李宗仁以一四三八票對一二九五票戰勝孫科，兩過天晴，總算結束了這場好戲。照此說來，「絕食」「抬棺」「放棄」「再選」，這些把戲，都是相反相成，倒為這次國大添了不少風光。

民主促進會內幕

注意西南問題的人，絕對不會疏忽李任潮所領導的民主促進會的活動的。不久以前，國民黨中常會決定開除李濟琛黨籍，最近廣東省參議會駐會委員更電請中央政府通緝李等，可見民主促進會的行動值得重視了。

若要明瞭民主促進會的內幕，非先解剖李任潮（濟琛）、陳真如（銘樞）、蔡賢初（廷鍇）等三人政治環境的變遷不可。陳真如表面看來是個很平凡的人，論文論武，他都無特點，但他思想稍為「前進」，他不僅懂得懷疑一切現實，而且會批評現實，他之所以有此成就，一因他愛好這個調門。二因幕府中有幾位學者。真如在北伐時期，是蔣主席的健將，除任主要軍職外，且曾任總政治部主任，而且直至闖變之前，他身兼京滬衛戍總司令及交通部長兩要職。當時蔣主席對他倚畀之重，可以概見。及至真如發動闖變，一般人才覺得希奇古怪。其實，真如早已受了幾位左傾思想條客的影響，他早對三民主義發生動搖了，不僅見面言談，而且會寫成一文呈與蔣主席。此外，政治環境刺激了他也有關係。如當其任右翼劉匯總司令時，率軍南渡，前進頗為得利，因共產黨發動工農游擊軍，始有敗績，當時損兵敗將者是得不到人們同情的。他日墾工農環境實況，一時心血來潮，認為國民黨本身應有改革必要，會擬具「社會民主黨」辦法條陳蔣主席，但蔣主席置之不復，李則對之極為誇獎，真如當然亦自命不凡，遂利用當時在贛之權力，決意試驗其見解。除起用了許多A B團分子外，並在上海設

立幾種文化機關，收羅文士，其中最顯著的是神州國光社。從此，陳真如整個便爲A B團所包圍了。蔡賢初是個老粗，談不上什麼政治思想，他因爲在滬抗日，一戰成名，許多人給他戴高帽。李任潮的歷史原不必介紹，最顯著的是，他打天下到處碰壁，應注之邀而釀成粵變，在閩組織「八民政府」而曇花一現，幸而中央對他寬太，鬧變之罪，一筆勾銷，在抗戰時期復有東山再起之象，A B團分子到處活動，在各黨各派合作運動中，他們也抬出了「民主促進會」的招牌。

民主促進會的內容與社會民主黨相同，其唯一特色乃「不准帶一條槍入會」，這自然是不以武力爲後盾，但其路線中心已數變，而共黨機關報會爲其大吹大擂，自然容易陷入於複雜的狀態，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去年九月間，「民主促進會」與「民主同盟」初由交換情報，終於在香港開聯席會議，其決議有：

(一)「民會」(民主促進會簡稱)與「民盟」活動範圍之劃分，前者曾以退伍軍人、青年軍官、及海外僑胞爲初期對象，後者以學生及其他社會爲對象。

(二)「民會」先在廣州、汕頭、老隆、曲江、肇慶、羅定、茂名、南海等地成立活動據點，爭取在鄉退伍軍官加入，並組織「福利會」或「研究會」「俱樂部」等，藉資聯絡。

(三)「民會」應運用歷史、感情等關係，爭取目前比較中立之現職將領當局者之同情與支持。

(四)「民會」各部組織盡可能採取部隊形式與編制，俾便日後之發展與活動。

(五)「民會」南方總支部人員由「民會」設法予以便利活動。

(六)「民會」應利用其領袖在海外之聲望，團結海外革命志士，組織海外青年，並進行宣傳活

動，使彼邦人士明瞭「真相」。

(七)「民盟」協助「民會」在國內宣傳活動，並積極支持其發展。

(八)「民盟」人員親發展之情形，將予適當之軍事訓練，以鍛鍊其堅強之體格與意志，此項軍事訓練工作，由「民會」設法協助祕密實施。

(九)遇有重大行動示威、請願、罷工、罷課，或重要指示及宣傳品之運送，「民會」應設法積極支持「民盟」人員自衛與特務活動，或派職員幫助執行。

(十)兩方人員應運用各種名目，隨時變動，以炫惑官兵特務。

(十一)兩方活動之進行，採取顧問制度，彼此聘任顧問人員，用以發展長才，適應工作需要，以完成任務。

(十二)兩方同意經常舉行檢討會報，以求不斷之改進：此項會報，每一週舉行一次，必要時經雙方同意，臨時舉行之。

會後，民主促進會一時頗形緊張起來，蔡賢初進京晉謁主席，表明心跡後，中央已對蔡有所認識，不再為謠言所迷惑了。至於陳真如爲了取信中央，別無他圖，勝利後一直住在南京，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自李任潮登山後，起用舊桂系的呼聲，一度轟傳京滬，李任潮雖以詩明志，惜無誠意，而中共民盟又天天引誘，他遂領導着「民會」挺而走險了。

過去華南的龍運運動是由「民會」主持的，「民會」本來無此力量，「民盟」根據所擬合作協定，將力量交與「民會」指揮，這是千真萬確的。關於武力叛亂方面，南路的張炎（十九路軍舊部）打

着粉紅色的旗幟，妄圖與瓊崖方面的馮白駒部呼應，在欽廉高雷的勢力，漸漸強大，珠江下游三角洲一帶，原有李期錫李潮等人組成的九龍堂，這些人與共軍鄧少康等部，最初因爭奪利益，本來是互相水火，可是現在經「民令」活動後，已匯成一體，「東江縱隊」殘部也有主力人物在整編了。這些就是被人指責姦姦錯要組織民主潯軍的原因吧。

李品仙與唐生智的私交

李品仙先生自抗戰以後，由十一集團軍司令，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第十戰區司令長官，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唐生智自任南京衛戍司令之後，從此湮滅無聞，但他兩人的關係，益加親密起來。李與唐原是保定軍官學校的同志，北伐以前，李一向在唐的部下做事。北伐時，唐之出湘，連戰皆捷，直搗開封，以李的功勞為最多。後來唐在政治上失敗，李的部屬，才歸白崇禧將軍指揮。但李之對唐，仍以長官看待，處處以部屬禮對之。抗戰以後，李以十一集團軍職務，駐節蚌埠徐州，唐任南京臨時司令官，那時上海戰事剛敗下來，南京已無兵可用，無險可守，唐之出山，也是受任於危難之間，準備犧牲殉國的。白崇禧將軍遣蚌埠到徐州時，會對李品仙說：「孟藩（唐生智號）這次很危險，一切後事，又是你的責任了」。李品仙當時為之慨然。第二天他派輕兵一營，祕密開駐浦口，過了四天，唐生智就發生南京突圍之變，李品仙早已預備一營輕兵，把他護送到徐州。

抗戰的幾年中，唐在重慶相當清苦，李品仙在大別山身兼五六要職，他把每月的薪給所得，寄給

唐孟藩一半，每逢年節，又特別送節禮。唐生智向人表示，一生革命，每次失敗，祇有一件事沒有失敗，就是交到了李品仙這個朋友。

民國三十三年，安徽省參政員選舉，除掉中央指定者外，本省選出者，祇有四名。皖八角逐者在五十名以上。每人找中央要人，推薦電報不下數十封，李品仙均置之不理。在選舉前三天，唐生智介紹一位劉啓瑞，請李促成，而劉啓瑞與皖省參議員，又特別生疏，李品仙相當為難。後來他親自拜訪參議會長江彤侯，說明一切選舉他都不參加意見，惟唐孟公介紹的劉啓瑞，他必須促成。中央任何人的電報，他都可不理，祇有孟公的電報，他為公為私，為道義所關，不得不服從。江氏把此意向各參議員說明，大家才一致捧場，劉啓瑞之參政員遂一舉成功。後來劉啓瑞打電報來謝他的厚意，他拿着電報對人說：「劉先生應謝謝唐孟公，我是服從孟公的命令的！」

端納與西安事變

端納所任「顧問」一職，最發生作用的，莫過於西安事變了。而他自己一生的事業和抱負，也不幸犧牲於西安事變之中。

他是初期留華澳籍四記者之一。這四個記者是：一、莫理遜（於民初担任倫敦泰晤士報駐北平特派員）二、端納。三、麥唐納（曾任倫敦泰晤士報駐華特派員，英大使館新聞處處長）四、田伯烈（一度曾在行總任職。最初來華係為雪梨早報担任採訪日俄戰爭新聞，在東北居留甚久）

端納與張學良發生交誼，大約在民國十二年之間，爲了安置這位外國朋友，張曾在北平設立一個「經濟研究所」。十六年奉軍撤退出關，他也隨軍東撤，正式做了張的顧問。從民十七到民二十一年，這是民國史上的大時代，張學良不願日本的威脅，易幟統一。宋子文、張羣、吳鐵城的奔走京滬，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守軍奉命不抵抗，這些外邊迄今尚未完全明瞭其中内幕的大事，端納適逢其盛，誰是誰非，在他正直的心上，都已有了確切的分量。

「一二八」之後，全國民氣益爲憤慨，汪逆利用這一武器，打擊政敵，藉謀黨政上的領導權，張學良作了代罪的羔羊，被迫出國考察，他給蔣主席留下兩樣禮物，一是他自用的道格拉斯大飛機，一是顧問端納。

在這個時間，他與宋子文的交往也很密切，因爲宋先生一方面是張的好友，一方面也極善於與洋人往來。西安事變之時（十二日）他正在上海，消息隔絕，真相莫明，政府其他領袖人物都十分慎重，有的忙於通電以資應付，有的調兵遣將加緊軍事，汪逆也由國外匆匆趕回，希望分贖東西，祇有他很瞭解這個局勢，通電救不了蔣主席，攻打更救不了，他同蔣夫人匆匆商量了一下以後，尙未得到西安方面的保證（因電報已斷）即單槍匹馬遷飛洛陽轉西安。在未去之前，他對張這個舉動還不十分瞭解，去陝之後他十分同情張的立場。

十四日午後五時，他同張見了蔣主席，呈上蔣夫人函件，時西安局勢甚劣，有些軍隊未必都受張的指揮（綏署的警衛即不受張的指揮），張與端納商請主席移住高宅，作秘密離陝的準備。

這一次談些甚麼，外邊自然無從知道。但張對政府的八項要求適於是日公佈，茲錄其要求如左：

一、改組政府。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的一切自由。六、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十五日晨端納冒着惡劣氣候飛到洛陽，用長途電話通知蔣夫人，報告主席的安全和張決無危害主席之意。十六日早晨他接到蔣夫人與孔祥熙的電話，希望轉告張學良，國難臨頭，立即護送主席返京。他立即再行飛陝，當晚電知蔣夫人謂西安將領極歡迎宋子文與顧祝同入陝，這是蔣夫人與他所主張的和平救主席出險的初步成功。

十七日早晨張約蔣百里先生晉謁主席，請主席致函中央令軍事當局在三天內停止進攻，並請派蔣鼎文攜函飛洛陽。主席答應了，寫了一封信交給蔣鼎文帶給何應欽囑暫停轟炸三天，就在這一天，何應欽通電就發討逆總司令，並派劉峙顧祝同分任討逆軍東西兩路集團軍總司令，積極進攻。軍事的進行是與和平計劃衝突的，端納雖然知道主席同夫入均主和平解決，但其中蹊蹺甚多，所以特別電知蔣夫人，告以主席親筆函將由蔣鼎文攜往南京。

在這個時候，幾乎使事態變成惡化。因為軍方聲明不願同西安作談判，而且也不願在主席未離陝之前接受什麼命令。他們的意見，即使信係主席的手筆，也未必是主席本意，但蔣夫人仍不改素願，力主在和平的方式下解決此事，三日期滿後她又力爭延長三天。

二十日宋子文到西安，張學良端納陪同晉謁主席。二十一日宋、端返京，二十二日蔣夫人、宋子文、端納、戴笠、蔣鼎文同機飛陝。二十二至二十五日這幾天，究竟在西安談些甚麼？不便去揣測。

但有一點可以說明，蔣夫人的和平主張，端納用他私人對各方的情誼，終於化干戈而爲玉帛，並且奠定了八年抗戰的基礎。

事後他得到主席與夫人的敬重，在他最後離華之前，他始終同他們住在一起。

抗戰開始後，政府由京而漢，他在國際宣傳上很盡了些力量，到這時候，許多外國報紙通訊社，逐漸注意中國，他是做過新聞記者的，他都知道怎樣報導給他們。抗戰初期中國在國際宣傳上雖然沒有化過多少錢，但確有相當的成功。

聽說他與主席共處的時間中，後來頗爲消極。據說消極的原因有二：（一）他究竟是一個比較民主的環境訓練出來的，所以抗戰初期他常有些議論，令人不愉快。（二）他說張學良的自由是在西安交談中得過確切保障的，他很天真，又因爲他是一個重要當事人，所以他對張的自由念念不忘，每逢有機會便堅決建議應予釋放以參加抗戰工作，這一點更使人不高興。

他不能不引退了，旋即回國休養。聽說主席斥資給他買一個遊艇，常在南太平洋的暖流中盪漾，但是他還不忘苦難中的中國，除常在各地替中國宣傳外，並屢次呈請允予返華服務，都沒有得到答應，據說到馬尼拉後還有電呈請，說在那兒待命，不幸遇到珍珠港事變。

馬尼拉收復，他以重病之身，堅欲死在中國，這種動人的要求，自無拒絕之理。他的病並無起色，在病中聽說他在寫一本書，而沒有寫完，如果他能寫完一本回憶錄之類，必有許多珍貴的材料。

他不是一個頂出色的新聞記者，爲人正直勇敢，留華四十年而不會說中國話，雖聲勢顯赫而並無私產，病榻上他還念念不忘他的最好朋友張學良將軍，每當提起張，他感到非常歉疚。

廣東省議長逐鹿記

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宣告結束，正式的省參議會要成立，這個機關，雖然只是屬於地方政府的諮詢機構，但權限略為提高了一點，因之，所謂民意機關，也就顯得比較體面了。

議長的競選，從前年八九月中已在暗中開始，而正式公開競選的，只有余俊賢、林翼中、林正煊、何彭、羅翼羣等五人。普通一個參議員都不會不要自己的地位，冒昧去參加競選議長，雖然九十多個參議員，任何一個都有競選的資格。例如這次參加競選議長的五個人，都具有比一切參議員更顯要的「政治經歷」的大人物。余俊賢是現任省黨部的主委；林翼中做過陳濟棠的民政廳長、中央政府的副部長、中央委員、和剛剛結束的臨時參議會議長；林正煊，在護法時代連任七年廣東參議會的議員；何彭，以前做過汕頭市長，李漢魂治粵時，一連做了七年的民政廳廳長，另外，他還有一個中將的頭銜；羅翼羣，是中央委員，又是國大代表，早年會做過廣東省委和黨部特派員，一連串的官銜和資歷，成爲這些競選者可以介紹在廣東人民面前的好處。

這次競選，在表面上的確鋪張鬧熱，而競選手段，也層出不窮，變化萬端，各人都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假如我當了議長」的抱負。羅翼羣甚至邀了不少黨國革命賢碩來向記者們標榜，市立民教館還舉辦了民意測驗，在河南海幢公園開票，天行報和廣州日報亦有民意測驗，何彭始終保持優勢，全市報業巨頭也爲他做公開介紹，彷彿輿論在他這一邊。林正煊暗示他不久以前把個人生活狀況報告

蔣主席，得到回電，勸他繼續爲地方服務。這個意思是說，蔣主席周意他當議長了，於是，各人都宣揚廬山上對自己的期望，作爲宣傳的攻勢。一會傳說何形受任中將參軍，國府命令已到了廣東行轅，何將放棄競選。一會何形又聲明並無放棄的意思，且說已掌握到四十一票，多少有點把握，各人有各人的活動奔走的幹部和智囊團，用種種方法來宣傳號召，或說聯何抗林，或說余羅合流，空氣的緊張，彷彿一場戰爭。

但值得注意的是廬山上的壓力，每一個競選者心裏很清楚，一切決定於山上。形勢未決定之前，競選者在漂亮演說的背後，還進行着各種權勢的角逐，林正煊對記者說：「不用金錢誘惑，不用勢力威脅」的話，正是說明競選包括的金錢誘惑和勢力威迫作用？一張選票的行情，黑市是五十萬元到一百萬元，行情的變化，一如金融市場的波動，據說有人手握十頂烏紗帽，九個稅捐處主任的位置，以與選舉票交換。愛琴酒店與國泰酒家的樓頭，投挑報李的「斟盤」，連日不斷，已鬧起市井間的紛紛議論。

到了余俊賢的放棄競選，形勢已經判明了。余俊賢的放棄競選內幕，是高信帶來了一封從廬山下來的長達七頁的密函給他，他才決定退出的。據說這是黨中某系接受了林翼中的忠告的結果。雖然這里也顯出了某系「杯葛」余俊賢的徵象，但不能不說廬山的意向，將要影響作爲黨務領導的主委的體面，這在本人容或是一種損失，因爲他藉着黨務的權勢，掌握的票數有相當的把握，但在黨來說，須要避免開異黨指責包辦的嫌疑。

但廬山究竟中意那個呢？這自然要看各人的神通了，何形有李漢魂背景，羅翼羣兼跨省府和黨部

的聯繫，但總敵不過林翼中，他是合浦的大地主，年收八千担以上的租谷，花費二三千担谷競選，是輕而易舉。而他實際的後盾是做過廣東小黃帝的陳濟棠。自從陳濟棠代表中央宣慰西南之後，他在廣東的潛勢力已死灰復燃。林翼中曾兩度飛京，一上廬山，重得中央的推重，達到他剝弱余俊賢中樞支持的目的。九月二十九日以後，他先後訪張發奎八次，其中蛛絲馬跡，耐人尋味。無怪余俊賢在興高彩烈之際，看到高信轉來的密函怔住了。國泰酒家樓上，早有人在買三對一，賭林翼中的議長，除非「爆冷門」，這個賭博是可以獨贏的。

顯然，暗盤早有規劃，冷門絕對爆不出來，十日十一日的投票，林翼中以先天的優越條件，獲得五十三超過半數票而當選議長。

這裡，有點值得提出的，就是余俊賢放棄競選，形勢一目了然之後，張發奎、羅卓英和余俊賢的談話，一再表示軍政黨三方面的尊重民意，採取超然態度，讓參議員自由競選，於是競選人也一改作風，紛紛發表競選演說，儼然是民主的風度，達到熱烈競選的高潮。一個老參議員慨嘆地說：「爲什麼大家不着重於議案，及有關老百姓福利問題？我很想多費腦筋，但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這說明大部份參議員完全集中精神於議長和駐會委員會的爭奪戰。

不料在最後一個鏡頭，却露出了破綻，在選舉會場拒絕記者參加。正當選舉要開始的時候，大會秘書處主任着事務員通知：「請記者先生離開會場」。說這是中央的規定，於是新聞記者相率離位，找民政廳長李揚敬解釋那法律條文，那條文是：「投票時除投票人及其記錄員，他人均不得擅自在場」。李廳長說那是「硬性」的規定，無法通融。新聞記者一致認爲這次參議會應該公開的，但選舉參

議長，居然拒絕新聞記者臨場，顯然有所祕密，這是「非民主」的。經過討論和交涉，羅主席答應投票時記者們離場，開票時即進場，這是「一半祕密，一半公開」。新聞記者立刻起草一個「備忘錄」給全體參議員，問是否他們的公意？誰能想到新聞記者在這樣熱烈地進行「民主」與非民主的戰鬥，等到新聞記者全體再被邀進靈兵把門的會場時，會場週圍的衛士才把前一刻上的刺刀收到鞘里去。據說投票一度未進行，場內還劇烈地進行辯論着什麼？也許就是「祕密」的所在了！

盛世才如何殺害杜重遠

抗戰以前，新彊在盛世才的蹣跚板政策下，形成舉足輕重的局面，加以魔術的幻變，真相很少被人識破，成了一個謎。當時盛世才的同鄉同學老友杜重遠，「三度天山」之後，被邀主持新彊學院，他被盛世才的那套「禮賢下士」的作風所迷胡，而忽視了笑聲里面藏有毒藥。民國二十八年春，杜重遠就一去不再回來了！

杜重遠為什麼會被捕投獄呢？主要的是盛世才的獨裁心理作祟，他確有甯我負天下人，不願天下人負我的想法。看到新彊學院的學生，對杜重遠的「盲目崇拜」、信仰、與擁戴，惟恐大權旁落，煽火中燒，隨即加了一頂帽子，便逮捕杜重遠入獄了；直到杜重遠死時，恐怕還不知犯了什麼罪。同時，新彊學院的學生也被個別傳訊，「你認識杜重遠嗎？」有些學生毫不考慮道「認識」的弦外之音，直覺的想到：院長怎麼不認識呢？不必說，自然要被禁閉起來。殺一無辜而保「政權」，這在盛世才

是視爲天經地義的事，「甯可殺錯了十個好人，不願留一個壞蛋」，這是他的理論。因此，不知有多少人丟了性命。

盛世才怎樣殺死杜重遠的呢？從起這件事，簡直是曠古的奇聞。當盛世才被迫下台，要離開新疆，調長中樞主持農林部的時候，杜重遠尙在獄中。當時重慶有人到新疆去，想看看獄中的杜重遠，盛世才不好拒絕，把杜重遠從獄中提出來參加宴會。誰都曉得盛世才的監視網之嚴密，整個新疆便是一座大監獄，杜重遠與重慶的來人在席間強爲歡笑，絲毫也不能洩露一點命在旦夕的消息，更不敢奢望營救。有人寫了一個小紙條：「請速營救杜重遠」，放在來客的衣袋里，未及睹視，已爲盛世才的特務竊去，因此杜重遠的死期也就提前來了，最後一次請客時，飯後，每人吃一隻蘋果，可是杜氏的那一隻蘋果裏，已經事先注射了細菌針，返獄之後，腹痛吐瀉，萬萬沒有想到已中毒計，盛世才派了醫生診治，給杜重遠再加一針細菌針，託辭易地療醫，杜重遠從此離開人間，至今不知葬身何處。盛世才爲了消滅他的罪證，從此不再就臺杜重遠了。當他動身來重慶時，爲了滅絕人證，把那位注射細菌針的醫生，也如法泡製的殺掉了！手段的毒辣，於此可見。

杜氏初抵新疆，頗受優待，住宅是一座大洋房，繫獄之後，杜夫人及子女便驅逐往郊外一個破爛屋中，監視極嚴，杜夫人從不敢放他子女出戶外一步，恐怕發生意外，就這樣在苦訊隔絕中苦度六年。直到被釋放歸來，子女都已成了「文盲」，而且健康損壞，病不離身，這是何等慘絕的悲劇！她臨行時，曾一度到獄中去探聽杜重遠的下落。有一位獄中難友，把杜氏被害情形告訴杜夫人，並且堅定的說：「他日對薄公堂，我願爲人證」。可是杜夫人到了重慶後，是因爲勝利與復員，這場官司不知

如何追究了，而盛世才呢？依然是逍遙自在，好像法律對他特別寬容的樣子。

最後，讓我們來談一談一位小丑高滔吧。他是與杜重遠、茅盾、趙丹這一批文化人同去新疆的。當杜氏繫獄，茅盾、趙丹被監視的時後，高滔已經搖身一變成爲盛世才的爪牙，整天化名寫文章在新疆日報上攻擊杜重遠的「罪大惡極」，誰想得到，而且大家還關心他能否自由歸來。當他到了重慶，才知道這位先生早已貴爲盛世才的祕書，寸步不離，參政會開會接受被害者對盛世才的控告時，高滔還爲盛寫了十餘萬言的答辯書，真可說是無恥已極！

國民黨黨團合併經過

這次國民黨在這烽火遍地外交實的當口，召開四中全會，無論黨內黨外，都以爲這個會議對於當前危機，有所決策。魏德邁曾經大聲疾呼，要一個立刻的、劇烈的、廣泛的改革，大家以爲在這個會議中，必定有一番重大的變革。但一直到那篇「爲政不在多言」的宣言發表後，大家才知道這五天的全會，主要的祇產生了一個「黨團統一綱領」，而這個「黨團統一綱領」中最主要的一條是：「所有青年團中央幹監事，一律爲國民黨中執監委」。

黨團合併，醞釀已久。遠在前年，黨的暗流便已波瀾四起。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在抗戰時期武漢一毀時候中成立的。當時南京淪陷，徐州被圍，大家對於國家前途，感覺憂慮，認爲國家需要新的生機，於是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希望培養一批生力軍，真能吸收一批好青年。不過意思雖然很好，實質

上仍不免走上一條老路，使在業已十分複雜混亂的派系鬥爭中，又添了一個新的因素。團長既是最高統帥，聲勢自然顯赫，力量膨脹得非常迅速，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便自成系統。

青年團最初是以復興社等幾個小組為核心的。多年以來，國民黨一直在CC的控制之下，但CC是文人的集團，武人既不得手於黨的組織，於是武人而喜歡辦黨者，自然而然地便易以團為據點。在基本上，團和黨的核心CC系是對立的。所以這幾年來，所謂黨團衝突，大體上就是團和CC的衝突。這個現象確不是當初所想像到的。在最初，打算成年的屬黨，未成年的屬團，彼此連繫，對外發展。但是結果却成爲一個自己抵消自己的局面！這個結果，雖出初料，亦失初衷。好在雙方所擁戴的都是一人，從別的觀點看，處處都表示着矛盾，單從這一點看，却是統一的。

現在一般人都攻擊黨的腐化、無能。辦黨的人，已經混了十幾年，大都發跡，自然不免顯得有幾分暮氣。團中的人則都年少氣盛，力量既然一天一天在膨脹，自然總想法從下面爬到上面來。去年廬山之會，儼然要自立門戶，另成一黨。這些人居然宣稱想另成一黨，自然總有力量在後面支持，否則沒有人敢說這種大不韙之言。然而另成一黨，終不是妥當的辦法。

在研究合併的過程中，大概可以分爲兩派，一爲現實派，一爲理想派。現實派是討論合併的技術問題，反正最高當局主張合併，大原則也就不再討論，祇須討論如何合併。也就是說，中委的名額如何解決，重要的地位如何分配，這些都是現實的問題。理想派則又進了一步，他們認爲所以要黨團合併，是因爲這個黨已不能控制社會，已不能領導人民，而黨團之間的磨擦，亦徒然消耗自身的力量。然而理想派則表示懷疑：是否黨團合併後，即可以控制社會，就可以領導人民。理想派認爲今日國

民黨最重要的問題，不在黨團合併不合併，而在重訂黨的革命路線。他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今日的國民黨，究竟是代表那幾種人的利益。今日國民黨的革命，是爲了那些人「革」的？他們認爲，假如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國民黨還是沒有前途的；假如能够重新確立革命的路線，則黨國合併可，不合併亦可。

團和黨擁戴的都是同一個人。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除了這最高一層以外，團所代表的又是那些入的力量呢？前文說過：團本是以復興社等幾個小組爲核心的，但是陳辭修（誠）兩任書記長，把團作爲黨的「國防部」，大刀關斧的整肅人員以後，原來的別動隊，在康兆民（澤）旗幟下的一羣，都被「黨員轉業」而瀾了出來，在四五年以前，各方面都有陳爲「第二領袖」之說。陳本性剛強，律已甚嚴，在政治操守上說，的確算得當今一員硬漢。他的大刀關斧的作風，他的「貪污爲革命對象」的論調，也大大使許多人心驚肉跳。中國政治舞台上素來如此：一個人頭角崢嶸後，自然毀謗羣集。去年張靈甫在山東殉難，當局悲痛逾常。湯恩伯奉召入京，當面痛被斥罵，幾乎不得開交；而湯是幾年來陳誠一手提拔出來的。湯既當面被斥，於是便有策士進計，叫他把國防部的指揮命令及部隊的戰況報告，一齊捧上，證明他不是無能，而是指揮失當。湊巧那時正鬧着軍官團哭陵，碰上胡宗南延安歸來，也做了一年來被整編的軍官們的代言人，作了一次有系統的陳述。於是這位「第二領袖」處入於四面楚歌之境了。

遠在此事以前，提倡「領袖」的人，覺得這個「領袖制」還是應該再延續到下一代才好。這思想早幾年業已非常盛行，所以才有「第二領袖」的傳說，現在這「第二領袖」既已過去，於是大家想到

、假使是「聖聖相傳」，豈非大佳。既要相傳，自然得先培植。於是第一步，先使這個承繼人取得青年領導的地位。今日在黨團之外，又新生了一個力量，即青年軍，而青年軍即交蔣經國主持一切，同時在青年團裏又給蔣經國一個最有權力的地位——組訓處長。祇是蔣經國，心熱而手不辣，他僅僅祇能顧到青年軍，不能再顧到團的各省幹部的支配，所以派出來的，一批一批，還都是恩施派和留日派，組訓處實際上祇是一座空城。

在團的內部，雖然新幹部和老幹部在爭團的領導權，但是對於團併入黨這一點，都是心有不甘的。而且大選即在目前，團併入了黨，便完全失去了陣腳。正巧在廬山開團的二中全會前，魏德邁的致詞文告，大大激怒了當局，也減消了當局對於現在黨政要員們的信心。配合這一形勢，於是，「反官僚反貪污」的口號，高唱入雲。在廬山會議上，鋒芒四射，他們認為黨是衰老了，倘若要團併進去，非再來一次清黨不可。同時他們又電遠在東北的陳書記長致敬；這一個致敬電包含着極微妙的政治意味。在這種情形下，當局才答應團的幹部一律轉為黨的幹部，大家參加到黨的全會裏來，照呼吳鐵城陳立夫，務必照此通過，並儘量予團幹部以發言的機會。

所以在四中全會開幕以前，黨的主要派系，確有藉此再來一次政治攻勢的企圖，預擬了一個黨政改造的辦法。可是會場上形勢全非，一開頭便討論黨團合併的問題。少壯派發揮演講戰，一個一個的放炮，大大攻擊黨的無能，過去領導無方，黨員從政的貪污……並表示團合併後，不願意一同「拖進渾水」。但是這一片炮聲，却撲了一個空，沒有一點反響。全場上一反過去幾次大會那種叫囂爭辯的情形，主席在沉默的聽，元老在拈鬚微笑，其他中委則都嘿嘿無言。原來一大部分委員在開會以前，

業已接到秘密通知：「對此問題不要多說話了」，所以在會場上成了一個一面倒的局勢。黨內「既成派系」，大都悞喪不堪。不久以前，民青兩黨的加入政府，分去了政府裏的一部分的地盤，現在又有一批新軍突入了黨內，大家正開始以冷眼來看行將產生的許多「新政」！

泛亞會議中兩代表

泛亞會議是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新德里開幕的。這樣的集會，在亞洲史上還是空前的創舉。這一會議是由印度臨時政府副總理尼赫魯發起，國大黨前主席（一九二五年）現任指導委員奈都夫人負責籌備的。據奈都夫人表示，倡議集會的目的，並非欲組織一個政治性的亞洲集團，而是在商討亞洲的種族糾紛問題，殖民經濟與民族經濟問題，亞洲工業發展，亞洲的勞工福利，各國文化交流和婦女問題等，尼見是一個性質很廣泛的會議。而且尼赫魯一再表示，在會議中拒絕討論任何與會國間或任何國內之爭執問題，減低會議的尖銳的政治性。但亞洲一向是民族的牢獄，泛亞會議雖不能用有效的辦法解決各種困難問題，至少也可以加強各民族間的連繫，增進各國間的諒解，所以，從事獨立鬥爭的越南、印尼緬甸、等國，都歡迎這個具有現實意義，符合當前需要的會議。

按正常的局面推測，在亞洲，日本贖武的軍閥覆滅之後，各民族反抗日本法西斯的鬪爭撕裂了黑暗的天幕，應該有一個燦爛的黎明。那時候，中國復興，各弱小民族獲得自由解放。而且，獨立而民主的中國，影響着亞洲各個覺醒的民族的路向。

泛亞會議邀請三十三國，與會的名單中，除日本外，赫然有西藏在。

政府當局聞訊後，即非正式向印度駐華大使館提出抗議，聲明西藏乃中國完整領土之一部分，尼赫魯邀請西藏代表與會。證明其不尊重中國領土之完整；並表示在商談未有結果以前，參加該會的中國代表團暫不赴印。

本來泛亞會議是非官方及非黨派性質的會議，但各國政府亦被邀派觀察者參加。我國除西藏外，有六個團體接獲邀請書，包括中印文化協會、新亞細亞學會、國民外交協會、太平洋學會中國分會等，國民黨中央黨部也在內。把西藏與中國平列來邀請，自然違背了中國的主權，羞惱是應該而且不免的。

與印度大使館談判的經過，不得而知，但西藏代表扎薩桑都頗章及堪瓊羅桑汪傑出席了。國民政府本有意派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長沈宗濂為該會議觀察員的。據悉談判的結果是，西藏代表可以出席，但不懸旗；懸旗就正式表白它是一個獨立的單位了。然而西藏代表是具有觀察員的身份的。按出席代表可分三類，一為僅由文化團體派代表出席；一為政府及文化團體均被邀請派觀察員及代表出席；另一僅由政府被邀派觀察員出席，如尼泊爾、不丹、印尼、西藏也在內。

西藏代表出席以後，儘管官方口頭稱它為「社團」代表，心裏實在放不下來。在以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團部副書記長鄭彥棻為首的代表團以外，外交部葉公超司長之所以出席，據聞與此有關。

可是存在的問題，只有靠雙手來解決，却不能賴雙手去修飾。會議揭幕不到兩天，把一個「強國」的面孔完全暴露了出來。

且抄兩則新聞，以見分明。

「中央社新德里二十四日專電：泛亞洲會議昨第一次大會時，我代表團因見主席台後牆壁上懸掛之巨幅亞洲地圖，竟將西藏置於中國疆界之外，表示非常容忍及審慎之態度。且有西藏代表三人坐於主席台上。該處係各國代表團團長座位，我代表團長鄧彥棻氏曾告中央社記者，尼赫魯答鄧氏稱：渠本人直至當時尚未察覺此事，允於二十四日更正。……」

「法新社新德里二十四日電：泛亞洲會議二十四日分組開會，其中有一組討論自殖民經濟變為國民經濟一項問題者，席間印度代表稱：西歐各國現正以經濟控制代替軍事控制，中國在事實上，已成為美國之殖民地。……」

當然，沒有人可以否認中國與西藏有着國家主權的關係，同時也沒有一個人可以舉出二十年來對新疆有過一件值得稱頌的措施，康藏之間，金沙江兩岸經常發生戰事，就是明證。這次「國大」通過的憲法里，雖有「西藏地方制度應予以保障」一條，已經來不及挽回離心的趨勢，由內政問題捲入了更複雜的國際紛爭。

先是中英權益在西藏的衝突。英國支持達賴喇嘛以對抗中國援助班禪喇嘛的政策。西藏邊界，在英國人眼中看來是一條思想的邊界，它不容許它臣屬的印度四周出現一個能和英國威望相比的強國，不論是蘇聯或是中國。英國就直把西藏作為隔離印度接受外來影響的屏障之一（另一是伊朗）。

現在情勢在演變。中國援助的西藏政教領袖班禪，一個髫齡童子，目下還在青海塔爾寺讀經。拉薩方面達賴喇嘛正在注視國際演變。前年西藏代表在新德里與英國訪問團談判時，曾攜有禮物贈送美

國總統，美軍在戰時曾派戰略情報局局員二人，深入喜馬拉雅山以試探由印赴華的運輸線，且有派遣親善訪問團與西藏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這一個暴發的帝國主義，比那一個破落的帝國主義，當然很可怕！西藏會有代表來南京參加「國大」，但他們不言不語，不提議案，只說「與蒙古情形不同」；比諸今日泛亞會議中西藏代表的情形，問題的疑雲更濃了。

中國與西藏的關係，假如真像拉鐵摩爾所說：在對日民族解放戰爭中，放棄了對內發展的「次」帝國主義（見「中國的邊疆」一書），勝利三年多來，在全國範圍內，真正的澈底的實現三民主義的民族政策了。那末，「在西藏，今日的問題不是如何逃避中國，而是如何進到中國去共同携手，爭取當前的政治自由，及此後的從過去遺存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見前書）。如今，實際上中國與西藏的代表們已經同坐在泛亞會議的主席台上了。

陳果夫與陳立夫

在中國政治舞台中，CC系的力量，是統治大半江山的。CC力量的長成，是由於二陳在國民黨內的控制力量。

果夫先生為人謹慎穩重，極為委座所信任，所用人才，多由果夫先生簽呈數名，然後由委座圈定一人。例如某省廳長出缺，由果夫先生將合於廳長資格的人，挑選若干名，詳述姓名、年齡、出身、經歷，並略加考語。至於委座所圈定的人，或前或後，並無一定，往往圈定最後一人，或圈定中間的

一名，都不一定。

二十九年，國府在重慶，立夫先生適任教育部長，立夫先生如有重要文件，多送果夫先生處請示。在文上批云：「逄衡舍大哥一閱。」衡舍在學田灣，係果夫先生城內之官邸，與立夫先生之官邸遙遙相對，其中間尚有一家係中央調查統計局副局長「徐恩會」及「葉秀峯」先生的公館，簡稱「國府路二八二號」。這個圈子裏的人，一律稱果夫先生為「果老」，立夫先生為「立公」。立夫先生之邸官前門在國府路，後門在學田灣，房子名曰「高廬」，一般常在「立公」那裏走動的人，外人名之曰：「高廬路緣」。

立公對其大哥果老極為恭敬，遇事必向其大哥請示。果立二先生的父親名其業，號勤士，住在高廬的三樓。這位老先生現在快八十歲了，曾任國民參政員多年，也是革命元老，但是他不願意做官，走CC路綫的，很少人認識陳老先生，因為陳老先生從未介紹一個人給果立二位先生。可見他老先生對於政治興趣的淡薄了。

果夫先生看文，如有牽涉到教育方面，或立夫先生方面的，則批：「果閱，交立弟核閱。」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某國立大學校長，為請教育部增加經費，呈請多次未准，爾立公亦不得復，乃爾立公夫人代促。立公夫人長於繪畫，曾任璧山正則美術專科學校教授，交際亦廣，此信係寄到璧山，批小字云：「送立夫辦」，遂着人送重慶高廬。立夫先生以該校長係黨務人員，與果夫先生有關係，遂加箋條云：「送衡舍大哥一閱」。果夫先生看過之後，乃批云「果閱，交立弟核奪。」

一件公文，一家數人批注，足證其兄弟處事之謹慎了。

青年黨與少年中國學會

青年黨的元老們談起他們的家世來，必然的會追溯到五四前後的「少年中國學會」。自然，那是很值得誇耀的一個組織。少年中國學會當時的宗旨是：「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學會的信條是：「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當時確能引起許多有志青年的嚮往。會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陳啓天等都是當時的會員，毛澤東、譚代英、李大釗、周佛海，也都是學會會員。

少年中國學會最初的發起人是：陳愚生（清）、張夢九（尙齡）、曾慕韓（琦）、李守常（大釗）、周太玄（無）、雷周生（寶善）、王光祈等七人，時在五四運動前的民國七年六月三十日，當時大家都非常鄭重其事，預定籌備期間爲一年，到五四以後的民國八年七月一日，才在北平開成立大會。新會員的入會亦很嚴格，須有會員五人介紹，並經評議部的認可。當學會舉行周年紀念時，全體會員一共祇有七十餘人。這七十中人，大部是各大中學的教授，以及報館的編輯，雖然沒有多大名氣，却很受到社會人士的注意。

少年中國學會先後發行過「少年中國」及「少年世界」兩種月刊，少年中國注重文化運動，闢發學理，由北平方面會員編輯；少年世界注重實際調查，敘述事實，由南京方面會員編輯。兩月刊後來都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印刷發行。

後來不知是舉行第幾次年會，在南京鷄鳴山北極閣，因為討論到創造少年中國究應從政治方面入手，抑從社會方面入手，即究竟應從上而下，抑從下而上的問題，造成對壘的形勢，雙方各有主見，不能調和，結果便無形拆夥了。一部份由譚代英、毛澤東、李大釗輩領導，都向左轉。而會、左、李即着手另行組織，成了國家主義派高唱「國家主義，社會政策」，並喊「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在國民黨北伐告成之時，國家主義派，也在打倒之列，其實他們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與當時國民黨「打倒軍閥，打倒列強」的口號，正是異曲同工，所以同得令人不解。不久，國家主義派便進一步的正式成爲中國青年黨了。

現在抄錄一張當時週年週念的會員名單，其中有很多都是現在的名人。（已經故世的，在名字下註一故字。）

周太玄、雷寶善（故）、王光祈（故）、陳愚生、張夢九、曾琦、李大釗（故）、李璜（幼樞）、段調元、李劫人、李思純、何魯之、許德珩、陳劍脩、魏時珍（嗣燮）、宗白華、孫少荆、田漢、沈懋德、芮學曾、胡助、張聞天、鄭伯奇、沈澤民、周佛海、雷國能、黃仲蘇、謝循初、周炳琳、康白清、徐開典、袁同禮、梁紹文、徐彥之、孟壽椿、蘇甲榮（故）、黃日葵、鄧仲鏗、劉仁靜、易君左（家鉞）、方東美、章志、張申府、余家菊、趙叔愚、劉衡如、李儒勉、楊賢江（故）、阮真、左舜生、沈怡、邵爽秋、王克仁、王德熙、蔣錫昌、王崇植、譚震、吳保豐、穆濟波、譚代英、周光煦、陳啓天、彭舉、毛澤東、易庶甫、李珩、葛澧、陳道衡、雷寶華（孝實）、趙炯、湯騰漢、鄭尙廉、朱鏡宙、趙曾儔、楊德培、劉泗英。

中港經濟協定內幕

「中港經濟協定」，真像是一個猜不透的謎。滿城風雨的喧鬧了半年多，歷經「擱淺」「流產」「另起爐灶」「再談」的波折，公佈的日期一延再延，現在協定雖已公佈，但經過的曲折，頗多內幕，值得一談。

的確，「中港經濟協定」是個難產的嬰兒。

「中港經濟協定」自年初國行顧問羅傑士，總裁張公權先後赴港商談之後，雖然經過了不少次的折衝，但總算是得到了一個口頭上的協議，不料正待公佈之際，政府突然頒佈新外匯管理及進出口貿易新辦法，霹靂一聲，已經攤開等待簽字的協定，又擱回文卷櫃裏。

因為港政府認為新辦法一頒行，中國既可以獲得港政府協助，加強緝私，又可以提高外匯匯率，吸收偽匯與出品貨外匯，但港政府的損失太大，這不僅雙方利益未能一致，而且有違原來協議精神。

協定流產之後，政府為了防止偽匯逃港，走私猖獗，曾一度展開外交攻勢，一面高壓澳門以「殺雞嚇猴」，國內輿論，一時亦轉向收回港九，一面更獎勵美國資本開發華南，就在這種微妙的空氣中，港督葛洪量到南京去了，跟著港督的行蹤，「中港經濟協定」談判重開並已在京簽訂的消息，於是又熱鬧了起來。

根據張公權多次的談話和香港當局原來的意思，該項協定主要內容是：

(一) 改善中港進出口貿易互惠關係：

中港雙方政府在互惠基礎上，改善進出口貿易關係，中國政府放寬華南輸入限制，採行港華（南）貿易聯鎖制，允許自備外匯貨品輸入，須經輸出入管理委員會華南分會批准進口，發給入口憑證後，可免領輸入許可證，但進口關稅率，可予酌量提高（將增至百分之百），香港出口署得協助我海關監督貨品進口，即一經離倉及起運前須逕向我海關憑證完稅進口，至於由港進口貨品稅收，香港政府得均等利益。

(二) 協助中國政府防止及吸收偽匯：

協助我政府防止偽匯逃避，港政府對香港我偽匯管理加以適當統制，由中港政府指定本港外匯銀行，負責專營我國海外偽匯（包括美元及英鎊區域各國貨幣之匯款），所獲外匯數額中，港府得撥比額百分之七十，以充實其外匯基金，而對香港之非指定銀行及匯業局，則禁止經營華僑國內外匯，並採取有效之措施。

(三) 締結中港緝私協定，由雙方緝私當局，採取連鎖性之聯繫，由港方輔助我緝私法令實施；的確，這「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協定，給被管制窒息得已奄奄一息的華南貿易界人士，帶來了不少新的希望，他們一致認為：「我國政府放寬華南輸入政策，允許自備外匯申請輸入，為符合港華特殊經濟關係，增加國庫收入，恢復國內經濟，並杜絕走私之風，實為必要。在港府方面，協助防止外匯逃避，締結緝私協定，為繁榮香港經濟增加庫收亦不為不可」。所以他們更天真的估計到：「此項協定付諸實施，實有極大可能」。並遠矚將來說：「預料在港華自由貿易恢復之初期，本港出口之貨

品將趨步漲，而國內物價將逐漸回降，但至一定期時後，港華間經濟，必可相當平衡穩定」。這遠景多麼美麗。

但是，事實往往跟夢境有很遠的距離的，先傳去年十月二十日公佈，又傳月底公佈，美麗的遠景，慢慢的被時間拖長而露出了種種的破綻。

從雙方的態度看：港督訪京歸來之後，港政府方面對這個協定始終保持緘默的態度，絲毫不動聲色。看不出對這個協定的重視。但在中國方面却熱鬧得很了。張公權等都表示對此非常重視，雖然對放寬輸入政策少作宣傳，但對港府協助緝私與防止偽匯逃避二點，却特別強調，這是值得注意者一。因為誰都知道，要香港方面犧牲偽匯的利益，和協助緝私，必得有開放華南自由貿易的交換條件。

二，從放寬華南輸入政策來看，誰能相信連上海自備外匯貨物尚且要收購的政府，會允許自備外匯貨物在華南進口呢？而且今日華南已非昔比，自魏德邁來華考察，宋子文主粵之後；華南早已面目一新。會再對英國開放嗎？華南輸管會田定庵發表談話時，會公然的說：「鼓勵廣州商人與外商直接交易，目的在打擊香港的中國商人」。誰都知道，所謂香港中間商人，就是英國的代表人物。但他所說的外商是誰呢？那就是美國了。他的話已說得很明白，華南的市場已經不是英國的了。

三，從「中英商約」擱淺來看，無疑的，「中港經濟協定」與「中英商約」有着極密切的關聯的，因為儘管英國自知許多條件已不如美國，但是他爲了保護過去在中國市場的地位，他就不得不想法子來取得若干特權（如內河航行），以「中英商約」來與「中美商約」分一分肥，因爲我國欲藉「中港協定」之助，以防止走私與爭取偽匯；而英國呢，亦亟欲藉「中英商約」來涉足中國市場，自然，

這兩國的關係也就微妙了。所以一般人的看法，在「中英商約」未見「喜訊」之前，「中港協定」是不會有多大作用的。

四，從逃避香港的偽匯來看，以數字說：據最權威的估計，去年度逃到香港的偽匯每月平均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之多；以穩定香港金融來說，因官定匯率的不合理，法幣不斷貶值，國內銀行信用不夠，偽匯多存入香港銀行，這筆數字給了香港不少的利益。因此，香港政府當然不會無條件的放棄這些利益的。所以「中港經濟協定」的黃金夢在許多正當商人的心目中，漸漸的覺醒了。

沈鈞儒與救國會

救國會的首領沈鈞儒先生，現在已經年逾古稀了。他從二十多歲東渡返國後，便從事政治活動。五十多年的生命，消耗在政治鬥爭中。他始終是時局的中心人物，無論那一次的政爭他都參加，都很出力。可是，他始終站在反對方面。他的活動能力，是很驚人的。辛亥革命，他參加了，被推為浙江參議員，他那時代表國民黨，反對袁世凱。護法之役，到廣東參加非常國會。那一般護法議員，又被黎元洪拉回北京。曹錕要當總統，用金錢運動議員，沈和一般清高的議員，都拒絕賄選。沈先生就是拒絕賄選的中堅人物。那時起，沈先生的聲望已經很高。北伐的時候，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北伐勝利後，第一任浙江省長（那時還稱省長）是褚輔成，沈擔任了省府祕書長。沈和褚，同鄉又同志，還帶一點遠房的親戚。論輩份，沈比褚小，但褚視沈為弟，二人非常親密。他幹了三個月，便被通緝。

理由很可笑，說逮捕到貼標語的兩個青年，所貼標語，都是攻擊某要人的。這兩個青年，曾接受過沈的津貼，所以有人說是沈指使。沈從此在普陀山隱藏了不少時候，一直到民國十八年，才以律師的資格到上海來，然而他始終沒有忘情於政治，仍舊在暗中活動。他最初加入宋慶齡先生的自由大同盟，這還是一個國民黨的左派組織，到後來成立救國會，他以年高被推為領袖。在當時，救國會是介於國共之間的一個政治組織。到了民主同盟的成立，他便以左傾人物的姿態出現了。從他自陝西學台那邊開卷的政治生活起，直到現在成爲救國會的首領人物止，在政治鬥爭中，已經混了五十多年，而始終站在反對派方面，努力工作。論他的年齡，實在可以休息了，然而，他還在整天忙，忙着「和平」與「民主」。

沈鈞儒先生雖然已經年逾古稀，而身體甚健。在重慶時還能爬上十八梯，凡一百八十級，他不坐轎，他爬上去之後，可以面不改色，亦不氣喘，真是難能可貴。有一次，他和他的第二個兒子沈誠（兵工署委員）一同出門，到了十八梯，沈誠不坐轎子就上去，而他呢，仍舊安步當車，慢慢地爬上去，那知他爬上了十八梯，他兒子坐了轎子，還沒有上來呢，他等了好一會，才上來，他笑着說：「你們年青人太不行了，看看我」。他身體好的原因，在於他沒有什麼傷害身體的事情。他的私生活，可以說非常嚴肅，在他沒有什麼桃色案件，可給人家找出來的。他每天起身很早，起身後，早餐是不吃的。他的生活，簡單到無可再簡單。他的夫人在民國二十二年便死去了，一向服侍他的，是他的獨生女兒沈譜小姐。自從沈譜嫁了范長江，好久沒有離開他，直到長江在解放區患了重病，沈小姐才萬里尋夫的離開了老父。現在經常服侍他的，是他的第三個媳婦，卽畫家沈叔辛的夫人。

沈鈞儒先生在政治上雖沒有什麼成就，但他的政治才能是有的。他會演講，可以講得慷慨激昂，若是和他清談，也是妙語連珠。他有天生的一副口才，適宜於作羣衆的煽動演說。民國十五年左右，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常有羣衆大會，沈每次有演說。詩人徐志摩曾經欣賞過他的演說，他在一篇通訊中說：「這幾天，北京寂寞得很，天安門廣場，不見沈鈞儒的鬍子在翹了（沈爲美髯公）。」他古文根基很好，對於時事政論，不見擅長，平淡得很。

外交界的人事滄桑

弱國無外交，所以中國的外交家是怪難做的。然而也要看各人的做法。

當五四運動的時候，被打得一跌爬不起來的外交家是陸徵祥 and 曹汝霖，這兩位親日外交家被衆口一詞的唾罵以後，陸徵祥從此皈依天主教，今天還在比利時的修道院裏度殘生。曹汝霖呢？說是爬不起來，倒也「東山再起」過的。那是日寇佔時期，曹充當華北政務委員會裏的二號脚色，幹着什麼華北開發公司裏的炭礦會社總裁，在敵僞時期裏，僞新申報會掲載曹汝霖的談話，他除了高談其中日共存共榮，自己早有先見之明外，喋喋不休地還向國人吹牛：「我老曹的預言實現了」。會幾何時，曹汝霖已被列在漢奸的名單中了。這二位外交家是爲外交而犧牲聲譽的呢，還是外交被其親日而禍延國家的？在近代的歷史上，自然會有一筆公正的記載。

革命以來，尤其是抗戰以來，中國在積極爭取外援的外交政策原則之下，爭取外援是急需的。但

無人能有力量引動某一外國來真爲中國打抱不平。爭取外援是不可少的，但也不能把中國千載命運絕實給某一強國。而且當時處在日軍氣燄萬丈的鐵蹄下面，誰也不願和中國來訂絕實契約，外交家的任務無疑的是更困難了。

在日寇侵略之前和日軍猛攻開始之時，中日直接談判論的外交家是很多的。他們的理由是日軍實力強大，英美不願對日作戰，中國若聯蘇聯，就要赤化，不如中日直接談判，進而中日共同防共，英美會默認，德意會協助，中國可以一心「安內攘外」了。這種理想外交，爲那時當政的大部份人物所贊同，汪精衛便是其中的領袖。但爲輿論及人民所反對。汪精衛後來爲親日到底而死。

不久前上海某晚報會記着抗戰開始時汪精衛的演說如何理壯氣直，該報所指的據說是汪精衛在廬山的演說，大概這是傳聞失實。我那時在場恭聽，汪精衛演說的結論是：「敵人是強國，我們是弱國，我們大家去死，我們只有去死」，可知汪精衛自始就是漢奸的理論家，只不過形式上沒有曹汝霖之流的露骨罷了。所以，當時的親日外交也就是漢奸外交。

「九一八」事件以後，讀者還能記得起當時中國外交上有所謂東京路線，莫斯科路線，紐約路線之分。據說當時主張莫斯科路線的是中國老外交家顏惠慶先生。顏先生那時爲中國駐蘇大使，也是中蘇復交後第一任駐蘇大使。顏先生看到當時日本要侵華反蘇，蘇聯根據其列寧遺教會援助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戰爭，而英國正被張伯倫之流的綏靖政策所影響，他就主張中國應聯蘇抗日。他的主張頗得當時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先生的贊同，但是政府沒有採納他，顏先生因此辭去中國駐蘇大使的職務。從此以後，我們就看不見顏先生上朝做官的事實。說者謂顏先生自認辦理中國外交何止三十年，當時

的卓見是根據中國全體人民之公意及數十年的外交經驗的，既無被採納的餘地，那末「我已老了，就退守吧！」白顏先生懸守後十餘年的今年，我們於前年日寇投降前夕，才看見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而簽訂之後之今天，又是無形擱在外交的檔案櫃裏了。

繼顏先生而為駐蘇大使的是學者出身的蔣廷黻先生，據說是陳立夫先生推薦的新外交家。他坐在大使的位子上相安無事，直到西安事變為止。西安事變時他是奉命向蘇聯提過某項問題的人，結果引起蘇聯疑慮到他的外交官風度問題，蔣先生的外交生涯也就暫告結束了。

抗戰以前及抗戰初期，中國外交界也有入鑒於人民反日氣餒之高張，主張不直接和日本談判，而採取聯德聯意的曲綫外交政策。汪精衛更親自到柏林去拜見希特拉的，德國國防創造人賽格德元帥，也親自來過中國為蔣委員長長的軍事顧問。德國顧問來中國的，由佛萊爾中將而至諳根好生中將，計劃中國的軍事，直至抗戰後我軍退至武漢為止始回國。其間也會有某位親德的政治家，主張聘用大批德國上士級的幹部來訓練中國軍隊，却和今天準備請美軍來整編中國軍隊美化一樣。當時中國的駐德大使也是學者出身的程天放先生，據說也是陳立夫先生推荐的。程大使曾用盡心思欲使中德友誼日臻鞏固，可惜這是單想想，以種族優越感極高的德國人，對着我們這位既有學問又強口才的程大使，說聲「這小夥子還不錯」就完了。又中國的駐意大使是前漢口市長劉文島先生，劉先生是積極的傾意論者，同時是崇拜墨索里尼及意大利的人，不幸歐戰未起，意大利的馬脚已經被希特拉看不起，歐戰既起之後，意大利一敗又敗，劉先生的雄才大略也就完結了。

關心中國外交人物的人，若到中國外交部去一問誰是今天中國最穩重的外交家，恐怕外交部高級

官員會衆口一詞地回答你：是老牌外交家顧維鈞先生！顧先生是穩健老練而精於情報聞名的，因為精於情報，每一國際情勢的變動，他總有很好的分析。所謂穩健老練，他總不提出積極的意見。所以他是外交界的不倒翁。迄今還得担任駐美大使的重任。可是外交家的雄才大略要與本國國力配合的，顧先生雖具外交之才，也只有「等因奉此」而已。在此次戰後聯合國各種會議席上，顧氏雖能運用流利的英法語演說，新聞記者除了贊美其語詞的優美以外，全篇演說的內容，却是不足吟味。當中美商約簽訂時，身為駐美大使的顧維鈞，捧場甚力，且說中國預備把全部領域開放給美國了，這也許是外交家的「爲人之道」。

若問中國的外交家何人最醇厚，那恐怕只有胡適先生了。抗戰初期胡適榮任中國駐美大使，據說是當今外交部長王世杰先生所積極支持的。他與已故羅斯福總統有同學之誼，羅氏生得又老又胖，胡氏則又瘦又小。正當中國抗戰之初，蘇聯首先協助中國急需的武器彈藥，美總統更有積極援助中國的決心，無如格於國內孤立派勢力之囂張（這批孤立派現在變爲積極援助中國政府論者了），心有餘而力不足。中國經過艱難的爭取，才獲得美國四千萬美金的信用貸款，較之今天一下子就是八萬萬美金的剩餘物資借款，已足見美國商人的生意經了。當時胡大使要想多得點借款，據說曾經去見羅斯福，某次入坐甚久，無語，羅斯福注視胡大使良久，胡先生開口說：「前承貴國借下的四千萬美金，敝國已用罄了」。「怎麼，用罄了」？這是羅斯福的回答。說者謂「這是兒子向爸爸要零用錢」，其學者之風度有如此者。

外交家是難做的，配合外交政策尤其是一件雜事。

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財產？

目前中國的兩大財團的第二集團，是以宋子文、宋子良和宋子安等爲首的宋家，有些人認爲宋子文的父親是美國華僑，非常有錢，實則宋家原本並沒有什麼錢，他們的財產都是宋先生在做財政部部長以後發起來的。

宋氏是中央銀行的第一任總裁（從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一年）。宋總裁第一個開了「以行爲家」的例子。因爲「兼職不兼薪」的緣故，於是他在不支中央銀行的薪金名義之下，要銀行支付他全部家用。這樣一來，宋家每月要開支多少，就得開支多少。抗戰期間，一般人罵孔祥熙公館裏的草紙都由中央銀行開支，殊不知宋先生早已「有此先例」了。

在金融方面，民國二十一年孔祥熙取得中央銀行總裁的地位，宋氏調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三十三年一月間，老孔又奪去宋的中國銀行董事長地位，但實際上，中國銀行仍是宋系的金融據點。宋除了把握國家銀行的中國銀行之外（他在該行中握有大量的「商股」），還投資於新華銀行、廣東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中國保險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和上海銀行。其中宋家對廣東銀行有很多的投資。這個銀行幾乎可以說全部是「宋家」的了；中國國貨銀行是宋家和孔家合資的；當然還有幾位不能出面的人物，亦在這銀行投下不少資本，要不然，爲什麼在抗戰後期，這家新銀行能獲得替政府買賣黃金、銀幣的權利？

在商業方面，宋家將有着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活動。民國二十五年宋氏組織中國棉業公司，並自任董事長，該公司資本原為五十萬元，二十六年春擴充為二百萬元，到同年五月便擴充到了一千萬元。在業務上，該公司在二十五年買賣棉花總額達一千三百餘萬元，經銷紗布五百萬元，其他委託之業務約三百餘萬元，合計在二千餘萬元。其次，宋自任董事長之華南米業公司，是在民國二十六年四月成立的，該公司資本一千萬元，並有流動資金二千萬元。這是獨家經營洋米入口的一個龐大組織。同時那側在民國二十六年五月間成立的國貨聯營公司，也是在宋家支配之下的（宋子良為該公司董事），這個公司是企圖獨營全國國貨——從新式工業、手工業、一直到土產的買賣組織。在香港，宋家又在廣東銀行樓上設立中國物產公司，從事於各種物資的貿易。抗戰的時候，宋氏對於重慶的中國國貨公司，四川畜產公司及西南興業公司等都有投資，並且是這些公司的大股東。勝利以後，宋家在香港廣州的一些公司都復業了，此外又在上海成立了「孚中公司」、「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統一貿易公司」、「金山貿易公司」和「利泰公司」。中國進出口貿易公司是由宋子良出面的，而後者且在紐約華爾街設立分公司，這幾個公司都是全國數一數二的貿易公司。

在工業方面，宋家除了通過中國銀行去把持鄭州的豫豐紗廠、濟南仁豐紗廠、昆明雲南紗廠、衡中紡織公司、成安紡織公司、和甘肅的雅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外，又通過中國棉業公司去租辦上海恆豐中記紡織廠。直接投資的有揚子電氣公司、淮南鐵路公司、漢口既濟水電公司、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協和製藥廠及中國毛紡廠。協和製藥及中國毛紡廠是在抗戰時期在重慶成立的。中國毛紡廠有一部份是國家資本，其餘是和孔宋二家合資，由中國的火柴大王劉鴻生出面經營。

中國汽車製造公司原設香港，規模很大，日本佔領香港時，機件和設備毀壞了大半，勝利以後，宋氏又以政治地位控制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同時又通過資源委員會去控制華北的八大公司——冀北電力公司、華北鋼鐵公司、華北水泥公司、天津機器廠、天津製車廠、天津製紙公司以及中央電工器材廠天津分廠。

在礦業方面，宋氏在湖南湘潭一帶，買了好幾座礦山。

在運輸業方面，抗戰期間，宋子良成立了西南運輸公司。這個公司是交通部公路局以外的第一個私營的運輸公司。後來，在滇緬路的黃金時代，這個公司改爲軍委會下面的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這樣的改組，並沒有削弱宋在這個公司的努力，反而因爲使用國家資本而增強其規模。在戰時，大後方的人，一提起滇緬路，誰都聯想到「黃金路」，而在這條黃金路上來來往往載滿「黃金」的正是屬於西南運輸處。抗戰時期，筆者在仰光，有一次和華僑談天，他說：

「仰光華僑都是勤儉樸素的，捨不得吃，不像那些從滇緬路來的新客，個個華麗的西服，大把大把的化虛比。」

「仰光華僑玩女招待，最多給一兩盾小費，自從西南運輸處的新客一到，一吃幾十盾，一吃幾十盾，小費一給二三十，弄得女招待都不招待我們老客了……」

從這個故事里，可見西南運輸公司在戰時是多麼的闊氣。

此外，中國唯一的內河和外洋的運輸公司——招商局，也是受他直接支配的。

宋家的經濟活動情形，已如上述。總之，他有七個銀行，十二家商業公司，二十二個大工廠，一

個運輸公司，全部股款有多少，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財產數字。讀者可以從這些數字上去推求宋子文的財富，大概可以知道一些了。他大部份財產是存在外國的。用黃金、美鈔、或美國股票的形式存在着，就是在國內與他有關的公司以至工廠，也是用大部份的資金換成了美鈔。

宋子文先生在中國社會中，不但是數一數二的大財神；就是在美國社會中，他也是一位被那些拜金主義者所重視的富翁。

政治怪傑陳獨秀

陳獨秀爲中國共產黨之創辦人及一著名學者，原籍安徽，曾留學法國及日本，爲文學革命先驅之一，曾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及教務長多年。雖然他被共產黨認爲投機份子及托洛斯基派，第三國際目爲「政治的渣滓」及「人類的渣滓」而被開除了黨籍，但是，他在中國政治上却有着他獨特的地位。這裏，不想多說他的過去，因爲他的過去，早已爲人們所熟悉了。這裏所要說的，只是他被捕時與釋放以後的一些事蹟。

二十一年冬，陳獨秀被捕了。那時他在病中，記得陳獨秀被兩個憲兵押解赴京，剛踏下南京下關車站時，他不禁放聲大哭起來，弄得兩個憲兵也爲他落下淚來。他說：「我犯了什麼法，我終身爲了革命奔走，我的兩個兒子是爲了革命而犧牲的，我的內人現在也離我而去了。……」

說罷，放聲大哭，一直到南京的模範監獄。

陳獨秀在未被判無期徒刑以前，他的心情一直是在這樣悲哀的境遇中，那時，他常常痛哭着，他大罵中國共產黨，他大罵毛澤東，同時，他也罵羅龍章與王克全等人，他說羅王二人不應該欺騙他，不應該奪取他的羣衆，幹着劇烈的反陳運動。

有時候，他又大罵托洛斯基派，他說中國的托洛斯基派有羅王兩人在那裏把持是不會有出路的。有時他又否認自己是托洛斯基派，像這樣的言行，實在是太多了。他這樣的表示，是不是要減輕自己的罪行，或者另有作用，那就非外人所能知道了。

他除了寫寫詩之外，便是喝酒，醉了便又大哭大罵一場。那時監獄當局爲了調劑他的心情起見，有時也允許他和一道被捕的彭述之見面，但只是一個短短的時間，而且在說話時旁邊都有人監視着。除了彭述之和他常常見面外，那時，中央的要人戴季陶與陳立夫先生等人，也常常去探望他，戴季陶也許是爲了不忘情舊交，還時常買點日用品和食物去送給他，這對陳獨秀自然是一個莫大的安慰。

陳獨秀被判決後，相反的，他的心情倒反而平靜下來，好像只要不死，也有機會脫出囚籠似的。他每日的生活是喝酒、作詩、讀讀舊書，有時候還讀聖經一類的書，那時候他手不釋卷的一本新舊約全書，他常常讚美那裏面美麗的文學字句。

「八·一三」事變以後，陳獨秀真的脫出牢籠了，在八百多個被釋放的政治犯中，陳獨秀也是其中之一。記得他第一天離開監獄的時候，陳立夫先生帶着陶希聖以及一向隱居杭州專門在理論上幹反共工作的葉青等人，坐着一部汽車親自去接陳獨秀出獄，當晚陳公館中爲陳獨秀設下了歡迎的宴會，陳立夫先生在宴席上曾經說過這樣的幾句話：

「……今後，希望陳先生（指陳獨秀）在中央領導之下，做一點真正為國家服務的工作，現在共產黨已經宣佈服從中央，歸化中央了，今後沒有共產黨，也沒有什麼托洛斯基派，全中國只有一個黨——國民黨，全中國只有一個最高領袖蔣委員長！」

「不過，今天共產黨表面上雖則服從中央了，但是不是真實的，是不是忠實的，這以後還要看共產黨的表現。……我們更希望陳先生以中共老前輩資望，多多領導他們（指中共），多多與他們聯絡，使他們走入正軌，不再走上歧途才好……」

當時，陳獨秀聽了陳立夫這一番話，是感動得涕淚交流的，表示今後願意效忠中央。他的「願意效忠中央」後的第一炮便是要求中共恢復他的黨籍。他寫了一封長信給「中共中央」當局，其中除了辯白他的過去行動外，并表示願意改過，以及今後願意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作與忠誠合作的意旨。當周恩來於「七七」事變以後第一次到南京的那一天，陳獨秀便將這封長信親自交給周恩來，當時，陳表示如果共產黨不願恢復他的黨籍的話，他便退一步希望今後共產黨能和他多多聯絡，他的意思是在那時的局勢，不應該再計較過去了。

不久以後，答覆果然來了，但是非正式的，其中有這樣的一句話：「陳獨秀要恢復黨籍，請他再等十年！」

彷彿共產黨已經知道陳獨秀的祕密與作用似的，那時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差不多每天都有攻擊「托派」的文章，什麼「民族罪人」啊，什麼「托洛斯基匪徒」啊，而且更直接地指出陳獨秀的大名來。

陳獨秀自然不甘示弱，除了寫了一篇「我的自白」辯正文章外，同時要求「新華日報」給他道歉與答覆：「民族罪人」「匪徒」的證據憑據在那裏？否則要提出誹謗名譽的控訴，後來經過沈鈞儒等人的調解，這個問題却没有擴大下去。

不久以後，便有廿六個人聯名保證陳獨秀人不是托派的文件發表。這證明文件中的簽名者除了葉青、陶希聖先生外，還有某某大學教授十餘人及其某妻人等。那時自命為第三種人的沈鈞儒與張申府的大名也被列入保證人中。

當這文件在「武漢日報」發表的第二天，便有沈鈞儒張申府等人，否認簽名保證陳獨秀的啓事與文章，張申府在他們的否認簽名的文章中說：「……那天晚上中國文化服務社請客，兄弟承蒙不棄，也是被請者之一，入席之後，陶（希聖）先生拿出了一張簽名單，要我和沈鈞儒先生簽字，他說中國文化服務社最近要發表一個大規模的出版計劃，要我和沈先生做讚助和介紹人，當時，我們看那一張名單中並無緣起，心中便有一點懷疑，但我也不能不疑有他，因為中國文化服務社是一個正式機關，當時，我們便簽了名……」

「至於說陳獨秀先生是不是托派，我便不知道了。我和陳先生雖則見過一二次面，但沒有什麼來往，他不是托派，不是我所能保證的了」。（大意如此）

在這期間，陳獨秀是非常活躍的，他常常出現在各個會場中，照例也有人請他演講。那時武漢出版的「武漢日報」及「掃蕩報」上常常有他的大作。但自從新華日報接二連三對他攻擊之後，陳獨秀這三個字便少見了。但是，陳獨秀是不是消沉了，或者放棄了他的工作呢？相反的，他却變得更加活

躍了，不過由表現的空洞的工作，而轉變到隱伏的策劃與佈置工作方面去，開始更正面地更積極地與共黨的對立。

這時，他的寓所也從武漢的日租界搬到武昌峒山去了。平時不大出外，人們只知道陳立夫、陶希聖、葉青等人和他更加接近，但是，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些什麼。有一個時期，簡直不大聽得見他的名字了。

武漢失守後，陳獨秀曾經在長沙住過一個短短的時期，以後他便跑到重慶去了。在重慶住在上清寺某要人空下來的一間寬大的住宅中，屋中寂然無聲，整日看不見他出外一步。有些好奇的人，常常到他屋外徘徊，希望能發現一點什麼奇蹟，但也尋不出一點動靜來。

有時，他在黃昏後，偶然看見他一個人手中拿着一本書，在嘉陵江畔，踏着落日的影子行走着，若無其事似的，表現得非常無聊的樣子，一直要到夜深，才一個人慢慢地回去。那時，聽說他有着很深的心臟病了，他到江津去是爲了養病，但是，江津却成了這一代「政治怪傑」的葬身之處。

川島芳子生死之謎

在人間活躍了四十多年的國際女間諜金璧輝（卽川島芳子），終於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晨六時四十分，在北平河北高等檢察處的方圍內結束了她的生命，死後沒有一個親人到場。不知法院爲了什麼，對於這消息始終守口如瓶，連法院裏的推事，也蒙在鼓裏。到了五月中旬，監察使署突然接到

一署名劉鳳貞者的控訴狀，謂金璧輝係伊姐劉鳳玲於執刑前一天，到第一監獄替死的，原來講好代價十根金條，行刑前曾付四根，執行後就不給其餘的六條了等語。刻正由該署派員至各有關方面澈查中。河北高等法院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付之一笑。川島芳子生死之謎，不久大概可以揭曉的。

金璧輝這位叱咤一世的女魔已經死了，而留在人間的除了她所予社會國家人類的苦難，還有她的詭跡。關於她禍國殃民的事實，世間知道的已經不少。這裏要提一下的，是她認賊作父的史蹟，也許有人知道，但知道真情的也許不多。

第一關於她的名字。人人都知道她的本名叫金璧輝，自從認了日本浪人川島浪速作養女後，起了個日本名叫川島芳子。但她在出生後，她親生父親給她起的奶名叫「顯子」。在她十六歲開始着男裝作川島女祕書時，她名字又叫「川島芳曆」。

第二是她的年齡問題。她在法院供稱是大正七年出生，大正七年正是民國七年，按週歲算到今年正是三十歲，按中國計年法是三十一歲。不過按照民國十五年十月她對人談話說：「我九歲時，曾形式的坐過禪。從大正五年（民五）父親（指川島）漸專遊樂，我便隨了鹿兒島的母親（川島前妻）從事織毛線和學寫生畫」。從這段話裏，她民國五年至少是十歲以上，那麼她今年至少是四十以上的人。關於她的家世。在她生身父肅親王的家裏，她共有兄弟姊妹三十八人。民國十五六年間贖下的只有二十二。這二十二人中間男的十四人，女的八人，他父親善耆在日本死後，繼承肅親王王位的是她的大哥憲章。二哥早死，三哥帶了家眷在大連做寓公，現在不知去向。三哥有兩個女兒，一個叫元子，一個蓮子，以後都在日本，生死不明。其餘的弟兄二十年前還有跡可尋的，是「七爺」憲奎，住在

北京。八爺憲真，民十前後加入了軍隊。「十一爺」憲原，民十五在日本士官學校騎兵科念書，畢業後聽說回了國，現已無影可尋。「十三爺」憲雲，常在大連日本北京之間跑跑，是個地道的公子。現在大概不在人世了。大姐叫末子，算來現在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二姐玉子，三姐瓊子，四姐源子，五姐障子，六姐珩子，都是同年。現在大概已經有四十五歲的年紀了。可是死絕逃亡，去向大都找不出來。金璧輝是老七，下邊還有個妹妹叫珣子，現在是三十七八歲。

金璧輝自己的母親是肅親王兩個妃子中的一個，名字叫夢妃，一共生了六男一女。女的就是金本人。在同母排行中，她是老三。她兩位哥哥憲立、憲方，受的都是日本教育。

第三是金璧輝同川島浪速的關係。川島在中國人眼中是個浪人，也就是民元以後出入中國的政治野心家之一。他精通英法兩國文字，光宣之間，善者在政治上野心勃勃的時候，這位會說善辯豐采洋溢的日本人，便被延聘到幕府中來，作了謀士式的顧問。後來川島因為善者的關係，從滿清皇帝手裏討了個二品頂戴。川島和他原配那個鹿兒島的夫人，感情不大好，原因是爲了沒有孩子，金璧輝正三歲時，善者因爲「亡國」後跑到日本去，他看見川島夫婦反目的絃絡所在，除用他的愛女顯子來調劑他那個日本朋友夫婦間的感情。當時說讓川島養一年。一年期滿，川島便沒捨得把這掌上義珠送回來。當時善者正求日本的羽翼，索性在民國三年把親生的女兒正式託付了川島。三十四年來這位有雙重人格的女子，從家庭到學校，以至於在中日開政治舞台上的活躍，一向受着川島的蒙養和指導。

第四是金璧輝的女性男裝問題。金璧輝從出生到現在，好像處處是表現着雙重人格。起初是自貴族變成平民，接着是從中國人變成日本人。此外又從女性變成男性。這三變，在骨子裏並不是一種絕

對的變。比如說：滿清雖然倒了，她父親一直還自己保持着親王的名義，親王死了，這王位還傳了大兒子。關於國籍問題，雖然日本人養大成人，但她並沒有入日本籍，也沒辦過脫離中國籍的手續。至於由女變男，也祇穿着男裝，在生理上並沒有變化。她開始穿男裝，還遠在她十九歲住在大連的時候。她首先做的是剃了頭髮，剃頭的原因，是受了兩件刺激，第一個刺激是起於桃色糾纏。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正是春情蕩漾時期，何況一個有着白晳面龐，黑黑頭髮，和一個婀娜多姿身體的東方少女，同時還有個高貴的貴冑身價，異性的糾纏，當然難免。據她自己說：那時她接到的粉信，每天總在十封以上。金璧輝生性倔強是真的，因此不免在這種糾纏中得罪了不少野心少年。就在那時，東京大連之間的社會上轟傳着芳子同她義父的七長八短的風流事兒。川島當時很痛心，曾計劃把金璧輝送回北京交給她哥哥。以後因為金璧輝的倔強，沒有成爲事實。這是遠因。

至於直接逼她改着男裝的原因，因為桃色糾纏，他原有三次自殺的表演，最後一次，因為在大和丸上同松本聯隊將校開的一幕，威迫到她的親生老子，善着痛心，在大連病倒。她的母親看了丈夫已無生望，便仰藥而死。金璧輝受了這個刺激，當時抓了一把剪刀，在她住的庭院的菊畦前，攝了平生最後一張女裝像，便把三千煩惱絲付諸并州一剪。一時掀動日本社會的「勝朝王女」川島芳子，一變而爲美貌少年川島芳曆。

第五是金璧輝的青年生活。關於她近十年的事蹟，盡人而知，毋待多贅。提起她二十年前少女時代的生活，也頗爲有味。

她三歲離開了親生父母，跟了川島住在日本。川島前妻那個鹿兒夫人，是個典型的日本主婦，除

了家庭中做衣煮飯等都有很高的修養之外，並且還有一手茶道（即煮茶術）和製盆景（即藝花等）的藝術。金璧輝九歲以前受着很完全的主婦訓練，所以直到今天她在監獄裏弄吃弄穿的技術，很受着難友們的欣賞。她九歲時，川島同他前妻離婚，領了個妓女叫藤間靜枝的做妾。窰子裏的姑娘當然不解母愛，因此金璧輝被冷淡了，在那時起，他學習坐禪了。

以後川島與靜枝間的感情也不大好。川島回念前妻，在金璧輝十二三歲前後，便開始遊山玩水，徜徉於日本的名山大川之間，以遣悶愁。而旅途中惟一的伴侶，便是她這位異國的義女。

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研究那時金璧輝是十九歲），川島坐了香港丸從東京跑到大連。那時正值我國軍閥亂動刀槍最熱烈的時期，川島的大連之行，主要工作當然是作政治活動。當時記載，當川島到大連碼頭時，「却帶來了一個新祕書，看來不過十六七歲，是個眉清目秀的美少年。這個美少年便是有名的川島芳子」。

川島和他的少年祕書，在大連的生活，有人作過這樣的記載：「當晚川島領着少年祕書及他的姪女元子蓮子，去大和旅館赴男爵壽島少校的夜宴去了」。從他們接觸的人，和川島常隨在身邊的人，可以知道金璧輝當時地位和對外生活。至於她在家庭的生活，據那時她對新聞記者說，是這樣的：「我重來此地，每天許多的來客和無數的應酬，異常忙碌。家中事都沒整理。自從改變男子生活，不但無聊的書信減少許多，真和得救一樣。我現在家庭裏，替父親（川島）當祕書兼少爺，有時來客從事烹飪，有時更換被褥從事縫紉，有時刺繡桌倚鋪墊。每晚照例按摩我父親。按摩後整理日間的筆記，筆談，就寢時多在兩點。早晨六點起床，到皇道會大石先生那裏學柔道（日本拳）」。

在她自己敘述的生活狀況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各方面的記載歸納，知道她那時還在大連的日本公學堂讀書，在她那個家裏執行着主婦管理僕役和家務。兩三年的時間，因為她義父的關係，認識了不少在中國活躍的日本人，如土肥原賢二，多田駿和岡村甯次等等，並且經常來往於北京、東北、上海、日本之間，真是八面威風，紅得發紫的人物。「九一八」後又以舞女身份，出現於十里洋場的上海，「七七」後又以金司令金二爺的姿態，在華北東北之間活躍。

第六金璧輝的性格。金璧輝在北平公審時，那種潑辣善辯的表演，會予觀衆以很深的印象。內幕人說，四十年來，她的脾氣還沒有改。據傳說她出生時便是個暴風雨的深秋之夜，天亮後天氣還是陰晴不定。學會說話，她滿臉笑容中却不讓別人靠近。她的母親從小便好面子愛錢，她住在日本念小學時，有一次從學校回家，在路上拾了兩個錢。在日本式的教育下，她手裏從未拿過錢。那次見了錢，很覺稀奇。回家被她義父看見了，以為有違武士道精神，要她去丟掉。當時她自己說覺得錢可以買東西，非常高興，就反駁道：「武士若沒有錢，甚麼也不能買。雖是武士又有什麼用？」她義父一時火起，把她砍了一刀，現在死後手腕上留的疤痕便是那時愛錢的結果。

金璧輝是個熱心腸有着東方感情的人，從過去二年來在監中同難友的感情看，再從這次被槍斃後，監友給她釀資燒紙的情形看，知道這觀察是不錯的。當她十五年起住在大連時，她的下女對新聞記者批評她說：「小姐是個熱心快腸的人。雖有時盛怒，可是離開她便覺得寂寞起來」。

自從改着男裝後，她很不喜歡別人叫她川島芳子。她的下女告訴人：「那時起如果有人再叫她一句芳子小姐，便要被打五分錢」。所以直到如今，她還讓人稱她司令二爺。認乾兒子喜歡別人跟她叫

乾爸爸。在監獄裏的姐妹行，還要人叫她哥哥。

金璧輝本人敘述自己的性格，二十幾年前她曾對人說：當她義父因錢的問題砍了她一刀之後，她的性格一直受着強烈的鍛鍊。他說：「父親（川島）守着古代武士道精神，很頑固。我自少就這樣訓練出來的。因此在她十七八歲時，一次同他父親坐了大和丸到大連，同船的有松本聯隊的丘八爲了調戲她同頑固的蕭親王善善起了衝突，結果，她伸出拳頭把人打了。等到上岸後，在污辱皇軍的罪名下，弄了許多麻煩，善善因而憂鬱致死，她母親也仰自殺藥。她自己已自殺兩次。

她自己又說：「我是兩重人格的所有者，一面是美國式的爽快活潑，一方是與此相反的憂鬱心情。有時感到寂寞，獨自哭泣」。

談到她國家觀念，蓋棺論定，骨子裏因爲還有中國人的血，多少不能忘情中國。這是實情（但不忘的不是中華民國，而是滿清。她們的家天下，她在法院也供認過）。後來的行爲，出於女子意志薄弱的心理，大概是不會錯的。記得民十五她對大阪每日新聞的記者說：她親生父善善臨死對她說：「你是我的兒子，你到老不要忘記是中國人，並且你應當是半個中國子，半個是日本人」。她剃髮男裝時對人說：「此後我便完全棄掉女性的人生，我覺得除國家皇帝之外，一無所存」。事後她又對日本新聞記者表示：「我不是東洋女子，所以我只在暗中努力。雖最初就睡得難以成功，但已決心爲這一生的目的努力到死。你不要笑我身爲女子，近於誇張，這是我一生的宏願。」

雖然他那時所說的國家與皇帝，意義含混，但根據蕭親王善善赴日本的初意，這國家皇帝的意義是很明白的。由於她當時決心表示：「我此後對於親生父母盡孝，對養身父母報恩，對落魄皇帝盡忠

實爲我一生事業」。落魄皇帝所指，是很明顯的。他在法院的供詞，心理上當然有她的根據，至於她的賣國行爲，還得從社會環境去瞭解。

最後想對金璧輝的婚姻和她心愛的猴子等問題，略爲說明。關於她的婚姻，社會一向流傳着她曾於民十四年十七歲時嫁給察蒙昭烏達盟的巴林郡王爲妃。但她在法院供說，嫁給巴林郡王的是她的姐姐，不是她。而根據各方面的記載，民國十四年時她正在日本同她義父遊山玩水，她義父利用她來走動權貴之門。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她隨了她義父從日本跑到大連。十六年正在大連活躍，這過去的二年絕不會住在蒙古包裹。所以有人說她結婚後同蒙古王公住了兩年，於十六年隻身來平的話絕不可靠。至於她到底結婚沒有呢？根據各方的記載，並沒有這個跡象。十五年在在大連會對人有過這些話：「像我這樣年紀，自然出嫁問題是件大事，因此親友之間就有這種提議。可是，我不認爲問題的問題」。此後的二十幾年中，她的形跡很顯然，也沒有聽說有何動作。根據她受刺激着男裝時說：「我要爲無嗣的父母盡孝，對出嫁問題一點也沒有興趣」。這些事都證明後來不出嫁的原因。

提起她那個心愛的猴子問題，直到臨死還念念不忘，爲什麼對猴子的感情這樣深摯，這是值得回味的。當這篇東西的前部寫完之後，給一位內幕朋友看見，他說：「金璧輝在民國十五年對新聞記者說她十九歲，算到今天正是四十一歲。按甲子四十一歲是屬猴的，她平常時時說起她自己性格像猴子。猴子便是她的生命。從決心改變男裝後，在女子的心理上講，她是有着女性歇斯理病態的。許多苦悶中的女子，都找個題目把心情寄託在貓狗身上。金璧輝無疑是由於自己的年齡而找到了猴子」。這話很有一點道理。

據這位朋友說：金璧輝還有個名字叫東珍，這是肅親王使她象徵東亞珍寶的意思。此外關於金璧輝這三字的來源，還是「九一八」前後的事。這名字是她義父的傑作。據說意思把金比作滿清，金璧輝就是重整滿清家園的意思。

陳彬談「汪公館」

在汪精衛的公館做了四年廚子的陳彬，現在開了一家廣東飯館，在新都電影院隔壁那條短巷子裏，矮小的門面，顧客走進去的時候都得低着頭，店堂裏狹小而又潮濕，滿滿地擺了十幾張桌子，可是從早上八點到深夜兩點，天天是與新都媲美「客滿」，來晚了就站到巷子口去等候，在這些食客裏，不乏當今權貴的夫人和小姐。

這是個道地的廣東鄉下人，據他說陳家在廣東社會世代都是廚師傳家，他的父親和祖父沒有像他這樣富於冒險精神，敢於出外去開創世面，就憑着一隻會做各種各樣菜的手，他就從家鄉奔到上海，兩個月以後，他就是南京山西路金陵酒家，第一塊牌子的廚師師務了。

在偽組織時代，汪精衛每次宴客，都到「金陵」叫菜，而且必須是陳彬掌杓，多少次偽府的秘密會議，宴主子日本人，這些菜都是陳彬一手炒的。

可是陳彬靠著自己手藝吃飯的人，他只懂得汪精衛每次請客必需要一個拚盤，六個大菜，四個吃飯的菜，兩個甜菜，他施展着那驚人的技藝，讓每一樣菜都有着鮮美的味道，因此汪精衛就對於這樣

的一個廚子，也不允許他能自主的生存，於是三十一年威脅利誘地把他從金陵弄到顧和路三十二號汪公館做御用廚師，給他的工錢超過金陵酒家，而且「另眼看待」。公館一共用了三個廚師，一個炒海波菜，一個做西餐，再一個就是陳彬，以炒廣東菜爲拿手，這種「另眼看待」，無異是一種苦刑，汪精衛和陳璧君，一日兩餐飯都得他預備。

汪逆喜歡吃好湯，和新鮮的蔬菜。菠菜紅蘿蔔是家常菜，因爲陳璧君這個老妖精，她不但要菜的顏色漂亮，而且擺菜的位置，要像畫家樣的會配搭！像菠菜和紅蘿蔔擺在一起，使紅綠相襯。爲着應付顏色和新鮮，陳彬常常愁眉苦臉在菜場上挑選，找那色味俱備的蔬菜。

後來汪逆生病，陳彬更難做菜，不生病前汪陳同桌吃飯，生病後陳單獨吃有色的菜，汪於病榻上吃有營養的菜，他要應付這對夫婦，只好川流不息的做菜，做菜。

陳彬不願意把往事重提，但經不住筆者的追問，這個有着廣東典型，熱情而爽朗的漢子，才帶着一點羞澀，把他四年來在汪公館當廚師的生活說出來。他除了嘴裏嵌了三顆金牙，和胸前掛了一支鋼筆，作爲都市的裝飾以外，混身都有股純樸的鄉下人氣息。

談到他的小店，他就變得自然而且喜悅了，像談論自己的兒子樣的，一股子快樂的表情充溢在他的臉上。他說：他沒有多少本錢，要把這個小店擴充爲大酒家，就這塊豆腐乾大的房子，還是每月化五十萬租來，一共有五個老板，他和他的哥哥維新，同其他幾個夥計，是伙計也是老板，在勞力上大家都很平均，他晚上七八點鐘上班炒菜，那些二掌杓，洗盤和端菜的，都是他的徒弟。他哥哥整日坐着管賬，身體很胖，很快樂的整日裂着嘴笑。營業狀況雖然不壞，可是因爲材料太貴，煤、水、電、

和作料是筆很大的開銷，加上他們的價錢比較客氣，一碗鷄湯麵，只賣五萬元，每天做下來，大家拆賬，一人不過分四五十萬元，却是一大家子人要吃飯，陳彬有三個女兒，陳維新有兩個兒子。哥哥四十八歲，弟弟四十五歲，兩人相處非常融洽。「那末你還預備去大公館做活嗎？」回答我這問話的是很堅決的口氣：「我不願意再做大公館了，這小店雖然小，可是總算是我們慢慢做起來的，說這話時，陳彬的表情是很動人的，他充滿着希望而且是帶着一種虔誠的口吻說的。後來他哥哥還輕輕地對我說：「外交部長去年要他去炒菜，出了八十萬元的工錢，他都沒有去呀，他捨不得這小店呢！」

女王奇俊峯血案記實

塞外鄂爾多斯草原，綏遠境內烏蘭察布盟西公旗（舊稱烏拉特前旗）的女王奇俊峯與幼王奇法武在赴綏途中，被旗下東協理額賓齋和護路大隊長郝游龍率領仕官黎衆在距離王府四十里的蘇保蓋廟包圍請願，當場擊斃，彈由女王左髮經右額穿出，幼王彈中前鼻樑穿腦而過，屍首掩埋於王府所在地公廟子。女王奇俊峯年僅三十三歲，是西公旗已故石王的三妾，民二十一年和石王結婚，時女王年方十八，她是清末彝夏阿拉善旗王公之女，幼年隨太夫人旅居北平，曾攻讀錫教女中，能通蒙漢文字，且可操一口流利的北平官話，極爲石王寵愛，結婚甫及兩載，紅顏薄命，石王竟於民廿年患病薨於包頭園子巷，謂旂辦事處。時女王有孕，生子名阿拉騰額濟爾，奇法武是他的官名，今年十三歲。抗戰爆發，敵偽換東協理額賓齋參加德王耶翼下的蒙疆政府，女王遂率幼王及參謀主任李傳卿與護路大隊長郝

游龍出走到達五原，舉起抗戰義旗，民二十九年會由李鶴卿陪同赴重慶謁見蔣主席，奇俊峯當被封爲護理扎薩克並防守司令，綏境蒙政會委員及綏蒙勞務特派員，幼王奇法武正式任命記名扎薩克，成年後，幼王繼承王位，在未成年時，女王垂簾問政。

提到李鶴卿，直到現在還是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一部份人把這次的政變穿插到李鶴卿的桃色事件上面，據當地報紙記載：「李鶴卿是河北人，南開經濟系畢業，青年有爲，一直與參謀長黃楚山（現在陸大參謀班受訓）爲女王的左右臂，勝利後隨女王返旂接收大政，嗣因思想嫌疑，去年十月被省政府派員扣押解省，女王經半年來之奔走說情，終於今春將李保出，七月十六日李鶴卿由包頭潛赴北平，行前留書女王，略謂：渠已赴平，促女王將貴重財物迅速轉移北平，圖轉糴夏，白首偕老，至平後可登報尋找李西言。不幸信到王府，女王已啓程赴包轉綏途職，故信落於旗下任官手，遂以此爲藉口，釀成血案」。平津京滬各報也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意或無意地想把這一政變有聲有色地歸咎到桃色事件上面去，實則，我們只要看一看女王之母奇月明聞到噩耗後，趕到包頭，八月十六日在包頭日報刊載的一段緊要啓事，就可知道內幕了。

「近被西公旗殺女兒奇俊峯暨外孫奇法武死於非命之噩耗傳來，已延二十餘日，我年經七旬，從小到今只有其女，當其夫石王逝世，額寶齋早與偽敵已訂賣身文契，其事可作，何所不爲……，嗣本年七月十六日在該旗召開整軍會議，分列擁護總動員令之通電，十七日隨外孫法武赴包，轉道綏垣，報告編組部隊，路經郝游龍之佳築地烏蘭計，以奉上帝，速行編制，向該部講話，本想被其主唆額寶齋，賀守忠等同場劫擄，返回葆保蓋廟，三十日謀殺，要知公廩方面，在開會時應該如何調整，不

能以毒死無對象之妙技，一意孤行，事前形態如常，一旦召開整軍會議，拍發擁護中央總動員令之通電，由此動機被遺孤魅滅亡，斫株斷根，謗死已無對證，辱生豈容污我門庭，老嫗畢身孀婦，據此要點，希列位糾正事實，我雖瞑目，亦無憾矣！奇月朋啓」

從此可以肯定血案的演成是一個政變，而不是一般桃色事件所能掩蓋天下人耳目的。這裏不妨說一說其中的內幕。

額寶齋與郝游龍是政變的主角，所以額寶齋與郝游龍就成爲草原上衆目睽睽的人物了，然而綏遠有關當局經董其武主席與省臨參會正副議長張欽、閻肅以及蒙旗有關人士經天祿、趙城壁等商討解決原則，在安定第一的前提下，決定（一）催促西公旗三代表急速返旗，暫時成立旗務委員會，維持旗內一切政務。（二）在旗務委員會未成立前，旗內政治、軍事仍由額寶齋、郝游龍分別主持。（三）西公旗將來旗政組織體制及扎薩克繼承問題，靜候中央處理。（四）推選在綏蒙藏委員會委員胡鳳山、經天祿、及綏遠黨部主任特派員趙城壁，同赴西公旗慰問民衆，安定人心。

從這一決定可以看得非常明顯，血案的主角額寶齋、郝游龍事實上不但沒有治罪，相反地，還分別地主持旗內政治與軍事。由此足見這一行動是全旗蒙民所支持，至少可以從額寶齋和郝游龍還能繼續主持大政，而旗下蒙民竟無人反對，還是有原因的。

額寶齋今年已經六十八歲，當民十九年西公旗老王死後，王位繼承，曾經發生過一度很大的爭執，老王遺命由石王繼承，然而聯盟旗神權的大喇嘛伊喜達格就不同意，因爲石王是一個喇嘛，照理是不能繼承王位的，大喇嘛想保佐族中另一正系幼王繼承，因而釀成擁石與反石兩派，擁石派是由西協

理色令報領導；反石派由大喇嘛勾結額賓齋讓成政變，後經山西駐軍王靖國協同石王救平，大喇嘛死於戰陣中，額賓齋倖免一死，逃至百靈廟德王府。此後石王正式承繼王位，額賓齋遂流浪放逐異地，及至綏包淪陷後，額賓齋隨蒙疆政府的勢力伸展，擁阿木勒扎那爲扎薩克（意即王爺）重返西公旗主持東協理，勝利後，女王返旗接收，額賓齋仍爲東協理，此次刺殺女王者卽其主使。

郝游龍是協理色令報之子，敵僞時期，此一精忠保王的領袖被額賓齋陷害，以通國軍之罪嗾使日人將色令報扣押綏遠下獄，卒死於獄中。郝游龍今年廿五歲，他能出任護路大隊長，可以說是女王爲了報恩一手提拔起來的。但是這次政變，直接率衆下手的就是他，在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上好像是以怨報德，說不過去。實則，據熟悉蒙旗情形者說，郝游龍可算是蒙旗中的少壯派；他對於省縣編保甲，要把西公旗的蒙民也編在一起，無異破壞盟旗自治的制度，而且他是去年國民大會召開前，蒙旗代表在南京呼籲「民族自決」的忠誠支持者，郝曾經說過：「如編保甲，逼上梁山」。據說，女王爲了保釋李雋卿時，會與省縣政府有交換條件，可以編成保甲，隸屬安北縣，這件事的允諾，非但引起西公旗蒙民的不滿，而且招致了草原上蒙古包裹逐水草而居的人民普遍責備，兼以女王與李雋卿過從甚密，在那樣一個原始封建的社會裏，更難令人容忍。

總之，這次政變，並不是偶然的。主要原因在於額賓齋與郝游龍兩人，或則受了德王高度獨立自治的薰染，或則爲一民族自決的虔誠信仰者，加之女王的一切措施，遂致演成政變，那是有其民族的和歷史的重大意義的。鄂爾多斯草原的號角響了，過去大漢族主義的民族政策如果還一味因循下去，將來的禍患不知伊於胡底！

瀋陽金佛失蹤始末記

東北的接收，直到現在還是一筆糊塗賬。那裏有敵人苦心孤詣建設的大工廠、大煤礦、大鐵礦、然而，這些東西，從接收到現在，都停了擺，長了銹；時間像一隻蝸牛，緩緩地爬，慢慢地把這塊地方糟踏成糟粕。

遼寧省黨部主委石堅，爲了接收不清楚，鬧得「白金案」轟動全國，前營口市長方引之發了財以後入「土」遁了起來，到現在法院的通緝令還沒取消。政治不澄清，把東北的局面，弄得愈發不爭氣，物價直線上昇，貪官有的是流通券，把榨取百姓的血汗弄來的錢，囤一點積，倒一點把，優哉遊哉，「物價」又安能不「退避三舍」呢？只苦了中下級小公務員，小商人，還有普遍的下層百姓們，成了熱鍋上的螞蟻，叫也叫不出，喊也喊不出，誰讓他不懂得貪污，不會投機，這是天賦的物價的俘虜！說來令人痛心。

一年多接收的故事，不勝枚舉，現在我且先從瀋陽金佛失蹤這件事談起。

其實金佛失蹤這件事，已經是二年前的「舊話」，似乎沒有重提的價值；可是，在去年三月，瀋陽市臨時參議會第二次大會上，有一位參議員突然向市府提出關於金佛失蹤的質詢，接着查案一年毫無結果的警局在董市長一個手令下，又開始活躍起來，火熾地展開緝查工作，究竟這個案子何時才能水落石出，警局似乎也沒有把握。但是金佛已經丟了，這個佛在東北；毋寧是人民信仰的焦點，任何

人都不敢用手指戳，現在居然在一晝夜間丟得無影無蹤，而且連兩根金製的寶杵和銀製的日牙傘也都在內，令人驚奇不止！

談佛先要談廟，談廟又必先從喇嘛談起。在偽滿康德五年（成吉思汗七三三年，佛曆一九六五年）「奉天（即瀋陽）實勝寺說明喇嘛僧衆建設大綱全錄」中，關於丟佛的皇寺街實勝寺喇嘛廟，有以下的說明：

「噶哈噶喇廟，係黃琉璃瓦佛樓一座，在皇寺院內坐西朝東，樓上供奉噶哈噶喇護法佛（編者按：即失蹤之佛）一尊，設達喇嘛二員，掌管廟務，以下尚有在噶喇嘛多名，襄助廟務……」在廟內碑文上，并有「崇德三年」的字樣，足見該廟歷史的悠久了。

關於這個噶哈噶喇廟的產生，曾經有過一個近乎神怪的傳奇：據說從前有一個叫怕斯八喇嘛，用千金鑄造護法金佛一尊（即噶哈噶喇佛），奉祀於五台山後（今山西省境），當地百姓，均目爲天神，叩拜經月，後來此佛遷至沙漠（或係西藏一帶），喇嘛帝征服其地，將該佛由西北移至盛京（即今瀋陽），由喇嘛默兒根，騎白色駱駝一匹，手捧金佛與明寬溫仁皇帝同來，到了距城西方三里許地方（即現在孔市區厚生街五段該廟廟址），那個白駱駝，忽然四腿跪倒死去，默兒根連人帶佛從駱駝上滾下來，佛面朝東，於是奉聖諭，就在該地建寺一座，大興土木工程，並將白駱駝葬於保安街北首的一個荒場上，成了一個古蹟，一直到現在，還有人燒香給白駱駝。

默兒根就當了這個廟的大喇嘛（即主持廟務的最高權威者。蒙語稱做「忽突免」）。可是，廟也落成了，只是金佛的臉，始終是朝東的，廟門呢，倒是要向南，金佛擺入佛龕，第二天就轉了回去，

弄得默兒根一點辦法都沒有。大概是又奉到聖諭，將原來的廟拆掉，另造一座，所以一直到現在，佛樓朝東，佛面也朝東。

噶哈喇喇廟建立以後十分靈驗，可謂有求必應，當時極博皇帝的讚揚，并鑄造「七寶八物」、金鐘、銀器爲金佛作伴。不久，默兒根與世長辭了。

那時，有一位孫玉爺，欲往南出征，臨行的前夜，金佛托夢給他說：「你這次出征，我把寶杵一把贈你，你願打何方，便聽憑寶杵所指，奮勇向前，必可獲勝」。第二天，果然金佛的兩把寶杵丟了一把，並且，始終也沒回來，而孫玉爺是凱旋歸來了，遂用黃金鑄造寶杵一把配上，這事已經有三四百年了，不料直到今日，金佛也竟不翼而飛。假如發生在當時，其嚴重情形，大家也不難想見罷？

九一八以前，金佛一直是被人崇拜着的，皇寺廟的喇嘛也不知更換了多少，香火之盛，遍傳各地，每歲新春，並有蒙古人自西北趕來燒香。在九一八後，日寇統治期間，凡十四年，蒙人一直沒有來過，熱心愛國之士，並且用方法把金佛掩飾起來，所以日人雖潛，始終不知這個佛是金鑄的，更不知它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十四年中壓搾、蹂躪的金佛，安然無恙，可以說是一件幸事。却又想不到緊跟着光復以後，金佛竟告失蹤。確實日期，據市警察第六分局的報告，是三十五年三月三十日（即農曆二月二十七日）的正午，至三十一日的正午之間，佛樓的雙重鐵鎖，完全被鋼鋸鋸斷，在樓梯的上面，有被損的印痕。

佛長一尺二寸，它的重量，在六分局的報告上是六十二斤半，全係黃金所造，另外金杵兩根（約五斤）；月牙形銀斧一柄（重二斤四兩），是遼寧省徐主席贈送的。

在九一八以前，徐主席箴，對此佛極為信仰。他在北平時也會拜過雍和宮的大金佛。據說，十餘年前，雍和宮喇嘛廟說他「十餘年後在東北必可當大官」。七七以後，徐箴在大後方，也吃了不少苦，一直沒能飛皇騰達。光復後，徐氏重返東北，對喇嘛廟的金佛，異常信仰，認為靈驗，在他到任的第一天，便來皇寺廟拜佛，後來，又定製銀斧一柄，在前年三月十八日（農曆二月十五日）派居士李紳送到廟來，另外附送「噶不辣」一個（蒙語，係盛供酒所用，以人頭蓋骨鑲銀邊製成，俗稱「人頭酒海」），均由該廟達喇嘛鄔根泰大來接受。

三月三十日正午（即拜佛的頭一天），鄔根泰大來照例焚香，向金佛叩拜，那時徐氏所贈銀斧及「噶不辣」都在佛龕前置放，他燒完了香，就緊緊地關閉了佛樓的門，走下樓梯。到第二天（卅一）的早晨，徐箴派人來說：定當天下午來廟拜佛。到了正午，鄔根泰大來到佛樓燒香，並打掃禪堂，準備徐氏前來，不料佛樓已經大開，金佛不翼而飛，連徐箴所贈銀斧也不見了。

到了徐氏拜佛時，金佛已丟，他連呼「無緣」而去。各位喇嘛更嚇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這件事傳出後，瀋陽各界均極注目。因為金佛雖非純金，但在目前價值亦不在少數。最可惜的就是金佛的聲譽，從此銷聲斂跡，並且有不少人閒言閒語，說某大員拜佛與此事有關，把這個故事穿插得異常離奇。

當時六分局局長陳宜權，便下令將全體喇嘛捕去，嚴加訊問，結果仍是毫無線索，大傷腦筋。在衆喇嘛扣押之際，皇寺廟前門又着了一次大火，將廟間及西角樓燒光，另外廟門的一大片攤床也都化為灰燼。

一直到今天，皇寺街的床攤，仍舊流傳着一個神話，說着火那天，有人會看見有一道血光，自天而降，接着大火燎原。可是，衆喇嘛這時正在分局裏密問，等到他們釋放出來，金佛既失，廟門又焚，心裏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了。

白崇禧二三事

小諸葛白健生將軍，保定三期畢業，爲人雍容爾雅，善於辭令，如果換套便服，倒很像一位教授。性好讀書，不論在學問和軍事上，都有相當深刻的研究。記得楊杰將軍曾經說過，中國只有三個半軍事學家，第一個是已故的蔣百里將軍，第二個蔣主席，第三個是楊本人；至於白崇禧只算半個罷了。平心而論，楊在軍事學上確實有出人頭地的地方，上述云云，是否定論，無法深究。要之，白在楊的目中雖然次於他本人，可是較之其他耀武揚威僥倖成功的將軍們，却仍是勝人一籌。白的機智，在一般武將中是少有的。據說遠在民國十八年，當北伐戰事勝利到達平津一帶的時候，那時任參謀長兼前線總指揮的白崇禧，聲名雀起，超過僑輩。於是白氏就受了猜忌，有人準備動他的手，幸虧白的機智過人，連夜不別而行，出亡到塘沽。那時守塘沽的正是白的老部屬李品仙，那時李已經受命，除白可得重賞，當然不便留白，然而因爲老上司的關係，也不忍出賣他，於是學了一幕陳宮放曹，棄了兵權，眼白出亡。白李剛乘上一艘日本船，準備潛回廣西的時候，奉命追趕的唐生智就趕到了碼頭，說時遲，那時快，白氏一急只能躲進一個木箱中。唐雖然一再和船長交涉，要求搜查，可是船長始終不

答允，那時的日本人，正在到處尋事，當然不是好惹的，唐將軍無奈，只得打道回衙復命，白氏也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逃出了虎口，匆匆回廣西。於是關起門來，全力經營廣西。以後的幾年，是白氏工作表現最有成效的時期。那時全國在大革命中的破壞，到處烏煙瘴氣的情況下，廣西一角能有比較好的政治設施，當然是值得讚美的，這就是李（宗仁）白所以得人稱道的理由。

那時李宗仁將軍任四路軍總司令，白副之，黃旭初則任廣西省主席。李爲人爽直忠厚，黃則唯命是從，所以實際上負責籌劃的還是白氏，白氏除了擅長軍事之外，兼有政治頭腦，手段圓通，辯才橫溢，所以李、白、黃三人相處很好。那時王公度任四路總部政治部主任，王爲人沈默寡言，做事不動聲色，政治手段也是極其高明，李白對之非常信任，在政治部特撥專款，許王便宜用事。那知此公也是個野心人物，表面馴順，心懷詭詐，趁此機會，全力培養自己的勢力，他的勢力澎漲又快又祕密，不但政治部全是他的人，就是部隊方面對王的信仰也非常大。直至王氏行將發動推翻李白而自代的時，才被白氏知道，於是立即下令逮捕。逮捕後白含笑對王說：「想不到你倒有這樣大的野心！」王答以：「野心沒有，抱負倒有一點」。以後王公度被槍斃了；然而王的黨羽却没有受一點處分，最有趣的，白氏還把王的衛隊長調爲自己的衛隊，晨夕侍從，這當然是白氏所以被譽爲小諸葛的一端了。

廿四年兩度發動了有名的「六一運動」——在中央一般人叫做「兩廣事變」。在「六一運動」之前，廣西爲博得國人的同情，特地把淞滬抗戰的蔡廷鍇、翁照垣等人拉到廣西來。翁是實心人，在駐紮北海一帶的時候，發動了真正的反日行動。「六一運動」之初，李白是很想幹一下的，不幸廣西太窮，有錢的粵陳（濟棠）又太不中用，湖南何健則投機取巧，最後張雲黃光銳又把二百架飛機帶跑了。

，終於使白氏不得不放棄廣西單獨抗日的計劃。

在抗戰初期，白氏是相當積極的，七七前某日，白氏由桂飛京，日本某報曾大事標題爲「戰神抵京，戰事不可避免」云云，可見日人對白的重視。說起日本和白的關係，又是白氏機智過人的一個註脚。起初日本人錯看了白氏，企圖利用廣西造成中國混亂局面，以便混水摸魚，於是送軍火，送人材——桂軍中有很多的日籍技術人才！——可是白氏一發覺，到了非服從中央不可的時候，就立刻臉色一變，把軍火債賴得一乾二淨。反正日本賣軍火給廣西，在國際公法上是助成他國的內戰，是種違法行爲，不便公開索債的，這些日本槍砲，抗戰時期，在江浙一帶，便殺死了許多日本鬼子，也可算是日本軍閥自食其果的報應了。

白氏服務中央以後，就全力協助最高當局策劃抗日戰事，在淞滬一帶作戰的時候，桂軍的英勇和犧牲的慘烈博得國人的一致頌揚。其後桂軍又在李白的直接指揮下，在台兒莊打了大勝仗，台兒莊以後，李白就一直走向下坡了。不過，白的才能也使中央不願輕易讓他投閑，在三十二年白氏表示消極之時，中央特地借白氏老母九十壽辰，派何應欽到桂林懇切地安慰了一番，於是白氏又受命馳驅，再回重慶。他的榮任國防部長，都可以表現白氏是怎樣爲政府所借重了。

工農民主黨內幕

在民主同盟未被解散以前，民盟中所有謂人和勝的農工民主黨一角，它之能埋頭發展，掌握住民

盟的組織，說起來是有曲折的。

說農工民主黨以人和勝，有兩個根據：一是它的領導人章伯鈞，從來不大和民盟中其他派系首領鬧糾紛，所以大家不和他爭民盟中的組織大權，又一是該黨內部不鬧人事磨擦，其黨員和幹部，平時相處，都很有「中國氣派」，相當注重感情結合，他們常以此自誇說他們的夥計，一旦脫黨，絕不會做出破壞組織出賣朋友的行為，他們常以脫了黨的譚平山仍與該黨幹部保持友誼的聯繫做例子，說明他們是有一絕交不出惡聲」的君子風度的政黨。他們反對採用共匪所用的嚴格的批評，反對採用共匪所盛倡的革命競賽制度，因為他們認為這將破壞他們的傳統，會使黨內發生裂痕與紛爭的。他們認為相忍為國是中國的好道德，也是中華民族優良的民族性，所以他們認為共匪習用俄國革命的黨內批評和鬥爭，是違背民族性和民族道德的。

農工民主黨是第三黨的今名，第三黨的正名是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行動委員會又是中國國民黨行動派的後身，行動派則為鄧演達所領導，第三黨的名稱，原是人們渾喊喊出來的，因為國共兩黨在北伐時起了衝突，身為國民黨而又為共產黨員的鄧演達派，發表了既不同情國民黨而又不同情共產黨的政見，創出了新的組織，人們遂把他們稱之為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黨，他們的名稱又醜又長，反不如第三黨三字來得又順口又明朗，後來歷經改稱，他人反不知其正名，而多知其渾名，結果弄得他們自己認為有傷自己體面的渾名於他們反有用處，自己也用起它來了。

真正說起來，第三黨應該說是共產黨的支派，因為他們信仰是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來訓練他們的黨員的，比如生活書店出版的青年自學叢書，他們便採用之為他們訓練新

黨員的理論書籍，而他們對於不滿共匪盲腦作風和其妄動路線而脫黨的中央黨員，却是拚命拉攏和吸收，足見他們在政治立場上應該視之爲共匪反對派。而且，在抗戰初起前後，盛傳第三黨要求加入共產國際被婉言謝絕，可是他們不能爲國民黨的支派，然而他們竟自稱爲中國國民黨行動派，甚至於在抗戰初期發刊於漢口的該黨機關報，還冠以「行動」之名，它在政治立場上左右不定，其投機取巧亦可想見一斑了。

至於他們之與共匪，在「一二八」以前，還處於對立狀態，後來在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時，周恩來到章伯鈞住宅見到該黨政綱，稱讚不絕於口，於是，他們在政治上開始互相勾結起來了。

洪門組黨前後

在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中，有一位洪門的老大哥，八十多歲高齡的司徒美堂先生，從美洲飛到上海，中間曾經有過一樁不小的事，召開全球懇親大會，想組織一個致公黨，以洪門作背景。後來似乎是懇親大會來了阻礙，致公黨也就沒有下文。後來國民大會在京舉行，司徒老先生，突然又有了一個「民治黨」，他要參加國大，又因爲以前未曾參加過政協，國府不予考驗，造成了來者不要，要者不來的笑談。

不管致公黨也好，民治黨也好，但是都脫不了洪門的關係。

洪門，在中國是有組織的一個祕密團體，起源於明末清初的時候，彼時清兵入關，國土變色，明

末的遺老，和愛國的青年，揭起「反清復明」的旗幟，誓圖恢復河山運動的團體，史可法鄭成功都是領導這個團體最劇烈鬥爭的人物，後來明朝傾覆了，洪門爲了避免滿清的注目，才漸漸的轉變到地下組織，深入各階層活動，一部份則逃亡在海外，繼續秘密結社，在滿清三百年中間，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的也發生過不少次。

談到內部組織，國內的有「山」「堂」「會」「社」的區別，最高的負責人，稱爲龍頭大哥，俗稱「山主」或「寨主」，下面設內八堂和外八堂，分掌內外各項事務，就大體上說，洪門雖屬於社會性的幫會組織，但其組織系統，却根據了政治組織形式而完成的，至於海外洪門，僅有「致公堂」的名目，成立的時間，還在康熙甲寅年，迄今已有二百七十多年的歷史。

洪門雖然具有政治形式性的良好組織，但是有特殊的條件配襯着，就是「行動」「語言」「文字」「法規」「禮節」，才能完成這一個秘密的團體。

洪門的動機，是恢復祖國，聯絡志士，成功一個反抗的集團，因此遇到過不少次機會，終於被人破壞，於是爲了避免無謂犧牲，才將行動秘密起來。又恐怕語言函件不慎，走漏消息，有疑工作進行，所以創造了特殊的「語言」和「文法」。復有「禮節」，使人有一見便知親疏，更以「法規」來維繫團體的準繩，使人終身遵守，不可或逾，洪門能够存在，也就憑藉於此。

說到海外致公堂，以前的不敢說，但對於辛亥革命以至對日抗戰，不能否認他們對祖國是有着很大的貢獻的。

當辛亥革命以前，孫中山先生鼓吹民族思想，深知洪門的勢力龐大，在一九〇四年（光緒甲辰年

三月間，初次到美國時，就加入洪門致公堂，位居「紅旗」（在國內通稱爲「老五」，海外通稱爲「紅棍」）？因爲這種關係，深深獲得華僑熱烈的擁護和經濟的幫助。

自抗戰軍興，洪門會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在渝成立「人民運動委員會」（後來改爲中國社會建設協會）號召海內外「山」「堂」「會」「社」，舉凡青、紅、漢、理、白、回六教人員，總計一億二千萬人，發動各階層抗戰工作，國內西北九省中國民生共進黨籌備會，和海外的致公堂，就是洪門三大枝幹的團體。

這時的海外致公堂，因爲澳洲南非以及南洋的交通不便，雖然在美洲召開了各地洪門代表會議，將致公堂加以改組，成立了駐美洲總部，司徒美堂先生，就擔任了總部主席，自居於海外洪門領導者的地位。

全球懇親代表會是在上海召開的。一開始，因爲冠用「召開」的字樣，似乎給了國內各地的山堂一個不良的印象，洪門的門訓，是以篤信忠義，矢勒矢勇，除了大哥之外，都是仁兄仁弟，用了「召開」，各地山堂，顯然是變了部屬，未免有背門訓，當然還有別的深意的存在着呢？可是經過了各地山堂的反對，原來計劃被突破了，於是便成立了十五人的籌備主席團，卽杜月笙、向松坡、趙昱、徐朗西、鄭子良、司徒美堂、楊嘯天、韋作民、楊慶三、張書城、程壯、張子廉、陳其芬、楊文道、楊天孚等，分配的區域：大約是海外四人，上海四人，華北二人，長江二人，香港一人。

以後呢？懇親會過去了，改堂爲黨的計劃，經過洪門的大哥，撥出洪門是民主化的道義結合，事成退，並不參加政治，一連串的門訓，致公黨終於被否決，而仍爲致公堂，海外洪門的團體。

這時候，海外一部份的洪門，對於司徒老先生的主張錯誤，紛紛離去，當然還有一部份是擁護者，爲了想在政治上活動，就小組織的成立了民治黨，對外宣稱有一萬萬的黨員，其實都是洪門的仁兄仁弟，却無形中受了司徒老先生的填腳石。

民治黨不能參加國大，司徒老先生却以海外代表資格，踏進了國大之門，政治地位是有了，不滿足的，是黨的問題了。因此，在京會招待過一次記者們，謂：「洪門兄弟，所以請求參加國大，絕非希圖獲得做官之權利，今日民不聊生，吾人實有獻身於和平民主之任務，政府拒絕洪門黨出席國大，殊不合理，因本黨擁有黨員一萬萬人以上，不應置之不顧」。似有點悔憤不平。其實也是遮蓋民治黨的失敗的。

末後，洪門做大哥的條件，最重要的一條，是「盡義務，不能假公濟私，乘機取巧」。所謂民治黨一萬萬黨員一點，真有點使人懷疑，把兄弟和黨員混合在一起了。

青年黨內閥真相

青年黨醞釀分裂，已非一次，早在民國十六年，黨內即鬧着嚴重的派別鬭爭，起因是「醒獅」報上會琦的文章「嗚呼」兩字用得太多，遭人反對。陳啓天原與會琦有隙，此時即藉此大肆攻擊會琦，并取「醒獅」報而主編之（在此以前醒獅報主編爲會琦）。於是會琦，亦召集黨徒還擊陳啓天，十七年陳啓天在武昌中華大學演講時幾乎被會派人用石塊和桌凳打死。廿四年以後，青年黨又鬧着「老大

哥派」與「少壯派」的鬭爭，老大哥派以左舜生李璜爲首，少壯派以謝澄平爲首。二十六年多在武昌陳啓天家中，少壯派易維精等和左舜生發生衝突。廿九年以後，又鬭着「四川青年黨」與「外省青年黨」之爭。一日，李璜召集四川青年黨員訓話，大罵外省青年黨員，不料那天到會的四川青年黨員中竟有兩個女黨員名史賢珍、史賢玉爲外省人，係青年黨少壯派首領謝澄平小同鄉，安徽當塗人。這消息一傳出，於是外省青年黨員黃欣周、劉鵬九等遂與四川青年黨員李璜魏司珍等不合作。

青年黨組黨的歷史雖久，但在政治上從未抬過頭，就在抗戰期中，該黨多數人物在大後方，也不是參政員之流，黨魁曾琦，還把大部份的時間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這時期中，青年黨的立場是偏向民主同盟的，那時青年黨領袖參加民盟的，有左舜生。成都的新中國日報，亦被列爲民盟機關報之一。到後來政府與共黨的談判繁雜起來，民盟以唯一中間黨地位，并以在野黨立場批評政府頗爲銳利，乃由某要人派人與曾琦接洽，結果，青年黨乃與民盟貌合神離，在大體上擁護政府的大政方針，而獲得合法活動的便利。這時曾琦也回到重慶了，更宣佈青年黨與民盟絕緣，以單獨身份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果然，曾琦派的青年黨在政協中大體上迎合了國民黨的意見，而被人譏爲「在野政府黨」了。青年黨在國大代表的名單上，也得到國民黨的支持而獲得相當的滿意的數字。勝利以後，其他黨派雖然佔不到甚麼便宜，但青年黨却例外的得到方便。要辦報就辦報，要房子就有房子。這一切都說明就黨的利益言，曾琦確是有功於青年黨的。

然而問題也就發生在這裏，既然這些利益都是曾琦派的人所活動來的，這一派人在黨中，自然是最有力量有發言權的了。這其間對內的措施失去平衡總是難免的。尤其是大哥派與少壯派，四川派與

下江派之間，難免發生差別的待遇。國大代表名額的分配，既然會派以爲都是自己賺來的，最好由自己的一派來享受，於是乎就激動了少壯派和下江派的首領。三十五年出面的周濟道，便是一個籍隸江西的下江派，但在周濟道後面策劃的，據說就是少壯派領袖謝澄平。周濟道是青年黨的老幹部，現任該黨中央委員，加入青年黨有十年以上歷史，可以算得上開黨元勳了。淪陷期間，周氏負責領導該黨京滬一帶的「地下工作」人員，在青年黨頗有力量。但因此受到會琦等的排斥，直接的導火線有人就是因爲十四萬萬元「黨費」分配不均，但據熟悉內幕的人說：主要的還是百名國大代表引起的問題。因爲這一百名代表幾乎全爲會琦派所推薦的，而且僅限於後方的黨員，這樣自然就引起了京滬一帶青年黨員的不滿，所以參加「革新運動」，多爲京滬區的黨員。

會琦說：周濟道會附過逆，他說出這一句話，很多人爲會琦捏一把冷汗，周濟道在南京招待記者時，就有人問他說：「傳會琦在戰時久居淪陷區，且在敵僞統治下之平津京滬來往，究係爲何？」周的答話很含混，他說：「這些事除一個人外別人無從知道清楚」。可見周還不願抓破臉，有趣的是這一句話，並未嚇倒會派人物，却急煞了官方，據說，周濟道說了這句話後，南京的中央日報便接到某要人的電話關照，千萬不可發表出來。另外，聽說周濟道會表示爲會琦對他有不利時，也不得不公佈會的一些過去事蹟，不過以事實來看，不致於會演變到這一步。因爲會琦派不願太開罪他們，目前還是採用硬軟兼施的手段，來分化他們，而且已有政府某巨公從中斡旋。新青年黨反對最力的還有一位就是劉東岩，昔日會琦卜居京滬時，劉東岩頗爲會琦賣力，爲酬庸功勳，所以內定他任會琦或左舜生的次長。外傳安徽的青年黨做茶葉生意虧了本，這一點恐怕是不可靠的，不過安徽青年黨是少壯派領

袖謝澄平所領導的，這也可以看出是反會的一派。

張道藩為何棄官

提起了張道藩，就會使人想起他在南京文化堂「拜師」的一幕喜劇來，一時傳為美談，成為飯後茶餘的談話資料。

張道藩的拜師，據他自己的表示是：「為發揚尊師重道精神」，事前曾得蔣主席的同意，有過一個簽呈給主席，裏面是寫着：「道藩為發揚尊師重道精神，俾能對文化界藝術界發生重大影響起見，特拜高風亮節譽滿中外六十八高齡之畫家齊白石先生為師，並訂於十一月三日下午六時，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文化會堂舉行拜師典禮，希望此一事件，不特引起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對中國固有文化與藝術有更深切之認識，而中國尊師重道之精神，亦可藉此獲得恢復之機會，以糾正今日一般青年以為自己向教師買知識，而不知尊師重道之錯誤觀念。此種瑣事，自不敢奉屈鈞座及夫人親臨指導，如經國緯國伉儷或待從之其他同志，樂於蒞教，至為歡迎……」

張道藩的突然棄官拜師，顯然地表示着他態度消極，與其毫無意義的捲在宦海裏，還不如擺脫這些煩惱，享一點藝術的清福。所以此次拜師喜劇，表面是張道藩一己之愛好藝術重揚師道，其實主要的內幕還是由于派系之爭與官場失意，內情是相當曲折的。

張道藩現年五十二歲，說起來與蔣主席還有點親戚關係，曾做過國民黨中宣部長，兼中央文化運

動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調任海外部長後，梁寒操繼任中宣部長，張則仍以部長資格下兼文運會主委，不惜降格相從，原非本人願意。但爲派系的利害關係不得不然。因爲那時全國的教育文化，大多操在某系手中，張是該系的大將，自然不能輕易放鬆這個文運會的。記得在六中全會時，有人提議成立「中央文化部」，把中央文運會改組爲部，使全國文運的機構全部劃屬於下，因爲那時軍委會政治部下有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青年團內也有一個文化建設委員會，形成了鼎足三分之勢，某系深感文化運動未獲統一之苦，於是就有人提出了上項建議，可是立刻遭到了各方反對，致未獲通過，只把中央文運會升格爲中央執行委員會直轄，與各部會平行，主委一職，仍由張道藩兼任。

勝利以後，張道藩亟謀東山再起，積極活動中宣部長，均告失敗。憑張道藩的關係與手腕，照理是不應該失利的，結絀所在，因張道藩是某系的幹部，而中宣部自吳國楨就任以後，一直爲T.V系所把握，某系方面迭次想把中宣部長爭取過來，都未能如願。爲了這一個部長的問題，T.V系與某系的暗鬥是相當熱烈的。T.V也很想把許孝炎副部長調開，換成清一色的班底。例如前中央社駐紐約特派員盧祺祥的調回中宣部主任秘書，據說便是一隻很辣手的棋子。按盧祺祥本來是某系的人，後爲宋氏在美國相遇後賞識，乃脫離某系投奔宋氏。

在這種複雜的局面下，張道藩要想做中宣部長，無異與宋氏爭長短，自然是必敗無疑的了。後來張母在黔逝世，予張氏以更大刺激，一氣之下，以奔喪爲名，離京赴黔了。

返京時，又聽說南京市長馬超俊將調任農工部長，張道藩看準此缺，展開活動，某要人雖亦迭次推薦，但最高當局總是毫無意思，結果南京市長一職還是由沈怡佔了勝利。張道藩又落了個空。

張道藩受了這兩次打擊，據說再加上了私事上的糾紛，頓萌退念，在一個紀念遇上，忽然發表了下面的談話：「道藩今天要報告各位一個消息，以後道藩不做官了，道藩是學美術的，人家都說，道藩的美術造詣深，攪起美術來一定比做官還有成就，所以決定擇最有名的六十八歲的老畫家齊白石先生爲師……」張道藩在莊嚴的大會上，發生了奇特的舉動，某要人深恐受到譴責，立刻替張道藩向最高當局解釋：「道藩因新近喪母，情緒上難免受了刺激，於是態度突變消沉了」。並於當晚發出了一個消息，說是張道藩因旅途勞頓，偶感不適，已赴湯山休養。

在三十五年十一月三日，拜師的那天，張道藩會當着許多朋友的面，拉着某要人說：「有人挖苦我，說我張道藩爲了做官曾經向某某磕頭，現在大家都在此地，請大家問問他們，我張道藩何會向他們下跪過」。張道藩如瘋如醉的說着，却弄得某要人很不好意思起來，只得連連搖手說，「沒了的事」！「沒有的事」！

吳稚暉的風趣

大家都熟悉這位孤高而風趣的吳稚暉老先生，國府高級官吏就職時，他是老牌的監審員，例有訓話，在莊嚴中夾着幾句俏皮話。

吳氏爲國民黨元老，道德文章，冠冕當代。蔣主席尊之爲「黨國環寶」，馮玉祥會稱他做「白頭少年」，胡適更譽爲「近三百年大思想家之一」。其秉性極孤高，努力克己，生平嘗以不做官，不乘

人力車，不用奴僕爲立身的準繩。在重慶時，常常穿着敝舊的布衣服，拿蒲手杖，在路上若無其事的走來走去。他所住的那座「抗戰房子」，薄薄的瓦片，竹紮的屋架子，牆是用竹片和泥砌的，陳設很簡單，屋內僅可容數人。

吳氏原爲武進雪堰橋人，他少年時候，到陽湖縣（屬常州府）應童子試，因爲口音像無錫人，同考的人疑心他是冒籍，羣起毆之，因此吳稚老恨極，就終身自認爲無錫人。光緒十七年，中了舉人，但他對封建思想，極爲反對。有一次，吳氏宗族修譜，他不贊成，憤憤地把字盤全都傾翻，因此大遭族長及公親的忌恨，不得已乃逃出故鄉。光緒二十四年，在上海任南洋公學校長，與元和陳懋治，共約不復讀綫裝書，又以「缺敬與恆，不足任天下之重」，於是改名爲敬恆。

民國十年，任里昂中法大學副校長，率領一班學生出洋，一日，吳氏在船上拾到一條臭髒褲子，親自把他洗乾淨，然後出了一張佈告：「地上拾到一條臭髒褲子，已代洗淨，是那一個人？請自領回。」有時候，學生們將瓜子果殼，隨地亂拋，吳氏也親執箕帚，去掃乾淨。

民國十三年，任中央監察委員，一直連任到現在。在黨國元老中，他已是元老中的元老。又因他誓志不做官，除監察委員外，不兼任職務，除非重要的會議，他也不輕易參加。因此又獲得樣「朝中的在野名流」的雅號。

吳稚老的筆調，是向以潑辣善罵出名的。汪逆附敵時，吳氏第一個著文痛罵，爽辣無以復加，罵得汪逆體無完膚。他又會和章行嚴氏大開筆戰，竟來了一道替章氏報喪的計開，原文是這樣的：「不友吳敬恆等，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敵友學士府君，府君生於前甲寅，痛於後甲寅，無疾而終。」

不友等親視舍歿，遂古心喪，誰（非苦）塊皆迷，不便多說，哀此計聞」。並附數語云：「所謂罪孽深重者，乃紀實，因一般朋友不長進，於國事不能積極前進，弄得章先生悲憤無聊，走頭無路，從而反去走進牛角裏灣到十八層幽谷也」。可謂極盡挖苦的能事。

他的演說，也是滑稽突梯，口沒遮攔。有一次，南京召開大會，請吳氏演說。吳氏嫻嫻來遲，登台就說：「我昨天晚上與老妻夜遊敦倫，所以今天精神很疲乏，來得晚了，請諸位原諒！」台下爲之哄堂。吳隨從蔣主席赴漢口時，武漢各界舉行大會歡迎，吳氏代表蔣主席演說，時天氣酷熱，吳稚老開口便說：「我昨天晚上，一覺醒來，發現我的褲子都濕透了，起初我疑爲遺精了，但是沒有做混帳夢，後來才知道是大汗。」

吳氏的生性談諧，已從上面可見一斑，但因此常開罪於人。某次教育部開讀音統一會時，與王樸忽起爭執，王氏口吃性燥，理由又不充分，破口大罵吳氏：「老王八且，只知嘻皮笑臉，何嘗懂得語音學？敢來和老子一爭短長？」語極難堪，全堂愕然失色。而吳氏從容起立笑着說：「王先生錯了！也許是氣昏了吧？稚暉姓吳，非貴本家也！」全堂人士不禁爲之哄然大笑。

吳氏通英法德日四國文字，著述甚富。著名的有「上下古今談」、「天演學圖解」、「荒古原人史」、「跼窻客座談話」、「吳稚暉全集」等書。辛亥革命後，在法國與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等組織留法儉學會，發行世界畫報，翻譯反抗帝國主義的名劇。民國十三年，主編的科學週報，每期都有吳氏的文章，主張以科學救國，反對讀綫裝書，這位年逾八十開外的黨國元老，真是一位老當益壯的「白頭少年」。

張君勱與張嘉璈

在目前政治上，兄弟同時為大家所知道的，有陳果夫、立夫先生，宋子文、子良、子安先生，谷正倫、正綱、正鼎先生。自從民社黨參加政府以後，有人把張氏君勱嘉璈昆仲，也列入在裏面了。

君勱原名嘉森，好像是與蔣主席同庚，他早歲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及德國柏林大學，第一次歐戰發生，他與梁啓超均在歐洲，遂同舟返國，民國八年歐戰終了後，又隨梁氏作一次新大陸的遊歷。民國十年在上海組織「政治學會」，自任會長，穩然是一位費聲國際的政論家。那時的政治學會，也穩然握着國內政治研究的重心，同時還辦了一個「自治學院」來培養政治人才。

當時國內論壇上，發生了一次科學與文學的大論戰，由丁文江開始，由吳稚暉收場，參加的有陳獨秀、胡適、梁啓超、唐鉞、任鴻雋、范壽康、林宰平等，張君勱便是其中的一名要角，他是站在文學方面的，同時胡適的一篇趣文，是叫「孫行者與張君勱」，意思是說他的勳斗，始終翻不去養先生「科學」和邏輯先生的手掌裏。（亞東書局曾搜集了這些文章，出了一集「科學與人生觀」，同時郭夢良也編集了一本「人生觀論戰」由遠東書局出版）

後來由丁文江的拉攏（時丁任淞滬商埠督辦，係由當時自命為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所委派），得與孫傳芳認識，得到一些補助，乃在吳淞鎮東（張氏係寶山人）建了新校舍，把自治學院喬遷過去，並改名為「國立政治大學」，分政治、生計、外交、社會、市政諸科系。那時在大學執

教的，有張孟劬、孫隘堪（德謙），均以治章實齋「文史通義」著名的。有聞一多、沈彭年（曾任江蘇教育廳長）甘介侯、張東蓀、陸鼎揆、金井羊、潘光旦、朱亦松、金國寶、葉元龍，現任上海市長吳國楨，那時剛自新大陸留學歸來，也在該校任了幾點鐘的西洋史。

北伐軍下了武漢，他曾親去武漢觀光，發表了「武漢見聞錄」的小冊子，一反以前研究系的看法。但當時黨人並未予以重視，政治大學門上，貼上了市黨部的封條，後來改作中大醫學院了。

在國民政府之下，他一直埋頭着，後來與張東蓀同在北平燕大研究院講學。九一八事變後，開始籌組國家社會黨。廿二三年間，偕同張東蓀到廣東陳濟棠治下創辦了「學海書院」，自任學長，後來陳氏下台，書院也就結束。抗戰以後，又在貴州辦了一個「民族文化學院」，他始終未忘作育人材，所以有人對他評判，說他到底還是一個學者，並不宜於作一個政黨的領導者。

嘉猷字公權，金融界多知張公權，出任部長之後，才復用張嘉猷，這就好像戴院長經商時用李陶，為官時用傅賢一樣的。他是留日慶應大學經濟科，初受知於浙江都督朱瑞，旋入國會任祕書，袁世凱解散兩院，乃轉入中國銀行，從此一直執着金融界的牛耳。

當梁啓超一度入閣担任財政總長，原擬派張君勱為中國銀行總裁，張是有書生氣的，他自承不懂金融，何能去濫竽？於是乃推薦已在該行服務有年的乃弟張公權，並建議改革財政部管理中行的制度兩項：（一）中行總裁由財政部委派，代表官股，不隨總長進退，予以規定任期；（二）副總裁在商股中選派，政府不得隨便更換，以專職責。梁氏全盤接受，於是指派張公權為中行副總裁，一時給與在中行歷史較久的王克敏、宋漢章輩一個很大的驚異。

張在中行，曾經大刀闊斧的辦過幾件事，給行內外看看他的顏色，不得不對他服貼，於是乃奠定他在金融界成爲南派的領袖（北派領袖爲吳鼎昌，以鹽業、金城、中南、大陸爲基礎）。第一件是：袁世凱籌備帝制，曾經提用中交兩行的發行基金，於是下令將中交紙幣一律停止兌現。那時張公權正在上海，海上金融幾乎整個握在商銀行之手，華商銀行基礎甚爲微弱，果然停兌，則華商銀行的地位更將一落萬丈，於是他與宋漢章（那時宋兼任商會長）計議之下，決定毅然不予執行，大受社會讚許。第二件是：國府奠都金陵，他首將中行總管理處南遷上海，於是所謂北派四行，也跟着喬遷，金融重心整個南移，給國府一個有力的贊助。所以後來上海金融界的一舉一動，幾無不以張公權馬首是瞻。

民國廿四年，英國財政專家李滋羅斯被聘來華，與全國經濟委員會主席宋子文，財政部長孔祥熙，商定了法幣政策，於是年十一月初執行，於是先開始收回各實業銀行發行權。通商、四明、中國實業等（均發行鈔票銀行）均加入官股予以改組。對於中交兩行，則再增加官股，中行由十之四加至十之六，交行由十之三加至十之五，而於領袖羣倫的中行及張公權，尤特別作爲目標，於是中行改組結果，宋子文當選常務董事，並由財政部指定爲董事長，立刻改總經理制爲董事長制。

同時政府首次宣佈羅致黨外人才（黨內人則說是啓用政學系）。於是南北兩金融領袖，都由商而優則仕起來，張公權與吳鼎昌入了閣，一個榮任鐵道部長，一個榮任實業部長，從此張公權與金融界暫告絕緣了。後來吳部長轉任黔主席，轉文官長；張則由鐵道而交通，而東北行營經濟委員長，而中央銀行總裁，至今仍是當朝一品。

張嘉璈現已被目爲政學系人物，實則張未入仕前，執着金融界的牛耳，無所謂派系，乃晴空霹靂，竟一脚踢出金融界，縱有涵養的人，也不能不負氣？這也是逼上梁山之一例。

張氏弟兄有好幾位，弱弟張禹九，禹九的夫人張肖梅（外傳張妹，大誤），都是中行裏有名的經濟專家，而他們令妹徐志摩夫人，便是女子銀行的創辦人。記得有一年，張氏父母雙壽，梁啓超贈聯云：「看一門羣紀，盡杞梓宏才，純綬齊眉，到此方知荆布貴；集四海膺滂，爲椿萱祝壽，大孝鑿志，何人不羨綠衣榮」。譽者謂祇有他家才配。

轟動陪都的高秉坊案

這是重慶勝利前夕所審判的一件轟動全國的貪污案！

當柳州、獨山相繼淪陷敵手，貴陽吃緊的時候，重慶的空氣也緊張起來了。某日，在從重慶到長江上游某一安全地帶去的路上，交通檢查機關人員曾檢查到某大公館的眷屬僕役人等，帶着三十多件的貴重箱籠，行色匆匆的從重慶市向安全地帶逃難去了。

高貴的僕役們向檢查人員遞過了堂皇的名片——
「我們是財政部直接稅高署長公館的！」

這時候，敵人距離陪都還有千餘里！一個國家高級官吏神經過敏的警覺，激起了檢查人員的憤慨，即刻把這件事報告了我們的最高當局。

以這件事爲引子，加上各方面接連而來檢舉和告發，於是財政界紅極一時的直接稅署長高秉坊，先以免職，繼之以逮捕，終於移送法院，經過數月的偵訊，而宣判「死刑」了！這可算是從民國以來財政大員以身正法的第一人！也可算是從特種刑事案件歸還司法辦理後第一樁動人的大案！

昔日紅極一時的高秉坊，到此成了萬人唾罵的貪官！爲了想在法律面前，希冀萬一的解脫，他不惜化費往日貪污得來大量的金錢，聘請律師，替他撰狀，替他出庭辯護。但重慶市的律師們，不約而同的都拒絕了他的請求，不願接受這位貪污所得的百姓血汗錢，到最後聽說他竟然化了一千萬元的冤枉錢，請得了做過「老虎總長」的章士釗大律師，替他作辯護，但這位章大律師也只是懂懂答應替他撰狀，出庭則由他的學生代理。

結果，章士釗在法庭上遇到公正不阿的李懋宣庭長，碰了一鼻子灰！

被處「死刑」的高秉坊，已經是六十歲以上的高齡了，在國內的財政經濟學者當中也可算得是數一數二的權威人物。當年在金陵大學、北京大學做教授，從政後，初在工商部供職，後隨孔祥熙入財政部，一直擔任着賦稅司司長的職務。因爲他是研究直接稅的專家，也由於他的倡議而成立直接稅處（後來改署），因此受命主持全國直接稅行政，據說這位署長平昔恃才傲物，除了捧住一個上司——孔祥熙，眼前再無旁人，一方面，則又生活糜爛，公館裏終日雀戰，規模大得驚人。本來一個直接稅署的署長，只管行政不經手錢財，似乎無從貪污。但這位稅收「專家」，也是貪污「專家」，豈肯坐失撈錢機會，於是他想出害人害己的方法來了。

民國二十九年間，這位「專家」替政府創設了一種叫「一丙保證金」，通令全國施行，這才使他

走上犯罪的途徑。這一種保證金的制度，是專以流動商爲對象的。凡商人從甲地購運貨物至乙地出售時，須先向甲地稅局繳納貨值百分之二十五的保證金，迨這貨物在他處出售之後，再行計算稅額，多還少補，如逾六個月不來計算，即撥作稅額入庫。這個辦法實行後，流動商人一因怕麻煩，二因往返不便，三因戰時利得已多，十九皆於繳納保證金後，即予放棄，因此各地稅局就有了動用這筆規金的機會（因爲它可以不繳庫，又可以隨便存放）。同時，總署又規定，可以向各省局及分局提挪此種款項，於是署長便有了利用公款經營商業的機會。各稅局收繳一丙保證金的數目是相當鉅大的。據此案各調查機關的報告，稅局對於此項保證金的處理保管，既不遵會計手續，而起征時利息，及撥轉稅款的移鑿用處，亦多紊亂糊塗，至於提用保證金，尤比比皆是。稅局收繳保證金，商人以之轉嫁於消費者，稅吏得此保證金，復以之爲作崇市場的資本，更屬病民！

據說，高的貪污，計達一千五百萬元之鉅，他在就逮之後，曾分函各省稅局局長說：「弟因一丙保證金事受冤，盼各局即將所有此項保證金悉數繳庫，弟終有水落石出之日……」云云。可見此中癥結所在了。

判定死刑後的高秉坊，但執行之期，却永無時日，並且，重慶實驗法院判決書，應送最高法院覆判，但這案子送了進去，便如石沉大海，一去便沒有消息！其間主審的李懋宣庭長據說也爲此案被一般達官所厭惡，降他到一個小縣中去做法院院長了！不久，孔祥熙由美國歸來，高秉坊得到救星了！結果，總算由最高法院以覆判文交重慶法院，此案還須重審。結果終於改判無期徒刑，這件案子也就這樣不了了之，高秉坊的手段不能不說是高強的。

陳儀與魏道明

誰都知道，陳儀是政學系的要角，與熊式輝同為該系的兩大武將，他是浙江紹興人，現年六十二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任北京政府時代的浙江省都督府總參謀長，軍政司長。北伐時，曾一度任軍政部次長。民國廿三年起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前後凡八年，因用人失檢，致遭遇到一部分人的反對，中央乃於民國三十一年將其內調為行政院秘書長，后又轉任中央訓練團教育長。

台灣光復，中央以陳儀在主閩時，對於台灣問題頗有研究，即派其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之行政長官。中央當時爲了加強行政效率，統一接收事權，故賦予台灣省行政長官之特權，遠較其他各省爲大，此事本來未可厚非，但在光復接收之初，中央的四行兩局想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他認爲有擾混金融之嫌，不允許；以致四行兩局已派赴台灣的工作人員，均原班調回國內。第一因此，當台幣在風雨飄搖之際，四行兩局緊縮對台的法幣頭寸，迫使台幣的聲價日益貶值；第二是因爲他所推行的經濟政策，一部分人認爲與民爭利，國營和公營公司幾乎統治了台灣一切的工礦企業，以致引起台灣人民的不滿；第三是因爲他與台灣黨團方面的負責人不能睦，致使彼此的力量對消，而忽略了台灣流氓浪人與土豪劣紳等潛在的勢力；這是陳儀個人在台灣失敗的根由。

平心而論，我們覺得陳儀的長處是具有魄力，敢於獨斷獨行，然錯誤也便種因於此。所以，陳儀的缺點是頑固偏激，剛愎自負，喜歡聽好話，就怕人批評，因爲如此，所以環繞在他四周的一些高級

幕僚們，便是一味的在他面前阿諛逢迎，粉飾太平，致使陳儀只看到眼前幾個人，而忽視了廣大民衆的意見。其實，他所草擬的政綱政策，有些立意本來很好，但一經試行，便變了質；但陳儀的特點是不要錢，自奉甚儉，這倒是近代官場中所少見的。

現在，再來談談魏道明，誰都曉得，魏道明是當今中國最有名的外交家。他是江西人，一八九七年生，現年五十五歲，留學法國，在巴黎大學會獲法學博士。過去除在國內擔任司法行政部部長，南京市市長，和上海時事新報董事會的理事外，便一直在外國擔任大使的職務。抗戰期中，曾先後任駐法駐美大使等職務，縱橫於國際論壇，厥功甚大；回國後任考試院副院長，與孫科的關係甚爲密切。因爲歷年來都是駐節外國，故對於西洋的文明非常崇拜，而對於歐美各國的民主政治亦極醉心，爲人平和穩健，崇尚法治，注重自由民主，與陳儀的個性恰恰相反。因爲他與國際的關係淵源很深，加以台灣飽經風暴之后，也的確需要一個中和的人纔長台灣，與民修睦，以緩和過去台灣同胞與國內人士之間的感情，故在孫科之力薦，王寵惠極力撮合下，魏道明便榮任了台灣省政府主席，在蒞任時，他首先解除戒嚴令，撤銷了新聞和郵電檢查，恢復了台灣與國內的匯兌，局部的調整了統治經濟的政策，這的確會予台灣同胞以良好的印象；然其在治理台灣主要的政策上，却依然是走着陳儀的舊路，如台幣政策尙未取銷，統制貿易依然存在，以及其他的一切，還是過去的老調。談魄力，他不及陳儀，講民主，他比陳儀藝術；說政治，他並沒有什麼新的高見，遠無陳儀那樣富有理想；但他比較機智，善於應付，這是文人主政的特色；他不好高騖遠異想天開，他只是平和而又穩健的在執行着中央既定的政策。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一日初版

中國內幕

每冊實售

編輯者 林 天 行

出版者 大達圖書公司

福州高節路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必究

6

449912